


經歷
韜奮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開頭的話

時間過得眞快！在我提筆寫這篇開頭的話的時候，離開這本書的脫稿又有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裏面，我和幾位朋友在覊押中的生活和以前差不多。關於我自己在這時期內的『工作』，完成了兩本書，除這本經歷外，還有一本是萍踪憶語；隨後把我從香港回上海後所發表的文章略加整理，編成一書，名叫展望，同時看了十幾本書。我個人在這幾個月覊押中所得的只是這一點點微小的收穫，但是睜開眼看看中國時局的變化，却有了値得特別注意的新的形勢——漸漸地走上和平統一的道路。依政府當局的表示，在國際主張參加集體安全，也就是參加反侵略的陣線；在國內主張保全國力以救亡圖存；關於民族敵人的侵略，加强保全領土主權的决心；關於國民大會和製憲問題，準備有所改進；關於釋放政治

犯，集中人材，和開放言論，也有比較具體的表示。事實上的表現雖還有待於全國上下的繼續努力，但是一線曙光的顯露，却已給與國事前途以轉機的可能性。這可能性的大小，全視今後全國上下努力程度爲轉移。我們國民此後應該格外努力的是：一方面要從種種工作上更充實團結禦侮的內容；一方面要用種種方法督促並協助政府實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忠實執行，對於民衆救國運動的民權有切實的保障，正所以增加全國一致救亡的力量，所以這兩方面實在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一點也許可以作爲本書立場和主張的補充。

關於這本經歷，還有幾句話想附帶提及的，就是這本書並非什麼自傳，我也夠不上有什麼自傳，只不過就我二十年來的生活過程中抽出一些關於就學就業的經歷片段，和關心我的好友們談談，其中或者不無一些可供青年朋友們的參考，如此而已。這本書的寫成，也許還靠我的被捕，因爲在外面也許有更重要的文字要寫，沒有時間來寫這樣的書；而且在羈押中寫別的著作，參考材料不易帶，只

有寫這樣回想的東西，比較地便當些，所以無意中居然把它寫完了。

我很愉快地有機會把同時被捕的幾位朋友的可貴的經歷記下來，為本書增光不少。我近來發現自己對於寫傳記的興趣特別濃厚，這幾篇關於幾位朋友的記述，便是在這樣的心境中寫的。關於傳記，我以前只是用過因公和落霞的筆名，替生活週刊寫過幾篇名人小傳，後來編譯過一本二十萬字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但是最近才深切地覺得自己對這件事有着特別濃厚的興趣，很想以後再多多研究歷史，勉勵自己做個傳記家，更希望能有機會替民族解放的鬥士們多著幾本有聲有色的傳記。我是個新聞記者，就記者的立場說，雖在不自由的境域中，寫了關於這幾位朋友的記述，對於新聞記者的『任務』總算也盡了一些，因為所記關於這幾位朋友的生平，也就等於訪問記。同時我應該乘此機會謝謝這幾位朋友。本書裏『同在羈押中』的幾張相片是承沙千里先生攝贈的，也附此誌謝。

我們在羈押中，除看書寫作和運動外，大家對各種問題也時有討論。關於討

論問題，我們的『家長』常說起兩句話，那就是『主張堅決，態度和平』。我覺得這兩句話實在可以作爲我們的座右銘，所以特別提出來轉贈給讀者諸友。這裏所謂主張，當然是指合理的切於現實的主張；如果現實變化了，主張需要修正，或甚至更換，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所謂和平是指在討論或說服的時候，用不着面紅耳赤，大聲咆哮，因爲這並不能絲毫增加你的理由！

最後我要踐約報告讀者諸友的，是我和同時被捕的幾位朋友已於四月三日經江蘇高等法院提起公訴了。這是很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公訴的結果怎樣，將來有機會時再奉告吧。

韜奮記於蘇州

廿六年四月三日

目次

二十年來的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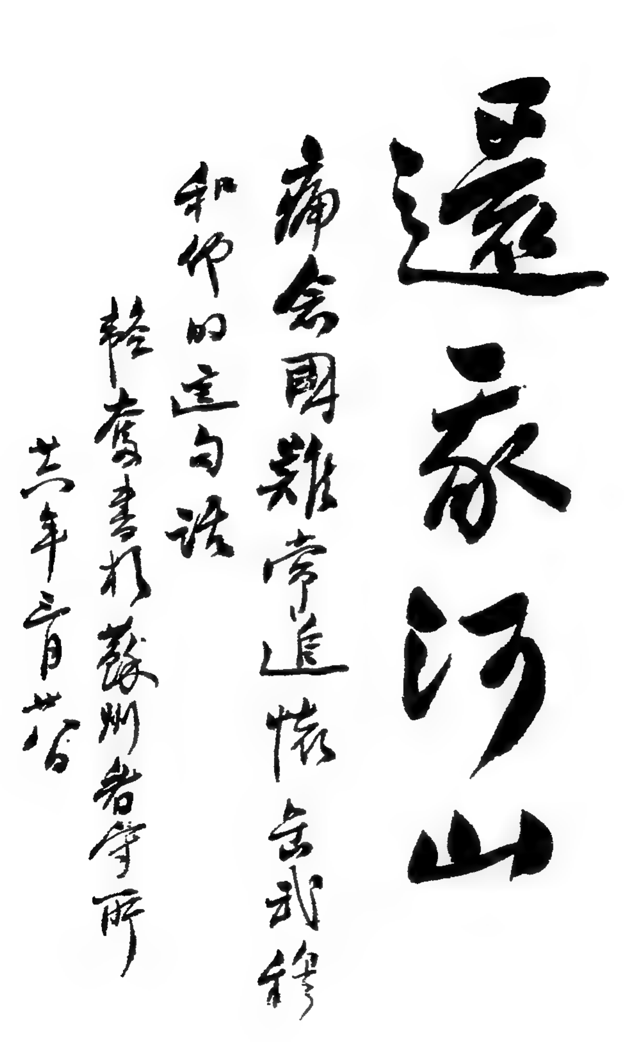
在香港的經歷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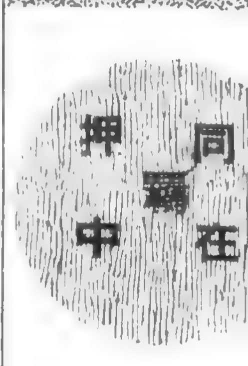


本書著者

（一九三五年攝於倫敦）


還我河山
痛念國難常追懷岳武穆
和他的這句話





千里 造時 韜奮 『家長』 乃器 公樸

（攝在看守所的天井）

看守所[illegible]的一角（[illegible]）



同在羈押中

同在羈押中







打太極拳





同在羈押中



二十年來的經歷

一　永不能忘的先生

曾經偶然在西報上的『補白』裏看到這兩句怪有趣的話：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 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如把這兩句話勉强譯成中文，大意也許可以這樣說：『喜歡閒談的人，就是對你瞎談着別人的事情；令人討厭的人，就是對你儘談着關於他自己的事情。』我說『勉强譯成』，因爲一種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難一點不走漏地譯成別一種文字，但是無論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討厭的人，就是對你儘談着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一個人談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囉囉嗦嗦地拖泥帶水地說個不完，使人聽了感覺到厭煩，諸君也許已經有過這樣聽得

不耐煩的經驗吧。我有鑒於此，所以向來對於「自述」一類的文字不願寫。

最近因爲在香港辦了幾個月的報，回到上海以後，有不少朋友問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寫了好幾篇在香港的經歷（登在生活星期刊），原來不過隨筆寫來，拉雜談談而已，不料有好多讀者寫信來勉勵我要多寫一些，大概還不覺得怎樣厭煩；但是在香港幾個月的經歷就不過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結束了。可是經了讀者的這樣慫恿，我又轉着念頭，想要嘗試寫幾篇二十年來的經歷，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諸君的厭煩。倘若讀者聽得厭煩，我希望不客氣地寫信來警告一下，我便可提早結束，或不再寫下去。

我這二十年來的經歷，想從小學時代談起。當時我所進的是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校長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幹練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這個小學裏面，所以把學校辦得很好。我們那一級的主任教員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們國文和歷史，——我最感興趣的科目。他那樣講解得清晰有條理，課本以外所供

給的參考材料的豐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興趣。我尤其受他的薰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愛。我這裏所謂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飾並不華麗，但是非常整潔，和我所不喜歡的蓬頭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對於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準備，我對於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難，他都能給我以滿意的解釋。他教得非常認眞，常常好像生怕我們有一句一字不明瞭；他的認眞和負責的態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範。他並沒有什麽呆板的信條教給我，但是他在擧止言行上給我的現成的榜樣，是我終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沒有別的什麽特長，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總是要認眞，要負責，否則寗願不幹。這雖然是做事的人所應該有的起碼的條件，但是我却永遠不能忘却永耀先生給我的模範。此外令我傾倒的是他的和藹可親的音容。他對於學生總是和顏悅色的，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動過氣；我上他的課，比上任何人的課都來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學生的敬愛，並不是由於姑息，隨便，撒爛污，却是由於認眞而又不致令人難

諶。我當時敬愛這位先生的熱度可以說是很高很高，但是並未曾對他表示過我的這樣的心意，現在這位良師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記他。

當時我們的一級裏只有二十個同學，因爲人數少，彼此的個性相知很深，現在有的做醫生，有的做律師，有的做工程師，有的服務於郵政局。陸鼎揆律師也是當時同級裏的同學之一。在國文一課，我們倆是勁敵。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嚴；最好的文章，他在題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兩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僅於一篇之中比較有精彩的句子的點斷處加雙圈。每次文卷發下來的時候，大家都好像急不及待地探聽誰有着三圈，誰有着兩圈，誰有着一圈，乃至於下課後爭相比較句子點斷處的雙圈誰多。有的同學緊緊地把文卷藏在課桌的抽屜裏，壓在重重的課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顯然地是一個雙圈都沒有！當時我們那種競賽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覺到很深切的興趣。有了這樣的競賽，每星期都受着推動一次，大家都的確容易有進步。

二　工程師的幻想

我的父親所以把我送進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因為他希望我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當時的南洋公學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工程學校，由附屬小學畢業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屬中學），中院畢業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學），所以一跨進了附屬小學，就好像是在準備做工程師了。我在那個時候，不知道工程師究竟有多大貢獻，糢糊糊的觀念只是以為工程師能造鐵路，在鐵路上做了工程師，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豐富的薪俸。父親既叫我準備做工程師，我也就冒冒失失地準備做工程師。其實講到我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要做工程師，至少對於算學物理一類的科目能感到濃厚的興趣和特殊的機敏。我在這方面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

這方面的特長，更爲顯著。我們年紀很小還在私塾的時候，所好便不同。當時我們請了一位老夫子在家裏教着『詩云子曰』，並沒有什麼算學的功課，但是我的弟弟看見家裏用的厨子記賬的時候打着算盤，就感覺到深刻的興趣，立刻去買了一本珠算歌訣，獨自一人學起什麼『九歸』來了。我看了一點不感覺興味，連袖手旁觀都不幹。我只有趣味於看鋼鑑，讀史論。後來進了小學，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學。當時教算學的是吳叔厘先生。他的資格很老，做了十幾年的算學教員，用的課本就是他自己編的。我看他眞是熟透了，課本裏的每題答數大概他都背得出來！他上課的時候，在黑板上寫着一個題目，或在書上指定一個題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塊小石板上，用石筆的的答答地算着。不一會兒，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個記分數的小簿子，走過一個一個的桌旁，看見你的石板上的答數是對的，他在小簿上記一個記號；看見你的石板上的答數不對，他在小簿上另記一個記號。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數對的少而錯的

多，那是不消說的。如我存心撒撒爛污，那也可以處之泰然，但是我却很認眞，所以心裏格外的難過，每遇着上算學課，簡直是好像上斷頭台！當時如有什麼職業指導的先生，我這樣的情形，一定可供給他一種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勸我不必準備做什麼工程師了。但是當時沒有人顧問到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裏糊塗中過日子。小學畢業的時候，我的算學考得不好，但是總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佔着便宜。剛升到中院後，師友們都把我當作成績優異的學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實際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誤看作成績優異的學生，我爲着虛榮心所推動，也就勉爲其難，拼命用功，什麼代數哪，幾何哪，我都勉强地學習，考的成績居然很好，大考的結果仍僥倖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裏對這些課目，實在感覺不到一點興趣。這時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學校裏求學，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我看他做算學問題的時候，無論怎樣難的題目，在幾分鐘內就很順手地得到正確的答數；我總

是想了好些時候才勉强得到，心裏有着說不出的煩悶。我把這些題目勉强做好之後，便趕緊把課本擱在一邊，希望和它永別，留出時間來看我自己所要看的書。這樣看來，一個人在學校裏表面上的成績，以及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要點是你對於你所學的是否心裏眞正覺得喜歡？是否眞有濃厚的興趣和特殊的機敏？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總是隔膜的。

我進了中院以後，仍常常在夜裏跑到附屬小學沈永癯先生那裏去請教。他的書櫥裏有着全份的新民叢報，我幾本幾本的借出來看，簡直看入了迷。我始終覺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這個時代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對於當前政治的深刻的評判，對於當前實際問題的明銳的建議，在他的那枝帶着情感的筆端奔騰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終篇不能釋卷。我所苦的是在夜裏不得不自修校課，尤其討厭的是做算學題目；我一面埋頭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轉到新借來放在桌旁的那幾本新民叢報！夜裏十點鐘照章要息燈睡覺，我

偷點着洋蠟燭躲在帳裏偷看，往往看到兩三點鐘才勉强吹熄燭光睡去。睡後還做夢看見意大利三傑和羅蘭夫人！（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叢報裏所發表的有聲有色的傳記。）這樣準備做工程師，當然是很少希望的了！

三　大聲疾呼的國文課

當時我進的中學還是四年制。這中學是附屬於南洋公學的，叫做『中院』。大學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電機兩科。（當時南洋公學雖已改稱為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但大家在口頭上還是叫南洋公學。）中院畢業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學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屬中學對於理化算學等科目特別注重。算學是我的老對頭，在小學時代就已經和它短兵相接過，但是在中學裏對於什麼代數，幾何，解析幾何，高等代數等等，都還可以對付得來，因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動着，硬着頭皮幹。在表面上看來，師友們還以為我的成績很好，實際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強中乾』了。

但是南洋公學有個特點，却於我很有利。這個學校雖注重工科，但因爲校長是唐蔚芝先生，（中院僅有主任，校長也由他兼，）積極提倡研究國文，造成風氣，大家對於這個科目也很重視。同時關於英文方面，當時除聖約翰大學外，南洋公學的資格算是最老，對於英文這個科目也是很重視的。前者替我的國文寫作的能力打了一點基礎；後者替我的外國文的工具打了一點基礎。倘若不是這樣，只許我一天到晚在XYZ裏面翻觔斗，後來要改行便很困難的了。但是這却不是由於我的自覺的選擇，只是偶然的湊合。在這種地方，我們便感覺到職業指導對於青年是有着怎樣重要的意義。

當然，自己對於所喜歡的知識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進步的，但是環境的影響也很大。因爲唐先生既注意學生的國文程度和學習，蹩脚的國文教員便不敢濫竽其間，對於教材和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注意。同時國文較好的學生，由比較而得到師友的重視和直接間接的鼓勵，這種種對於研究的興趣都是

有着相當的關係的。

我們最感覺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學初年級的國文教師朱叔子先生。他一口的太倉土音，上海人聽來已怪有趣，而他上國文課時的起勁，更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對學生講解古文的時候，讀一段，講一段，讀時是用着全副氣力，提高嗓子，理頭苦喊，讀到有精彩處，更是弄得頭上的筋一條條的現露出來，面色漲紅得像關老爺，全身都震動起來，（他總是立着讀，）無論那一個善打瞌睡的同學，也不得不肅然悚然！他那樣用盡氣力的辦法，我雖自問做不到，但是他的那樣聚精會神，一點不肯撒爛污的認眞態度，我到現在還是很佩服他。

我們每兩星期有一次作文課。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訂成一厚本，帶到課堂裏來，從第一名批評起，一篇一篇的批評到最後，遇着同學的文卷裏有精彩處，他也用讀古文時的同樣的拚命態度，大聲疾呼地朗誦起來，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經他這一番的批評和大聲疾呼，大家確受着很大的推動；有的人

也在寄宿舍裏效法，那時你如有機會走過我們寄宿舍的門口，一定要震得你耳聾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領，他改你一個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裏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話，他都不會抹煞掉。他實在是一個極好的國文教師。

我覺得要像他那樣改國文，學的人才易有進步。有些教師儘轉着他自己的念頭，不顧你的思想；爲着他自己的便利計，一來就是幾行一删，在你的文卷上大發揮他自己的高見。朱先生的長處就在他能設身處地替學生的立場和思想加以考慮，不是拿起筆來，隨着自己的意思亂改一陣。

我那時從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寫作的要訣，是寫作的內容必須有個主張，有個見解，也許可以說是中心的思想，否則你儘管堆着許多優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個題目，不就動筆，先盡心思索，緊緊抓住這個題目的要點所在，古人說「讀書得間」，這也許可以說是要「看題得間」；你只要抓住了這個「間」，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筆鋒奔放馳騁，都能夠「搔到癢

處』，和『隔靴搔癢』的便大大的不同。這要訣說來似乎平常，但是當時却有不少同學不知道，拿着一個題目就瞎寫一陣，寫了又塗，塗了又寫，鐘點要到了，有的還交不出卷來，有的只是怱怱地糊裏糊塗地完卷了事。

四　課外閱讀

常有青年朋友寫信問起寫作的祕訣，其實我只是一個平凡的新聞記者，寫的不過是平凡的新聞記者所寫的很平凡的東西，說不上什麼作家，所以對於這種問句，很感到慚愧。不過就我很平凡的寫作的一點經驗說，覺得在初學方面最重要的不外兩點：一是寫的技術，二是寫的內容。簡單說起來，所謂寫的技術，是能夠寫得出自己所要說的話，也就是能夠達意。所謂寫的內容是有話說，也就是有什麼意思或意見要說出來。

我上次和諸君談過在小學和中學裏得到良師教授國文的情形。但教師儘管教得好，實際的領略和運用，還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幹，從幹的當中得到要訣。這好

像游泳一樣，只是聽了算數是無用的，必須鑽到水裏去游泳，才有所得。我當時在學校裏所學的國文還是文言文，讀的是古文。只靠教師在課堂上教的幾篇是不夠的，所以對於什麼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所謂八大家的各個專集（尤其是韓昌黎全集），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學案等等，在課外都完全看了一下。覺得其中特別為自己所喜歡的，便在題目上做個記號，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歡的再看第三次；最最喜歡的，一遇着可以偷閒的時候，就常常看。此外如新民叢報，梁任公和汪精衛筆戰的文字，在當時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東西。還有一部書也是我在當時很喜歡看的，說來很奇特，是所謂三名臣書牘，共有四冊，是曾滌生，胡林翼，和曾紀澤的奏摺和信札。我却不是崇拜什麼「名臣」，只覺得這裏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達，對於他們處理事務的精明強幹，尤其是物色人材和運用人材方面，感到很深的興趣。據說他們的這些文字不一定是完全自己寫的，有好些是當時幕府中的能手代做的。我有一天在舊書攤上無意中碰到這部

舊書，偶然翻看了幾頁，覺得越看越有趣，便把它買了回來，居然在我的書堆裏面佔了很『得寵』的位置。

當然，這是當時研究文言文做了的一點點工夫，現在注意的是白話文，研究的人不一定要走這條路，而且時代也更前進了，內容方面相去也更遠。所以我和諸君隨便談到這裏，並不是要開什麼書目供參考，只是表示我們在初學的時候，要想增進自己的寫的技術，便要注意多看自己所喜歡看的書。

我當時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我所看的書，當然不能都背誦得出的，看過了就好像和它分手，彼此好像都忘掉，但是當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只要用得着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會突然出現於我的腦際，效驅馳於我的腕下。我所以覺得奇怪的，是我用不着它的時候，它在我腦子裏毫無影踪，一到用得着它的時候，它好像自己就跑了出來。我後來讀到了心理學，覺得這大概就是所謂潛意識的作用吧。無論如何，我在當時自己暗中發現了這個事實，對於課外的閱讀格外感覺

到興奮，因爲我知道不是白讀白看的，知道這在事實上的確是有益於我的寫的技術的。

我覺得我們在閱讀裏既有着這樣潛意識的作用，對於所選擇的書籍的文字，（這僅就寫的技術方面說，內容當然也很重要，）要特別注意。例如有些文字，尤其是所謂直譯的文字，寫得佶屈聱牙，幾十個字一停的長句，看得多了，也要不知不覺中影響到一個人的寫作的技術，寫出來的東西也使人看了不懂，或似懂非懂，使人感覺頭痛！

當然，看書有人指導是可以省却許多不必要的時間和精力的耗費。現在的青年在這方面已有比較的便利，因爲有好些雜誌對於讀書指導都是很熱誠的。我在當時却是自己在暗中摸索着，但是我自己却也有一點選擇的『策略』，雖簡單得可笑，但在當時確受到不少的好處。我每到書店或舊書攤上去東張西望着，看到書目引我注意時，先在那裏看它幾頁，稱心才買，否則就要和它永訣。有些所謂

作家，你雖然東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許買到他的大作來看看，却不免感覺到硬着頭皮看下去也看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覺！

五　寫作的嘗試

在國文課上作文，當然也可以說是寫作的嘗試，但是我在這裏指的却是發表或投稿的文字。

我讀到中學初年級，幾個月後就陷入了經濟的絕境。我知道家裏已絕對沒有辦法，只有自己掙扎，在掙扎中想起投稿也許不無小補。但是不知道可以投到那裏去。有一天偶然在學校的閱報室裏看到申報的自由談登着請領稿費的啓事，才打定主意寫點東西去試試看。那時的自由談是由冷血先生主編，他自己每天在那上面做一篇短評，其餘的文字大概都是靠投稿。

但是我有什麽可以寫呢？的確躊躇了好些時候。我上次不是和諸君談過嗎？

我覺得寫作在初學方面最重要的不外兩點：一是寫的技術，二是寫的內容。這兩點雖同是不可少的，但是第二點似乎比第一點還要重要。我這時在寫的技術方面比較地有一些把握，但是因為經驗的薄弱，觀察的不深刻，實在覺得沒有什麼可寫。於是我想個辦法，到圖書館裏去看幾種英文的雜誌，選譯一些東西。這選譯並不是什麼長篇大文，只是幾百字的短篇的材料，例如體育雜誌，科學雜誌等等裏面的零星的材料，大講其健康或衛生的方法，以及科學上形形色色的有趣的發明。這種材料在當時的自由談是可以適用的，可是試了幾次總是失敗，好像石沉大海，無影無蹤。但是我可以勉強抽出時間來的時候，還是試試看。有一天翻開報紙來，居然看見自己的文字登了出來，最初一剎那間好像還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細看着題目下的署名，的的確確一毫不差的是『谷僧』兩字！（這是當時隨便取的筆名。）這樣陸陸續續地發表了好幾篇，到月底結算稿費的時候，報上那個請取稿費的啓事裏，當然缺不了我的份！我便和我的弟弟同到棋盤街一個刻

圖章的小攤上去刻了一個，拿到申報館去伸手拿錢。心裏一直狐疑着，不知到底能夠拿到多少。不料一拿就拿了六塊亮晶晶的大洋！如計算起來，一千字至多不過一塊錢，但是我在當時根本沒有想到這樣計算過，只覺得喜出望外。我的弟弟比我年齡更小，看見好像無緣無故地櫃台上的人悄悄地付出幾塊大洋錢，也笑嘻嘻地很天真地替我高興。我們兩個人連奔帶跳地出了申報館，一直奔回徐家匯。這在我當時買一枝筆買一塊墨都須打算打算的時候，當然不無小補。但是錢到了手，却也就學了一點壞！回校的途中經過了一個賣彩票的店舖門口，和弟弟兩個人商量一會，居然土頭土腦地下決心掏出一塊大洋買了一張彩票，後來這張彩票的結果和我最初若干次的投稿有着同樣的命運！

不久我又發現了一個投稿的新園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生雜誌。記得當時在這個雜誌裏投稿最多的有三個人：一個是楊賢江，當時他還在師範學校求學；一個是蕭公權，他的底細我不知道，由他的文字裏看出他似乎是四川人；一

個便是我。我的文字雖常常也被採登，但我自己知道都不及他們的兩位好，因此愈益勉力求進步，好像暗中和他們比賽似的。在這個雜誌裏所投的稿不像在自由談上的只有數百字，一來就是幾千字了。所寫的內容，大概偏於學生修養方面的居多，這是我在當時的學生羣中觀察得來的材料，（當時南洋公學的學生有千餘人，這學生羣還不算小，）比以前譯述健康方法和科學小品的內容又有不同，在組織材料和構思方面比較地多得一點訓練。我從這裏又得到一個教訓，就是我們要寫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實踐或經驗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

但是我在學生雜誌裏投稿也不是完全順利的，總是去了好幾篇才登出一篇。登了一篇之後，好像替我打了一個強心針，再陸續寫幾篇去，登後再等着多少時候。關於好多沒有採登的稿子，我當時並不知道，也沒有想到這應該埋怨編輯先生，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稿子並不是篇篇都好。我當時雖一點不知道自己將來的職業是編輯，但是說來奇怪，對於做編輯的苦衷，似乎已經了解。

六 新聞記者的作品

我在準備做工程師的學校裏面——雖則還在中學——並不專心於準備做工程師，却分着大部分的心力看這樣的書，翻那樣的報，和準備做工程師的工作都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這實在不足爲訓。就職業指導的原則說，應該趕緊設法掉換學校才是，可是我當時在這方面是個「阿木林」，想都沒有想到，還是在暗中摸索着。

但是有一點却在小學的最後一年就在心裏決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於做一個新聞記者。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時報上的遠生的「北京」通訊着了迷。每次到閱報室裏去看報，先要注意時報上有沒有登着遠生的特約通訊。我特別喜歡看他的

通訊，有兩個理由：第一是他的探訪新聞的能力實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個有關係的機關，尤其是由那個有關係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詳細正確的內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寫得實在好！所以好，因為流利，暢達，爽快，誠懇，幽默。他所寫的內容，和所用的寫的技術，都使當時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羨慕他，希望自己將來也能做成那樣一個新聞記者。想諸君也許還記得，遠生就是名記者黃遠庸先生的筆名。我當時對於他的為人怎樣，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文字上認識了他，好像他就是我的一個極好的朋友。後來他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而冒險南下，我已在中學裏，對於他的安危，簡直時刻担心着，甚至有好幾夜為着這件事睡不着。他離開上海赴美國，途中還寫了好幾篇短小精悍，充滿着朝氣的通訊登在申報上，是我生平最傾倒的佳作，我正切盼着他能繼續寫下去，不料他到舊金山的時候竟被暗殺，真使我悒鬱不歡，好像死了我自己的一個好朋友。

我以前曾經談起在中學初年級的時候，對於先師沈永耀先生借給我的新民叢

報，也有一時看入了迷，這也是鼓勵我要做新聞記者的一個要素。當然，那裏面所建議的事情和所討論的問題，和當年的時代已不適合，我只是欣賞那裏面的銳利明快引人入勝的寫的技術，所以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就無意再看了，可是增強了我要做個新聞記者的動機，那影響却是很有永久性的。

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同房間的同學有一位彭昕先生，他的國文根底很好，對於秋桐（即現在到華北去做什麼委員，使國人為之齒冷的章士釗）所辦的甲寅雜誌看入了迷。他常常在我面前把秋桐的文章捧上了天，讚不絕口。平心而論，章士釗的現在行為雖令人齒冷，但在當時那一段時期的努力，却也有他的勞績。我厭惡他現在的為人，同時我却要承認當時確曾經受着秋桐文字的相當的影響。我因為彭先生的入迷，也對於甲寅雜誌加了特殊的注意，每期都從我這位朋友那裏借來看。秋桐文字的最大優點是能心平氣和地說理，文字的結構細密周詳，對政敵或爭論的對方有着誠懇的禮貌，一點沒有潑婦罵街的惡習氣。我很覺得這是

現在我們應該注意的態度——尤其是在現在積極推動全國團結禦侮的時候——不要心境過於狹隘，太不容人。我當時對於秋桐的文字雖不像我的同學彭先生那樣入迷，但却也喜歡看。這對於我要做新聞記者的動機，也有相當的推動力。

其實也只有甲寅雜誌能使秋桐令人敬重，後來秋桐反對「五四」運動的新文化，又辦什麼甲寅週刊，同樣地用秋桐署名的文字，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嘔！關於這一點，我也許可以揑造一個原則：就是做文章和做人實在有着密切的關係。做了一個要不得的人，原來能寫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時寫出來的也要變成要不得的東西。這也許是因為好的文章不僅是有着好的寫的技術，同時也離不開好的寫的內容。而且還有一點似乎奇特而却也是事實的：那便是內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響到寫的技術，因為只有理直氣壯的內容才寫得好，否則扭扭揑揑，不能遮掩它的醜態！

七　英文的學習

關於英文的學習，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學的中院裏所得到的兩位教師。後來雖有不少美籍的教師在這方面給我許多益處，但是這兩位教師却給我以初學英文的很大的訓練和訣竅，是我永遠所不能忘的厚惠。在這國際交通日密，學術國際化的時代，我們要研究學問，學習一兩種外國文以作研究學問的工具，在事實上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提出一些來談談，也許可以供諸君的參考。

我所要說的兩位英文教師，一位是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教授英文的黃添福先生。他就是拙譯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那本書裏的男主人公。他大概是生長在美國，英文和美國人之精通英文者無異；英語的流利暢達，口音的正確，那

是不消說的。他只能英語，不會說中國話。做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這就某種意義說來，似乎不免是一件憾事，但是僅就做英文教師這一點說，却給學生以很大的優點。當然，倘若只是精通英文而不懂教授法，還是夠不上做外國文的良師。黃先生的教授法却有他的長處。他教的是英文文學名著，每次指定學生在課外預備若干頁，最初數量很少，例如只有兩三頁，隨後才逐漸加多。我記得在一年以內，每小時的功課，由兩三頁逐漸加多到二十幾頁。上課的時候，全課堂的同學都須把書本關攏來，他自己也很公平地把放在自己桌上的那本書關攏起來。隨後他不分次序的向每一個同學詢問書裏的情節，有時還加以討論。問完了每個同學之後，就在簿子上做個記號，作為平日積分的很據。他問每個同學的時候，別的同學也不得不傾耳靜聽，注意前後情節的線索，否則突然問到，便不免瞠目結舌，不知所答。在上課的五十分鐘裏面，同學們可以說沒有一刻不在緊張的空氣中過去，沒有一刻不在練習聽的能力。

除聽的能力外，看的能力也因此而有長足的進展，因為你要在課堂上關攏書本子，隨時回答教師關於書內情節的問句，或參加這些情節的討論，那你在上課前僅僅查了生字，讀了一兩遍是不夠的，必須完全瞭然全課的情節，才能胸有成竹，應付裕如。換句話說，你看了你的功課，必須在關攏書本之後，對於書內的情節都能明白：這樣的訓練，對於看的能力是有很大的益處。我和同學們最初却在心裏有些反對，認為教師問起文學的內容好像和什麼歷史事實一樣看待，使人費了許多工夫預備。但是經過一年之後，覺得自己的看的能力為之大增，才感覺到得益很大。

還有一位英文良師是徐守伍先生。他是當時的中院主任，等於附屬中學的校長；當我們到了四年級的時候（當時中學是四年制），他兼授我們一級的英文。他曾經在美國研究經濟學，對於英文也很下過苦工。他研究英文的最重要的訣竅是要明白英文成語的運用。這句話看來似乎平常，但是在初學却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受用無窮的祕訣。徐先生還有一句很直率而扼要的話，那就是你千萬不要用你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或讀過的字句。這在中國人寫慣中國文的人們，也許要覺得太拘泥，但是仔細想想，在原理上却也有可相通的。我們寫『艱難』而不寫作『難艱』，我們寫『努力』『奮鬥』而不寫作『奮力』『努鬥』，不過是由於我們在不知什麽時候什麽地方聽過或看過這類的用法罷了。初學英文的人，在口語上或寫作上往往有『揑造』的毛病，或强把中國語氣强譯爲英文，成爲『中國式的英文』！要補救這個毛病，就在乎留意不要用你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或讀過的英文字句。在積極方面，我們在閱讀的時候，便須時常注意成語的用法。成語的用法不是僅僅記住成語的本身就夠的，必須注意成語所在處的上下文的意思。我們在所閱讀的書報裏，看到一種成語出現兩三次或更多次數的時候，如眞在用心注意研究，必能意會它的妙用的。我們用這樣的態度閱讀書報，懂得成語越多，記得成語越多，不但閱讀的能力隨着增進，就是寫作的能力也要隨着增進。

黃先生使我們聽得懂聽得快，看得懂看得快，偏重在意義方面的收獲；徐先生使我們注意成語的運用，對於閱讀的能力當然也有很大的裨益，尤其偏重在寫作能力的收獲。

我覺得這兩位良師的研究法可適用於研究各種外國文。

八　修身科的試卷

我讀到中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家中對我的學費已無法供給，經濟上陷入了困境。在四面楚歌之中，忽然得到意外的援軍！在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有一天無意中走過宿舍裏的布告板的前面，看見有一大堆人伸長頸子看着一大篇的校長的布告，上面開頭便是校長對於品行重要的說教，最後一句是『本校長有厚望焉』，隨後是大批『優行生』的姓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也赫然夾在裏面湊熱鬧！老實說，我當時對於『優行』這個好名稱却不覺得怎樣，可是聽老同學們說起做了『優行生』可以得到免繳學費的優待，對於我當時竭澤而漁的苦況却不無小補。

說起當時這種『優行生』的資格，却也頗有趣味。最重要的是在大考時候那一篇修身科的試卷。修身科的教師就是當時的國文教務長，教的是宋明的理學，油印的講義充滿着許多慎獨的工夫，克慾的方法。教師上課的時候，就把這些講義高聲朗誦，同時在課堂裏大踱其方步。他只是朗誦着講義，不大講解其中的意義，朗誦之後，餘下來的工夫就大罵當代的一切人物，這些人在他似乎覺得都不合於他心目中的修身的標準！罵得痛快淋漓，往往要罵得哄堂大笑。當他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當兒，如偶有同學在課堂裏打瞌睡給他看見，他就要大聲發問：『你昨天夜裏在被窩裏幹什麼？我看你的臉色很靠不住！』弄得哄堂大笑，那個同學往往要難為情得面紅耳赤，無容身之地！到了大考的時候，他出一個多少有關理學的題目，叫大家做一篇文章。其實這篇文章的好壞，與其說是關於作者平日修身的怎樣，不如說是關於作者國文程度的怎樣。國文好的人就大佔便宜，和修身不修身似乎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就一般說，國文好的同學大概多是用功朋

友，在品行上不致怎樣撒爛汚，但是也有例外的。我就親知道在另一級裏有一位同學在考『修身』的前一夜，還請假在外打了通宵的麻將，第二天早晨匆匆到校應考，因爲他的國文程度很好，考卷上仍得到一百分，他的大名仍在『優行生』之列！

大概『優行生』的推舉，是在教務會議中由修身科教師提出，由其他教師贊成通過的，所以僅僅修身科考卷好還不夠，其他功課也要相當的好。如有什麼功課過於撒爛汚，教這功課的那位教師也許要說幾句中傷的話，『優行生』突然間便不免要發生問題了！但是修身科在大考時的那一篇文章的優劣，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樣決定『優行生』的辦法似乎很有疑問，可是在當時的我，得因此免除學費，却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在南洋公學讀到大學二年級（電機科），除了有一個學期是例外，其餘的學期都很僥倖地被列在『優行生』，學費也隨着被免除了。我對於修身科的教師

雖有着奇異的感想，但是這一點却不得不感謝他。其中有一個學期是例外，這裏面的情形也可說是例外的例外。校長依向例貼出布告宣布『優行生』的名單，在名單之前也依向例有着一大篇『本校長有厚望焉』的說教，在那篇說教裏特別提出我的名字，說我好得不得了，除學識是怎樣怎樣的精研通達外，性情又是怎樣怎樣的謙遜韜晦，簡直不是什麼物質的獎勵所能包容的，所以特由校長加以這樣榮譽的獎勵，把『優行生』的名義暫停一次。這在教師們鼓勵的盛情固然可感，可是我那一學期的學費却大費了一番的籌謀！

諸君知道學校裏的費用，學費不過佔着其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如買書費，膳費，紙筆費，洗衣費，以及無法再節省的零用費，都要另外設法。投稿生涯也是『開源』之一法，所以當時有許多寫作譯述，與其說是要發表意見或介紹知識，不如說是要救窮。我的弟弟當時也同在南洋公學求學，他的經濟狀況當然不會比我好，也有一部分要靠做『優行生』所得的免除學費的優待。我們兩個人的『開

源』的途徑既不廣，同時只得極力『節流』。從徐家匯到上海（指熱鬧的街市）有一二十里路，原有電車可通，我們在星期日偶因有事出校，往往不敢乘電車，只得跑路。在暑假期內，極力找家庭教師的職務做。在那時的南洋公學是上海最著名的一個學校，對於招考時的考試特別嚴格，所以有志投考的，在暑假期內常由父兄請人在家裏補習功課。我們弟兄兩人很幸運地得到同學們的信任，他們遇着有親友們要物色這種補習教師，常替我們作負責的介紹，所以這在當時也是我們這苦學生的一條出路。

現在常有些青年寫信問我苦學生怎樣可以自給，這問題的確不易答復，因為這事沒有什麼一定的公式，要看各人的環境，人緣，和自己的能力。回想我自己當時的苦學生生涯，也不敢說有什麼把握，只是過一學期算一學期，過一個月算一個月。這學期不知道下學期的費用在那裏，甚至這一個月不知道下一個月的費用在那裏，這簡直是常事。因此心境上常常好像有一塊石頭重重地壓住。別的同

學在星期日是有着當然的娛樂，我的星期日却和平日一樣；出校要用車費，沒有特別的事也不願跑遠路；躲在校裏也沒有什麽娛樂，因爲在星期日的學校原已像個靜寂的寺院。

孩子究竟脫不了孩子氣！記得有一次聽着一個親戚盛讚梅蘭芳的戲，說他眞做得好，簡直是個『怪物』，不可不看，我們弟兄倆剛巧衣袋裏多着幾塊錢，竟下決心同到天蟾舞台去看了一次！看的是夜戲，因太遲不便回校，還同往旅館住宿了一夜。雖由徐家匯出來往返都是跑腿，但是已破天荒地用了十塊大洋，因爲一個位置的票價就去了四塊大洋，那眞是鬧了一次大濶！這事如被那位修身科教師知道了，也許要取消我們的『優行生』的資格！

九　幻想的消失

我在南洋公學的時候，在精神上常感到麻煩的，一件是經濟的窘迫，一件是勉强向着工程師的路上跑。前者的麻煩似乎還可以勉强拖過去，雖則有的時候很像到了絕境；後者的麻煩却一天天地繼續下去。如果我肯隨隨便便地敷衍，得過且過，也許可以沒有什麼問題，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則已，既做事又要盡力做得像樣；所以我不想做工程師則已，要做工程師，决不願做個「蹩脚」的工程師。我讀到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已感覺到解析幾何的和我爲難，但是我當時並不知道天地間有所謂職業指導這個東西，只常常怪自己何以那樣不行！中學畢業後要分科了。除土木科和電機科外，還新設有鐵路管理科。原來同學裏面性情不近於學工

科的不止我一個人，據說鐵路管理科是不必注重物理算學的，所以有不少同學加入。照理我也可以加入這一科，不過當時加入這一科的却有許多平日不用功的同學，在一般同學看來，大有這是『藏汚納垢』的一科，存着輕視的心理！而且我對於鐵路管理，自問也沒有什麽特別的興味，所以我沒有一點意思要進這一科。由現在看來，前一種心理確是錯誤的，後一種心理也許還合於職業指導的一個原則。無論如何，我既無意於管理什麽鐵路，只得在土木科和電機科兩者之間選擇一科。我說『只得』，因爲在當時竟好像除了南洋公學，沒有別的什麽學校看得上眼！算學是我的對頭，這是諸君所知道的。我聽見有些同學談起電機科對於算學的需要，不及土木科那樣緊張，我爲避免『對頭』起見，便選定了電機科。到了這個時候，我對於工程師的幻想還沒有消失。這種幻想的所以還未消失，並不是因爲我喜歡做工程師，却是因爲不知道有更改的必要和可能。我所以不喜歡做工程師，並不是不重視工程師，却是因爲我自己的能力和工程師沒有緣分。

但是我仍然糊裏糊塗地向着工程師的路上跑。不久我對於工程師的幻想終於不得不完全消失，這件事我却不得不謝謝張貢九先生。他當時教我們的微積分和高等物理學。諸君知道微積分是算學中比較最高級的階段，高等物理學對於算學的需求也是特別緊張的。而這位張先生對於這兩科考試的題目又特別地苛刻。他到考試的時候，總喜歡從別的書上搜求最艱深困難的題目給學生做，弄得同學們叫苦連天，尤其引起深刻反省的當然是像我這樣和算學做對頭的人們。最初我還再接再厲，不肯罷休，但是後來感覺到『非戰之罪』，便不得不另尋途徑了。可是怎麼辦呢？尤其是『優行生』的問題！在南洋公學還可藉口『優行生』來湊湊學費，如換一個學校，連這樣一點點的憑藉也沒有了。這是一種最躊躇的心理。

可是問題當然還沒有解決。同時有一位姓戴的同學却給我一個很大的推動。他在我們的同級裏，對於工科的功課却是賦有天才的，但是他對於醫學的研究具有更濃厚的興味，便下決心於中學畢業後，考入聖約翰大學的醫科。（先須進理

科。）他去了以後，偶然來談談，我才知道聖約翰的文科比較地可以做我轉校的參考。我此時所要打算的是經濟的問題，因為到聖約翰去之後，不但沒有『優行生』的獎學金，而且聖約翰大學是向來有名的貴族化的學校。這個學校的課程內容，比較地合於我的需要，而貴族化的費用却給與我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事有湊巧，有一位同級的同學葛英先生正在替他的一個本家物色一個家庭教師。他的那位本家是在宜興縣的蜀山鎮，家裏是開瓷廠的，年已六十幾歲了，對於三個孫子的學業希望得非常殷切，托我的這位同學代為物色一個好教師，要請到蜀山鎮去做西席老夫子的。我是否夠得上做一個好教師，自己實在毫無把握，但是這位同學知道我有暫時做事積資再行求學的意思，極力慫恿我接受這個位置。當時是在將放年假的時候，他們打算請我去教半年，準備使那三個小學生能在第二年的暑假考入學校。為特別優待我起見，他們自動建議每月送我『束修』四十元，來往盤費都由東家担任。這位東家雖還拖着一根辮子，年齡已達六十幾歲的老先生，

但是對於我這個青年「老夫子」却表示着十二萬分的敬意；他的那樣謙恭誠摯的盛情厚誼，實在使我受到很深的感動。我想一部分也許是由於他對於三個孫子的學業前途盼望得十分殷切，推他愛護孫子的心而愛護到所請的「老夫子」；一部分也許是由於我的那位同學在他面前，把我說得太好了。

一〇　青年『老學究』

我眞料想不到居然做了幾個月的『老學究』！這在當時的我當然是不願意做的。一般青年的心理也許都和我一樣吧，喜走直線，不喜走曲線，要求學就一直入校求下去，不願當中有着間斷。這心理當然不能算壞；如果有走直線的可能，直線當然比曲線來得經濟——至少在時間方面。但是我們所處的實際環境並不是烏托邦，有的時候要應付現實，不許你走直線，也只有走曲線。我當時因爲不能繼續入校，心理上的確發生了非常煩悶悒鬱的情緒；去做幾個月的『老學究』，確是滿不高興，無可奈何的。不過從現在想來，如有着相當的計劃，鼓着勇氣往前走，不要自餒，不要中途自劃，走曲線並不就是失敗，在心境上用不着怎樣難

過；這一點，我很誠懇地提出來，貢獻於也許不得不走着曲線的青年朋友們。拿破崙說『勝利在最後的五分鐘』，這句話越想越有深刻的意味，因爲眞正的勝利要看最後的分曉，在過程中的曲折是不能卽作爲定案的。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有着百折不回的精神向前進。

我當時在最初雖不免有着煩悶悒鬱的情緒，但是打定了主意之後，倒也沒有什麼，接着已定的計劃向前幹去就是了。

我的那位東家葛老先生親自來上海把我迎接去。由上海往宜興縣的蜀山鎮，要坐一段火車，再乘小火輪，他都一路很殷勤地陪伴着我。蜀山是一個小村鎮，葛家是那個村鎮裏的大戶，他由碼頭陪我走到家裏的時候，在街道上不斷地受着路上行人的點頭問安的敬禮，他也忙着答謝，這情形是我們在城市裏所不易見到的，倒很引起我的興趣。大概這個村鎮裏請到了一個青年『老學究』是家家戶戶所知道的。這個村鎮裏沒有郵政局，只有一家雜貨鋪兼作郵政代理處，我到了之

後，簡直使他特別忙了起來。

我們住的雖是鄉村的平屋，但是我們的書房卻頗爲像樣。這書房是個隔牆小花廳，由一個大天井旁邊的小門進去，廳前還有個小天井，走過天井是一個小房間，那便是『老夫子』的臥室。地上是甎地，窗是紙窗，夜裏點的是煤油燈。終日所見的，除老東家偶然進來探問外，只是三個小學生和一個癩痢頭的小工役。三個小學生的年齡都不過十一二歲，有一個很聰明，一個稍次，一個是聾子，最笨，但是他們的性情都很誠摯篤厚得可愛，每看到他們的天眞，便使我感覺到愉快。所以我雖像入山隱居，但有機會和這些天眞的兒童朝夕相對，倒不覺得怎樣煩悶。出了大門便是碧綠的田野，相距不遠的地方有個山墩。我每日下午五點鐘放課後，便獨自一人在田陌中亂跑，跑到山墩上瞭望一番。這種賞心悅目的自然界的享受，也是在城市裏所不易得到，即比之到公園去走走，並無遜色。有的時候，我還帶着這幾位小學生一同出去玩玩。

在功課方面，這個青年『老學究』大有包辦的嫌疑！他要講解論語，孟子，要講歷史和地理，要教短篇論說，要教英文，要教算學，要教書法，要出題目改文章。論語，孟子不是我選定的，是他們已經讀過，老東家要我替他們講解的。那個聾學生只能讀讀比較簡單的教科書，不能作文。夜裏還有夜課，讀到九點鐘才休息。這樣的兒童，我本來不贊成有什麼夜課，但是做『老夫子』是不無困難的，如反對東家的建議，大有偷懶的嫌疑，只得在夜裏採用馬虎主義，讓他們隨便看看書，有時和他們隨便談談，並不認眞。

我自己是吃過私塾苦頭的，知道私塾偏重記憶（例如背誦）而忽略理解的流弊，所以我自己做『老學究』的時候，便反其道而行之，特重理解力的訓練，對於背誦並不注重。結果，除了那位聾學生沒有多大進步外，其餘的兩個小學生，都有着很大的進步。最顯著的表現，爲他們的老祖父所看得出的，是他們每天做一篇的短篇論說。

我很慚愧地未曾受過師範教育，所以對於怎樣教小學生，只得『獨出心裁』來瞎幹一陣。例如作文，每出一個題目，必先顧到學生們所已吸收的知識和所能運用的字彙，並且就題旨先和他們略爲討論一下；這樣他們在落筆的時候，便已有着『成竹在胸』『左右逢源』的形勢。修改後的卷子，和他們講解一遍之後，還叫他們抄一遍，使他們對於修改的地方不但知其所以然，並且有較深的印象。

一一 踏進了約翰

幾個月的鄉村生活怱怱地過去，轉瞬已到了暑假。幾個小學生到上海投考學校，我也回到上海準備投考聖約翰大學。

和我同時投考約翰的還有一位南洋同學，就是現在的王以敬醫師。他原是在南洋選定土木科的，因爲性情不近，改選醫科。我們兩個人在南洋時雖所進的學科不同，但是都讀到大學二年級。他進醫科，先要進約翰的理科，我要進的却是約翰的文科。由工科轉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轉到文科來得便當，因爲工科和文科的課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時對於文科有關係的書籍已無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時並不知道自己要轉文科，不過因爲自己喜歡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

這個緊急備考的時候，居然有一點用處。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學名著，在一二十種中選考四種，這就不是臨時抱佛脚所能速成的。可是無論如何，要想從工科二年級跳到文科三年級，這在當時好多朋友都認爲是太大膽的。我所以不得不這樣大胆來拼一下，與其說是我的野心，不如說是因爲我的經濟力量常在風雨飄搖的境况中，希望早些結束我的大學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會寄宿舍裏，兩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臨考的那幾天，我們兩個人的心理都非常緊張。我們都存着非考取不可的念頭，因爲我們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醫學，上海除德文的同濟外，英文的醫學校在當時只有約翰是比較差强人意的。我呢，在當時也覺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約翰是比較差强人意的。可是考試的成敗是最難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幾天我們的心理是特別的緊張，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時都是時刻在惴惴危懼着的。每天夜裏，我們兩人都開着『夜車』，預備考試的功課到兩三點鐘，疲頓得不堪言狀。

天朦朦亮就起來，匆匆盥洗了後，連早餐都沒有用，就匆匆出發，同乘電車到靜安寺。還早得很，有幾十個同往投考的人們不約而聚的步行一小時左右，才到約翰。考大學三年級的只有王先生和我兩個人。因為我們所投考的學科不同，所以兩個人還是分開來考的，各人都分別到各個有關係的教授房間裏去應試。提心吊膽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結果居然兩人都被錄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艱苦而得到的東西，在心理上也愈覺到快慰。我們兩人得到投考勝利的消息後，當然是喜不自勝的。

好了，我如願以償地踏進了約翰了。這樣轉換了一個學校，在南洋時功課上所感到的煩悶，一掃而光，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約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幾位是比較可以滿意的，例如哲學教授卜威廉，歷史學教授麥克納爾，經濟學教授倫默等。雖也有幾個飯桶教授濫竽其間，但是我可以不選他們的課程，不致受到什麼影響。

我在約翰雖然僅有兩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處，尤其是快讀的能力。像麥克．納爾先生，他最注重課外參考書的閱讀；他所指定的參考書很多，而且要調閱我們的筆記，非讀得快，很難交卷，所以我們用在圖書館裏的時間不少。約翰在最初受人垢病的是造成了不少買辦，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譯，但是我以爲學會了英文來做研究學問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論，對於這個工具的熟練，我不得不感謝我的母校——約翰大學。講到社會科學方面，這個學校裏只是沿襲着美國式的傳統的說法，就近代新社會科學的眼光看去，似乎給與學者的沒有什麼精要的知識，但是近代新社會科學也不是憑空突如其來的，要徹底懂得近代新社會科學的眞諦，對於傳統學說也需要有相當的明瞭，所以我這兩年的光陰並不覺得是虛擲的。

在約翰時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鐘和星期日上午一兩小時的「做禮拜」。每日早晨上課之前，全體同學千餘人要聚在大禮堂上，校長和教授

們便聚在大禮堂的講壇上，由校長領導着大玩其禱告和朗誦聖經的玩意兒。依例全體都要跪着，幸而除却前兩排的同學因爲太近於講壇不得不下跪外，後面的大多數的同學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樣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實行馬虎主義，還是堂而皇之地坐着。星期日的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堂裏聽那個主教的胡說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辦法只得讓他儘管張開他的嘴吧，我却儘轉着我自己的念頭，這也許是另一種的『走曲線』吧。

一二　深摯的友誼

跨進了約翰之後，課程上的煩悶消除了，而經濟上的苦窘還是繼續着。辛辛苦苦做了幾個月的青年『老學究』所獲得的經費，一個學期就用得精光了，雖則是慄慄危懼地使用着。約翰是貴族化的學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輛輛的汽車排在校前好像長蛇陣似地來迎接『少爺們』回府，我穿着那樣寒酸氣十足的衣服跑出門口，連黃包車都不敢坐的一個窮小子，望望這樣景象，覺得自己在這個學校簡直是個『化外』的人物！但是我並不自餒，因爲我打定了『走曲線』的求學辦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認，關於經濟方面的應付，無論怎樣極力『節流』，總不

能一文不花，換句話說，總不能一點『開源』都沒有。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作主的了！在南洋附屬小學就做同學的老友郁錫範先生，那時已入職業界做事；我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到他那裏去五塊十塊錢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時候再還。他的經濟力並不怎樣充分，但是隔幾時暫借五塊十塊錢還覺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時候並不感覺到有着絲毫的難堪或不痛快的情緒，否則我雖窮得沒有辦法，也是不肯隨便向人開口的。在我苦學的時候，郁先生實在可算是我的『鮑叔』。最使我感動的是有一次我的學費不夠，他手邊也剛巧在周轉不靈，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飾都典當了來助我。但是他對於我的信任心雖始終不變，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萬不得已時也絕對不向他開口借錢；第一次的借款未還，絕對不隨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則他固然也沒有許多款可借；二則如果過於麻煩，任何熱心的朋友也難免於要縐眉的。

我因爲要極力『節流』，雖不致衣不蔽體，但是往往衣服破爛了，便無力置備新的；別人棉衣上身，我還穿着夾衣。蚊帳破得東一個洞，西一個洞，蚊蟲乘機來襲，常在我的臉部留下不少的成績。這時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劉威閣先生。他是在約翰和我同級的，我剛入約翰做新生的時候，第一次和他見面，我們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裏回到學校，手裏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團高興地跑進了我的臥室，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件棉袍，一頂紗帳！我還婉謝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來用。他那種特別愛護我的深情厚誼，實在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時他雖已結了婚，還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貼的零用費十塊錢；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蘇州娘家去了一個月，他就硬把那十塊錢給我用。我覺得這十塊錢所含蓄的情義，是幾十萬幾百萬的鉅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國有句俗話，叫做『救急不救窮』，就個人的能力說，確是經驗之談。因

爲救急是偶然的，臨時的；救窮却是常時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摯的友誼和熱誠的贊助，已是很難得的了，但是經常方面還需要有相當的辦法。我於是開始翻譯杜威所著的民治與教育。但是鉅著的譯述，有遠水不及救近火之苦，最後還是靠私家教課的職務。這職務的得到，並不是靠什麼職業介紹所，或自己登報自薦，却是和我在南洋時一樣，承蒙同學的信任，剛巧碰到他們正在替親戚物色這樣的教師。我每日下午下課後就要往外奔，教兩小時後再奔回學校。這在經濟上當然有着相當的救濟，可是在時間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麼辦法？只有硬着頭皮向前幹去。白天的時間不夠用，只有常在夜裏『開夜車』。

後來我的三弟進南洋中學，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還要設法拿幾塊錢給他零用，我經濟上又加上了一點負担。幸而約翰的圖書館要僱用一個夜裏的助理員，每夜一小時，每月薪金九塊錢。我作毛遂自薦，居然被校長核准了。這樣才勉强捱過難關。

畢雲程先生乘着汽車趕來借給我一筆學費，也在這個時期裏，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經在萍踪寄語初集裏面談起過，在這裏就不贅述了。

深摯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們自己說，我們要能多得到深摯的友誼，也許還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樣做人，不辜負好友們的知人之明。

一三　苦學時代的教書生涯

我在做苦學生的時代，經濟方面的最主要的來源，可以說是做家庭教師。除在宜興蜀山鎭幾個月所教的幾個小學生外，其餘的補習的學生都是預備投考中學高級的。好些課程由一個人包辦，內容却也頗爲複雜。幸而我那時可算是一個『雜牌』學生：修改幾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學的時候研究過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學，靠着自己平日對這方面也頗注意，南洋和約翰對於英文都有着相當的注重，尤其是約翰；教算學，不外幾何和代數，那也是在南洋時所熟練過的。諸君也許要感覺到算學既是我的對頭，怎好爲人之師，未免誤人子弟。其實還不至此，因爲我在南洋附屬中學時，對於算學的成績還不壞，雖則我很不喜歡

它。至少教幾何和代數，我還能勝任愉快。現在想來，有許多事眞是在矛盾中進展着。我在南洋公學求學的時候，雖自覺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盡我的心力幹去，考試的成績仍然很好，仍有許多同學誤把我看作『高材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勝任他們所物色的家庭教師。到約翰後，同學裏面所以很熱心拉我到他們親戚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也因爲聽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們看來，一般的約翰生教起國文和算學來總不及我這個由南洋來的『高材生』！我慨然担任家庭教師的職務，爲的是要救窮，但是替子弟延請教師的人家所要求的條件却不是『窮』，僅靠『窮』來尋覓職業，是斷然無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時間的虛耗，但是在這一點上却無意中不無得到一些好處；還是靠我在讀工科的時候仍要認眞，不肯隨隨便便撒爛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師，實在是爲着救窮，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師，却是因爲我的功課已很忙，倘若不窮的話，很

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課方面，不願以家庭教師來分心。）可是在執行家庭教師職務的時候，一點不願存着「患得患失」的念頭，對於學生的功課異常嚴格，所毅然保持的態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這樣；你不願我這樣教，儘管另請高明。」記得有一次在一個人家担任家庭教師，那家有一位「四太爺」，掌握着全家的威權，全家上下對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來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們的「書房」門口，我正在考問我所教的那個學生的功課，那個學生見「老虎」來了，急欲起來立正致敬，我不許他中斷，說我教課的時候是不許任何人來阻撓的。事後那全家上下都以爲「老虎」必將大發雷霆，開除這個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結果他也不敢動我分毫。我所以敢於强硬的，是因爲自信我在功課上對得住這個學生的家長。同時我深信不嚴格就教不好書，教不好書我就不願幹，此時的心裏已把「窮」字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種心理當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學費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師來做主要

的來源，而同時又要這樣做硬漢！為什麼要這樣呢？我自己也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根據，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這樣的性格，遇着當前的實際環境，覺得就應該這樣做，否則便感覺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這樣的一個『硬漢教師』，不但未曾有一次被東家驅逐出來，而且凡是東家的親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家結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細分析我的『硬』的性質，覺得我並不是瞎『硬』，不是要爭什麼意氣，只是要爭我在職務上本分所應有的『主權』。我因為要忠於我的職務，要盡我的心力使我的職務沒有缺憾，便不得不堅決地保持我在職務上的『主權』，不能容許任何方面對於我的職務作無理的干涉或破壞。（在職務上如有錯誤，當然也應該虛心領教。）我不但在做苦學生時代對於職務有着這樣的性格，細想自從出了學校，正式加入職業界以來，也仍然處處保持着這樣的性格。我自問在社會上服務了十幾年，在經濟上僅能這手拿來，那手用去，在英

文俗語所謂『由手到嘴』的境況中過日子，失了業便沒有後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學生時代要靠着工作來支持求學的費用，但是要使職務不斷，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所以我在職業方面，也可說是一種矛盾的進展。

一四　初出茅廬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畢業於約翰的。向例在行畢業禮的那一天，各同學都一律要穿西裝，要罩上寬袍大袖的學士禮服，戴上方帽子。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這一天，當然可以出錢特製很講究的西裝和禮服，在我這窮學生，却又是一個問題了。學士禮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這倒有法可想。關於西裝，因爲常有西裝裁縫到寄宿舍裏來兜生意，尤其是在將行畢業禮的前幾天。我便和其中一個商量，要暫時賒賬，等兩三個月以後才付錢。他答應了，我這個問題才解決。

到了行畢業禮的那一天，各同學的家屬，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來湊熱鬧。他們當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樂的。各同學先在草場上列成雙人隊，由校長

和各教授引導着，魚貫緩步進大禮堂，各家屬和來賓們很擁擠的圍着大鼓其掌。我此時夾在隊伍中，的確引起了異樣的情感，——與其說是勝利的感覺，不如說是傷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還未結婚，沒有什麼嬌妻，也沒有什麼愛人，來分受我在這剎那間的情緒上的反應。所以我很覺得好像是個孤零零的孤兒夾在怪熱鬧的環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籌措學費的艱辛，想到這一天所剩下來的是三四百元的債務和身上穿着的賒賬的西裝！這種種零零碎碎的毫無系統的念頭，像電閃似的在腦際掠過去，竟使我在那剎那間『生踢門陀』（Sentimental）起來了，眼眶裏湧上了熱淚——莫名其妙的熱淚。但在前後左右都充滿着喜容和笑聲，獨有一個人掉淚，似乎是怪難為情的，所以立刻裝做笑容，把那湧上來的熱淚抑制着向裏流。

大學教育算是告了一個結束。雖然在求學的工具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方面，還只是建立了一個基礎，但是學校却不得不離開了。離開了學校，當然要注意到職

業界這方面來。

同級的各同學在將畢業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將來職業就已開始打算。（其中雖有極少數已決定畢業後到美國去留學。）我本來是要想入新聞界的，但是一時得不到什麽機會，以前『走曲線』求學，現在又不得不『走曲線』就業了。我說『就業』而不說『求業』，因爲在畢業前的一兩個月，畢雲程先生就對我說，穆藕初先生要請一位英文祕書，問我就不就。當時穆先生正在辦厚生紗廠，不久正出了五萬元資送五個北大學生出國留學，這件慨捐鉅款樂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對他頗有着好感，便答應了下來。

到厚生紗廠辦事沒有幾天工夫，穆先生創辦上海紗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長，把我調到紗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祕書。其實紗布交易所裏面關於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譯幾頁關於紗市的英文電訊，內容只是數目字的變異，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這在我這樣初畢業於學校的小子，已不能算

少，雖則當時交易所林立，生意興隆，薪水比任何機關都大，我這樣的薪水在比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覺得我的工作不合於我的愛好。誠然，我也知道初出就業，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的幹去；也明知重大的責任要從比較小的責任開始。我的不喜歡，不是因爲事情的機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後來辦理出版業的時候，任何機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幹得津津有味。我只覺得一天那樣翻譯着幾張紗市的電訊，沒有什麼意義，尤其覺得這是用不着一個什麼英文祕書來辦的事情。空閒的時候太多，也是使我覺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雖有這樣的煩悶，但是因爲一方面還沒有較適宜的機會，一方面又急於要歸還所借的學費，只得打定主義拖下去。

在這樣的煩悶的環境中，如果說還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認識了一位好友余天棟先生。他是東南大學商科畢業的一個英俊煥發至誠感人的有爲青年，這時他在担任紗布交易所的會計科科長，在該所是比較重要的職務。我以前並不

認識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會的會場上遇着，經穆先生介紹後，他那樣的和藹殷懃豪爽的態度，和待我的懇摯親切，就已使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值得敬愛的好友。我是一個爽快的人，他也是一個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愛而知心的人，就喜歡披肝瀝膽地暢談，他也是這樣。所以我們不遇着則已，一遇着了，總是一談幾小時。他爲人整潔，敦厚，聰明，正直，而又很富於幽默。在星期日，我們常在一起，每每一談就談了半天。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大雨中穿着雨衣，在四川路一帶走着，上面雖有傾盆大雨淋着，我們還是談笑自若，便走便談，愈談愈有味。

我那時因爲急於歸還學費，每次領薪水的時候，留下自用的錢總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幾角錢，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賺得比我多，到了這種時候，他往往自動地一定要把五塊錢的鈔票塞在我的衣袋裏，强要借給我用。

我離開紗布交易所之後，他還在那裏做他的會計科科長。一時失却了我，使

他感到懊喪萬狀。後來我們雖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還是暢談幾小時。當我籌備結婚的時候，他也離開了紗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時在做標金生意，想多弄得幾個錢帶出去。他知道我婚費還有問題，慨然代出二百元湊在他一起做一次標金生意，不料運道不好，完全蝕光。他又慨然說，我的費用來源不易，一定不要我還這二百元，所蝕的由他負責付出。雖經我再三婉却，他還是不許。他對於朋友的慷慨義俠，往往如此。

他還未赴美，忽於一個夏天患時疫，上午還是活潑潑的，下午就死在時疫醫院裏。我知道了好像聽到晴天霹靂，淚如泉湧，急奔到屍前大哭一場，已不能和他再談一句話了。失却了這樣的一個好友，實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損失。

一五　三星期的練習

初出茅廬的第一砲似乎就放得不響！

當然，我對於所做的事還不肯馬虎。即如每天所譯的紗市電訊，我對於其中的數目字都特別謹慎，總是很仔細地和原稿對一遍才放手發出去，因爲我知道這些數目字在我看來雖毫無關係，在做生意的人們看來，錯了一個數目字也許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末立刻辭職不幹，否則在職一日，當然要盡我一日的職守。

我對於自己的職務不肯一絲一毫的撒爛汚，但同時却不願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這時紗布交易所裏有一個高級職員自恃他是所裏的某要人的親戚，對一般同事常表現他的盛氣凌人的侮慢的音容。各人對他雖積恨在心，但都敢怒而不敢

言，尤其是和我同辦公室的那位長着兩撇八字鬚的中文祕書，常受他的閒氣。有一天他也來向我嘗試嘗試，用很不客氣的口吻『命令』我寫一封英文信，我也立刻板起面孔，嚴肅着嗓子，回敬他一個打擊：『你不要那樣神氣活現！我不是你個人的英文祕書！我不寫！』他還想爭辯，我再敬他一個打擊：『你不配和我多說，有理儘可逕向理事長或理事會報告！』他才怒氣冲冲地跑開。他一出了我的辦公室，那位中文祕書就樂得起跳，急急地宣傳了出去，各同事都爲之歡騰，那位充滿着正義感的好友余天棟，立刻跑進來欣欣然和我大握其手，大道其賀！

我老等着那個自恃有靠山的職員『借刀殺人』，來打破我的飯碗，但是等了好幾天，並沒有什麼動靜，才知道他原是一個欺軟怕硬的東西！從此以後，他固然不敢再來惹我，就是對於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稍爲小心了。但是他雖然不能打破我的飯碗，我自己却很想打破這個飯碗！我是靠自食其力的人，要打破這個舊飯碗，不得不先找新飯碗，所以我在這個時候的問題是怎樣找個新飯碗。

我很想進新聞界，所以我的注意又先轉到這方面來。當時張竹平先生正在做申報的經理，我因爲他是約翰同學，便藉着這個關係去找他。我表示要進新聞界服務的意思，托他替我留意相當的機會。他很誠懇，據說對我在學校時的成績也很知道，先拿一件近兩萬字的英文文件叫我翻譯。我很賣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時間內譯好送去，他看後表示滿意，送我二十塊錢稿費，同時叫我再等機會。

不久張先生又來叫我去。他說在申報館裏暫時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幫忙，叫我幫幫他的忙，不過說明只是以私人的資格去幫他的忙，還不算是正式職員。我答應了，每天在下午六點後，離開了交易所的辦公室，便忽忽跑到他那裏去。我們兩人同在申報館樓上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裏，在我的小桌上擺着一架英文打字機，他的辦公桌上七橫八豎地堆着不少待覆的英文函件。依我所記得，那些信件的內容大概都是關於廣告方面說服外國公司兜生意的，或是因爲買報紙和外國紙張公司辦交涉的。他把答應的大意告訴我，由我就在打字機上翻成英文。他對於

英文的寫作雖不很高明，但是對於英文寫作的辨別力却很强。他辦事那樣認眞的態度，實在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教訓。你替他寫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寫出來，而且要用很有表示力的字句寫出來，否則寫好了他還是一定要你重新寫過。你只要有一句寫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寫過一張。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訴你之後，你一面在打字機上的的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裏踱着方步，仍在轉着他對於復信的念頭。有時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禿頭，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過！最尷尬的是有時你的全信剛要打好，他忽然抓着頭想出了什麽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過！他對於某一件要答復的事情，總是要在這件事情上轉盡了念頭：要說明的意思，總要說得一絲一毫不漏；如果是駁復的話，總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開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點鐘，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機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後一行的時候，總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禿頭的朋友！每夜這樣工作了幾小時，走出申報館門口的時

候，總是筋疲力盡，好像生了一場大病剛好似的。

這樣幹了三個星期，把堆積的英文信件清理之後，才告一段落。當時我得到多少金錢的酬報，現在已不記得，但是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練習生，學得辦事的認真態度，却是無價之寶，雖則我以為辦理信件的時候，尤其是叫人打英文信件的時候，轉念頭最好仔仔細細地總轉一下，不要零零碎碎地轉。

後來張先生拉我加入時事新報，這三星期的練習也許也是一種有力的媒介。

一六　新飯碗問題

『練習生』雖做了三星期，『新飯碗』問題還是未能解決。整個的『新飯碗』一時雖未找到，零碎的小事却接踵而來。有一位比我前一級畢業的約翰同學在上海青年會中學担任教務主任，有一級的英文教員被學生驅走，尤其是因為在那一級裏有三四個『吵客』，弄得那位英文教員不得不知難而退。這位約翰同學不知從那裏聽到我的教授法可以鎮壓『學潮』，趕快來和我商量，要我去暫行代庖；為我的便利起見，他特把功課的時間分排在午飯後的一小時，不致妨礙到我在交易所的辦公時間。其實我這時只做過家庭教師，對於學校的正式教課並沒有過實際的經驗。但是因為他的要求非常迫切，我也還有時間湊

湊，便答應他試試看，並說明是嘗試性質，如果上了一兩課，學生略有不服的表示，我就不來。他答應了這個條件，我才接受他的要求。

我這次試驗的結論，覺得學校之所以有學潮，除有特殊的複雜情形之外，教師自己的不行實在是主要的原因，不能完全怪學生。我在這裏並不是要替自己瞎吹，表示自己是怎樣『行』的好教師：我在上面已老實承認過，我此時對於學校的正式教課還是毫無經驗的。可是我去代替那位被驅逐的教師，却也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很認眞地把自己所教的功課準備好，上課的時候使學生們對於所提出的疑問得到滿意的解釋；等到大家沒有問題可問的時候，就對學生加以考問，被問的人愈多愈好，使全課堂都有着緊張的空氣；問的時候，要隨手在一個小簿子上把各人答案的成績，用符號記錄下來，這樣使學生們知道你是在深切注意各人的平日成績，不是可以含糊過去的；尤其是對於著名做『吵客』的幾位學生，要每課都要問到，這倒不是有意和他們爲難，却是使他們的精神材力轉到研究學問方

面去，不過問的時候却要在考問各人的當中隨意問到他們，不可使他們誤會是有意和他們爲難；同時在課堂裏要睜開眼睛時刻注意望到全課堂的各角落，使各人都知道你的注意力是在顧到全課堂的秩序，『吵客』們便沒有機會在課堂上瞎吵了。在這樣注意力籠罩下的課堂，偶有一二『吵客』搗亂，如向同學擲紙丸之類的惡作劇，教師只須立刻對他注目，甚至把功課暫行擱置幾秒鐘對他注目，全課堂的同學都會移轉視線對他望望，竟可以使他面紅耳赤，感到不安，沒有人更願效尤了。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教師自己對於功課能夠力求勝任愉快，其餘的問題都比較易於解決了。

以前那位英文教員每課一句句用中文講給學生聽，學生不必自己預備，不必用工夫找字典，對他還是不滿意；我漸漸使學生自己預備功課，找字典，上課用英語考問，學生不但不討厭，不反對，反而表示歡迎，在學期末了，反而向教務主任要求叫我連任下去。（雖到後來我因離開交易所，另就他業，時間上難於兼

顧，沒有回報他們的好意。）以我當時那樣沒有經驗的英文敎師，和驅逐敎員的學生們周旋，還有這樣意外的結果，可見製造學潮的責任不得不歸功於敎員自己的「飯桶」！

每星期三四小時的功課，這不能成爲整個的「新飯碗」，所以我還不能不設法解決我的「新飯碗」問題。

新聞界方面一時既沒有相當的機會給我嘗試，我在中學校裏敎英文又有相當的好印象，於是覺得倘若敎育界方面能有相當的機會做做看，也頗想再試試「走曲線」的就業策略。主意打定之後，便向這條路線進攻。我想起敎育界前輩黃任之先生。我知道他是南洋公學的師範生，那時候還是蔡子民先生當敎員，後來的南洋公學在那時還只有一個雛形，我要和他認先後同學，當然是遠得很。我和黃先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還在南洋附屬小學做小學生。記得那時他剛由美國考察回來，有一晚南洋學會請他到上院大禮堂向全體同學演講，小學的最高兩級由沈

叔達先生領導着去參加聽講，我也夾在這人羣中聽他演講遊美的感想。當然，那時我認識他，他並不認識我。此後一直到我想要掉飯碗的時候，和他未曾再見過面，交情當然更說不上，可是我仍舊大着膽寫一封信去試試看。事有湊巧，那時黃先生所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正在物色一個中英文都有相當可取的編輯人材，我的『新飯碗』的機會居然到來了。

一七　編譯的教訓

我寫給黃先生的信去了之後，他便約我去談了一次，並向我取去了幾本約翰聲。這是約翰出版的月刊，我在約翰就學時候的中英文的作品，在這裏面都可以看到一部分。後來他曾經向穆先生和當時在申報館營業部服務的一個約翰同學調查我的為人。他們的回答是對我有了好評。不久黃先生便根據他的考察研究，決定請我到中華職業教育社去担任編輯股主任。黃先生請我去是煞費苦心的。以當時職教社的經濟力量，只能請我担任半天的職務，因為只能出六十元的月薪，我的學費債務還未理清，這是不夠我的需要的。他答應還有半天，另想辦法。這時附屬於江蘇省教育會裏面有個科學名詞審查會，由沈信卿先生和兪鳳賓醫師主持

其事，需要一個人編輯已審查過的各科名詞。黃先生便介紹我替該會做半天的工作，由此略得補助。所以我上半天替職教社編譯職業教育叢書，下半天替科學名詞審查會編輯各科名詞；幸而辦公的地方都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會所裏面，所以還算便利。

編輯各科名詞，聽起來似乎頗爲堂皇，其實却只是一種非常機械的呆板的工作。各科的名詞草案是已經用鉛字印好，訂成小冊子，用橫排的方式，依次列着英德法日文以及中文的譯名，不過先後的次序還未依照字母排好。所謂編輯的工作，不過先把這冊子裏的名詞裁成字條，分成順序，一條一條的貼入一本空白的紙簿上，以備排印。這工作顯然是很機械呆板的，只是要多費些時間罷了。我一時沒有別的較有意義的事做，也只好接受下來，幸而還有半天的編輯叢書職務，比較還可以調劑調劑。就是這種機械呆板的工作，我既已接受下來，却也認眞地幹。例如字母的前後不要弄錯，各條的名詞裁下之後，貼時不要有所遺漏，半天

的工作不要有間斷。

我辭去交易所的職務，並不是爲着編輯名詞的事，却是爲着另外半天的編輯叢書的事情較有意義。當時我在職教社所主持的事有兩種：一種是職教社所出版的月刊，名叫教育與職業，還有一種便是編輯職業教育叢書。此外每半年編寫一册關於中國職業教育的英文小册子，寄往各國教育機關作宣傳之用。爲着要編譯職業教育叢書，我替職教社定購了關於這方面的英文參考書幾十種。我記得第一本編譯的書是職業智能測驗，以賈伯門博士（Dr. Chapman）著的 Trade Test 做主要的根據。編譯專書，這在我是破題兒第一遭，但是就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我這時只譯過一本杜威著的民治與教育，對於編譯書還沒有過什麽經驗。我只依據着英文書的內容和順序，依樣畫葫蘆似的把它翻成中文，用足勁兒譯成了三萬多字，給黃先生看看。在我自問是很賣力的了，可是黃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譯文，跑到我的棹旁，對我所編譯的文字作誠懇而嚴格的批評。他所指出的要

點是我們編譯這本書的時候，不要忘却我們的重要的對象——中國的讀者。我們要處處顧到讀者的理解力，顧到讀者的心理，顧到讀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寫成的東西在編法和措辭方面都依照英文原著，合於英美人胃口的編法和措辭，未必即合於中國讀者的胃口。我在那剎那間好像背上澆了一大盆的冷水；老實說一句，覺得一肚子的不高興，尤其是因爲很努力地編譯了三萬多字。但是黃先生的話却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導青年時候那種心平氣和輕聲解釋的誠懇態度，使我發不出脾氣。我接受了他的批評，從頭寫過，寫完了一萬字就給他看，並把全書的綱要也寫出來給他看。這一次的結果和上次同樣地出於意外，雖則是在兩極端的相反。他看後大稱讚，不但他自己欣賞，立刻還交給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勵。

我應該老實承認，我對於職業教育並沒有怎樣濃厚的興趣。（這當然不是說職業教育的不重要，也不是說我看不起職業教育，我只是就我自己的工作興趣說

罷了。）可是黃先生給我的這個教訓，却很有益於我以後的著作方法，很有助於我以後辦刋物時的技術。所以我特把這件事提出來談談。我認為這是有志著述的人們最要注意的一個原則：在寫作的時候，不要忘記了你的讀者。

一八　英文教員

我在紗布交易所做英文祕書大概不到半年，這一段時期是我在職業界裏最煩悶的時候。穆先生待我很好，優禮有加，但是這個英文祕書的職務是有名無實，所以我在那幾個月簡直如坐針氈。我找到了職教社的新飯碗，便拋棄了這個舊飯碗。我向穆先生提出辭職還不到幾天，人還未離開，交易所忽因節省開支起見，裁了一大批人員，有名無實的英文祕書當然也在內。我說『當然』，因爲如果我做理事會的當局，也覺得這一個職位可裁。但是有一點却使我自幸的，由於我一向不願居於有名無實的這個職位，皇皇然找新飯碗，總算安然改業，否則也許還有一段青黃不接的失業時期，而在『由手到嘴』的我，失業却是一個很困難的問

題。

我覺得我們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這並不是要包辦或有所要挾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盡我們的心力把職務上應做的事，（這裏指的當然是有益人羣的事，不是殘害人羣的事，）做得盡量的好，使人感到你確能稱職，爲着這個職務起見，不肯讓你走開，或至少覺得你的走開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同時我又深信有名無實的事情終於不能長久的。誠然，像紗布交易所的英文祕書，並不是我不把英文祕書的職務做好，卻是在事實上沒有什麽事——合於這個職位的事——可做。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被裁撤，是一件毫無足怪的事情。

我的新飯碗仍然只有一半是名符其實的事情：那就是半天替職教社編輯月刊和叢書。還有半天不是沒有事做，可是不能稱爲什麽編輯。在這個時候，有一段時期，因爲平海瀾先生創辦海瀾英文專門學校，離我的辦公處不遠，每星期被他拉去教兩三小時的書，課程是英文文學和英文地理，教的時間都排在我的辦公時

間以外的時間，有的在清早，有的在午飯後。這是零星的『外快』工作，算是幫幫朋友的忙。

大概過了一年光景，當時在中華職業學校担任校長的顧蔭亭先生正在物色一個英文教員，想到了我。剛巧我所『貼』的科學名詞也可以告一段落，於是便接受了他的聘請。從那時起，每日上半天便在中華職業學校教英文，並兼該校的英文教務主任；下半天，仍在職教社主持編輯股的事務。夜裏是用來預備教課，修改卷子，和自己閱看書報等等。

我在加入時事新報館以前，對於教書的這個職務却有着不少的緣分。其中陸陸續續的教書生活，在上面已談過了一些。自從兼任中華職業學校的英文教員，一兼就兼了七八年之久，直到加入時事新報館爲止。最初請我去的是顧先生，後來經過的校長還有黃伯樵和潘仰堯兩先生。我始終要感謝這幾位先生的，是他們肯優容我這樣一個『硬漢』的英文教員幹了許多年。我覺得隨便換一個別的不是

以教務爲前提而只以營私植黨爲得計的校長，我老早就要滾蛋的。

中華職業學校在當時只有兩科，商科和鐵工科。商科對於英文的課程特別注重些，約等於高中的程度。英文教員大概有四五個。英文教務主任的職責是要排列課程，分配鐘點，選定課本，協助教員解決問題等等。這種職責，大概都是在開學和學期終了的時候特別忙些，平日主要地還是執行我的教書職務。講到教英文，我對於這件事的興趣比『貼』名詞好得多了。因爲興趣比較的好，所以雖在每天上午要教三四小時，忙而不甚覺其苦。而且在英文教授法方面，自信還不無一些可取之處。現在有些朋友或是職校畢業的同學，談起我當時的英文教授法，還大加謬獎，我聽了雖覺慚愧，但是在當時卻費了一番工夫。現在雖脫離了教書的生涯，回念前塵，有如隔世，而且在這許多年來，從事教英文的先生們，對於教授法一定有了很大的進步，原用不着我再來獻醜，但是仍想乘此機會貢獻一些我的意見，也許可給有意研究英文的朋友們做參攷。

我在這裏要把英文當做『學問的工具』看，注重應用方面。我們學英文，原可有兩種目的：一種是把英文做研究其他學問的工具；一種是把英文本身就作爲文學的研究。我不是英文文學家，也不過把英文看作工具用，所以只能談談前一種。

一九　外國文和外國教師

教外國文的教師，最理想的當然是外國人。例如教法文請法國人，教英文請英國人或美國人。（英國人的英文和美國人的英文也有差異，尤其是口頭語，雖則它們是彼此看得懂聽得懂的。）這倒不是我要盲目地崇拜外國人，却有我的理由。

試以英文爲例。學習英文者所學的技能不外三種：說、看、寫。教英文的人所應該教好的也是說、看、寫。先講『說』。教『說』的人先要自己說得好；要說得好，最起碼的條件是要：（一）發音正確，（二）成語適當。無論發音或成語，都要很自然。這就一般說，只有這語言的本國人才可以無憾，雖則在極少數

的別國人也有例外。依我們尋常的觀察，往往湖北人有湖北口音的英文，江西人有江西口音的英文。（這只是隨便舉例，並不是說湖北或江西人就學不好英文，下例同。）即就更小的區域說，也往往無錫有無錫口音的英文，甯波有甯波口音的英文。我曾在上海看見一個甯波籍的英文教員，雖教了多年的英文，對於教授法不無心得，但說的却是滿口甯波音的英文，我就很替他的學生們担心！這並不是說只是中國有這樣的情形；英國人說法語，或俄國人說英語，也常有相類的毛病。以他們彼此間的文字相類，還不免有這樣的毛病，那末以特異於西洋各國文字的中國，中國人可告無愧了。可是無論如何，教英文的人如把『走樣』的英文或語音輾轉教給學生去學習，這却是一件很不妥當的事情。例如一個滿口甯波音英文的那位朋友，他自己勉強可應用這樣『走樣』的英語，在需要英語的場所，勉强可以達出他所說的意思，這於他當然比『走樣』英語都不懂的好些，可是要把他的『走樣』的英語教給學生，以誤傳誤，那就是很難恕諒的另一回事了。

講到成語，有些人的腦裏不是沒有若干成語，但是用起來，架牀叠屋，拖泥帶水，如由那種語言的本國人用來，就不是這樣的。倘竟大胆把這類『走樣用法』敎給學生，也很顯然是不妥當的事情。我就親見一個留美學生用這樣『走樣用法』敎他的學生。學生的耳朶平日熟於這種『走樣用法』的浸潤薰陶，英文是永遠學不好的，至少要用很大的工夫才能糾正過來，這是一件多麽不經濟的不幸的事情？

看的能力和寫的能力的嚴格訓練，尤其是後者，要獲得『自然』的良果，那也只有請外國人做外國文敎師，最爲妥當。

敎會學校誠然有不少的流弊，但是關於這一點，卽用外國敎師敎外國文，却不無它的優點。就是在外國敎師敎外國文的情况之下，還不免有人在所學的英文中保留着他的鄉音；如果儘由夾着中國鄉音的英文敎師以誤傳誤，那下去要更糟嗎？

有些人到外國去留學，却未先把那個外國的文字弄通，到了外國才開始補習那國的文字。這在經濟上固然很不合算，但是有件事實却是無可疑的，那就是在外國環境中，由外國教師教外國文，在效率上確有「事半功倍」的優點。這是在國外求學，對外國文的研究特別注意的人所共同感覺得到的。在德國補習德文，或在法國補習法文，進步的速率，不是在別的地方所能比擬的。這雖不是人人辦得到，但那一國文字最好請那一國人來做教師，却是比較適宜的辦法。

不過就中國的情形說，要各校的外國文都請外國教師教，在經濟上也許是不可能的。既是在事實上不可能，我竟說了一大堆的話，不是辭費嗎？却也不然。我所以特別鄭重先把這一點提出來，是要特別注重英文教學法的根本問題。倘若教英文的人，不得已而求諸中國人，即由本國人教外國文，對於這一門課程的知識技能，也須努力有充分的修養，也須努力求得和外國教師差不多，否則便不免要『誤人子弟』！

二〇　一個基本原則

我以爲做英文教師的都須懂些語音學(Phonectics)，不是要用來教學生，却是教師自己要用來作爲一種重要的參考材料。有了這種參考，關於發音正確方面，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就是你的音本來正確，再懂些語音學，於教授的時候也有很大的益處。所以我做英文教員的時候，對於語音學是有過相當的注意，雖則我只是用來使我的英文教學增加效率，並沒有意思要做什麼語音學專家。

此外關於英文教學法方面，我有個很簡單而却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則，那就是在英文課堂裏，要用全部分的時間使學生聽的是英文，講的是英文，看的當然也是英文；非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一個中文字都不講。(所謂萬不得已的時候，

也許有時遇着一個名詞，用中文解釋一下最容易明白，但也只可說一次，不宜多說。）這個原則也許有人覺得不必，甚至有人覺得中國人何以不許說中國話？固然，我們有時在電車裏，（尤其是在上海這樣的地方，）聽見中國人和中國人談話，拋棄本國話不用，却用起外國語來，好像要以此驕人似的，這是最可厭惡的卑鄙的心理。但是不要忘却的是我們在這裏所指的地方是在英文課堂裏，更不要忘却我們在英文課堂裏是要盡量用最好的法子達到我們學習英文的目的；爲着這個特殊的目的，在這樣特殊的地方（指英文課堂），必須應用這個原則：教師和學生都須用全部分的時間來講英文，聽英文。我在教英文的時候，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要使我的學生明白這個原則，相信這個原則。我很鄭重地告訴他們：倘若他們不明白這個原則，不相信這個原則，他們不必來上我的英文課，因爲他們的英文就很少進步的希望。尤其是從一九二六年，中國革命高潮發生以後，有些青年發生誤解，把仇視帝國主義的心理也應用到仇視外國文方面來；一方面雖到

課堂去學習外國文，一方面卻滿不高興地在課堂裏聽外國語，講外國語，所以我更要在開始教他們英文的時候，消除他們的這種誤解。我對他們指出：如果他們不能消除這種誤解，就索性不要學習外國文，否則便是糟塌時間和精力。如果遇着學生的英文程度較淺的一級，我上第一課的時候，也要用一小部分的時間，用中文說明這個原則的要旨，使學生們澈底明白，隨後便抱定在英文課堂裏不說中國語的決心。

我很不愉快地說，就是在今日，我們在有些學校裏，還可以看到外國文教師用着二三十年前的老古板的教授法：由教師在課堂裏向學生用中國語逐字逐句逐段講述外國文的課本！在教外國文的課堂上，有着一大半的時間說的是中國話，聽的是中國話！就是那一小半時間裏，學生所聽的外國文，也只是注意中文的意思，對於外國文還是很隔膜的，很生疏的，因爲學習任何外國文都要靠返復多次的練習，不是聽用中文逐句講一下就能收效的；而這種練習，——說的練習，聽

的練習，乃至看的練習——都要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做的，雖則教師是處於領導，糾正，推動，和鼓勵的地位。

談到這裏，諸君也許要發生一個疑問：學生的英文程度已經有些根底的，對於教師的英語誠然可以了解，但是初學的學生怎樣就聽得懂呢？

這個問題確是值得注意的。但是這個問題可用直接教授法來解決。這並不是我發明的方法，只是採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罷了。這個方法說來也沒有什麼希奇，簡單的內容，只是用英文教英文，不用中文教英文。因爲初學的學生不能立刻聽得懂，所以一定要先從實物入手，從可見的行動入手。教師要把實物帶到課堂裏去，拿什麼給學生看的時候，就把什麼名詞說給學生聽，同時叫學生隨着你說；隨後你可以做相當的行動給他們看，同時把這種行動的說法說給學生聽，並叫學生隨着你說。先從身體，身上可見的一切，課堂內可見的一切，學校內可見的一切，慢慢兒推到一般社會的事物。先由教師幫助學生練習得爛熟，用種種問句和

答語練習得爛熟，然後叫他們翻開書本來看。他們看書的時候，對於其中的意義和讀音已經爛熟了，所注意的只是拼法和寫法罷了，用不着敎師再用中文來解釋英文了。這種敎授法，在敎師方面，當然比依樣畫葫蘆地講一遍——用中文講一遍——來得吃力，但是在學生方面却可以得到較大的益處。

二一　進一步的研究

上次所談過的直接教授法，只是對初學而言，略進一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訓練學生用英文字典。最好是要用英文註解的字典，至少也要用中英文註解的字典，這樣不但可以得到正確的意義，而且也可於無意中多學得幾個生字。況且教師用的既是直接教授法，在課堂裏是不許用中文回答，學生亦非用英文註解的字典不可。用英文字典的方法很簡單，（對於註音的符號和重讀的方法要叫學生注意，）重要的是在用得熟，用得慣；要能用得熟用得慣，全在乎多『用』。要使學生勤用字典，只須使學生養成自己預備功課的習慣。像那樣用中文講解的老古板教授法，學生便無須勤用英文字典了。我們要知道，教師的重要責任是要訓練

學生養成獨立研究的精神和能力，並不是僅僅在課堂裏敎了一些課本上的東西就算了事的。就英文一科而說，要訓練學生養成獨立研究英文的精神和能力，勤用英文字典的習慣是絕對必要的。所以英文敎師應於每次上課的時候，指定下一次的功課；開始的時候，所指定的頁數可以少一些，漸漸的可以增加。學生在下次上課以前，自己就要利用字典把所指定的功課預備好。他們在預備的時候，不但要把每個生字的意義弄明白，而且要把全課的意思弄淸楚，——要弄到上課的時候，闔着書能用英語把要點說出來。這和訓練看的能力是很有關係的。依我敎學的經驗，最初就用直接敎授法敎的學生，訓練他們這樣自己預備書，可以毫無困難。如果學生在開始時就受了用中文講解的遺毒，這方法便比較地有些困難，用的時候便不可過於求速；例如在開始的時候，所指定的功課頁數要特別的少，慢慢地一點點增加起來，否則使學生過於感覺困難，反而容易破壞他們對於研究的興趣，消失他們前進的勇氣。

要使學生在上課前自己預備所指定的功課，這原是一種很平常的方法，不過因爲到現在我國學校裏還有許多仍死守着用中文講解英文的老辦法，所以仍值得提出來說一下。

其次便要談到上課時教師考問學生的事情。教師問的時候，應該也把自己的書關攏來，這樣公平的態度，可以給學生一個很好的印象。問的時候，對每個學生不要問得太多，每次要在可能範圍內使越多學生問到越好；這樣一來，學生知道不易躲避，大家都要用心預備。但也不可問得太少；如果每人只問一兩句簡單的話，容易使預備好的學生覺得表現太少，不易引起興趣。教師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問句是好英文，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學生答語的結構。他要知道這個時候不但是問讀本，同時也就是訓練會話，糾正發音和語調，研究文法的結構：在這種種方面都要顧到教育的效用。教師每次對於各個學生考問的結果，都要在簿子上記下來，使學生知道教師是在很認眞地記載他們的成績。

除考問之外，還要勻出一部分時間，叫幾個學生各讀一段，聽聽他們的讀法對不對；並叫幾個學生分析一段書的文法結構。我教英文，對於文法的鐘點是向來主張要減少的，特別注意在讀本中研究文法。這樣研究文法，才是活的實際的研究法。學生在讀物中能夠明白每句每段的結構，文法上的死法則不記得，那是毫無關係的；而且有許多結構上的巧妙，不是文法書所能包括，也只有在讀物中才能看到。

除上面所說的幾點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教師每一次要把書裏的最有用的生字和成語特別指出，用筆劃出來，並叫學生也要用筆劃出來。這事的注意，對於學生的英文生字和成語的增富，有着很大的關係。有許多學生在寫作的時候不是沒有意思要發表，却是因爲生字和成語不夠用。這種困難的克服，沒有別的什麼巧妙，唯一的辦法，只有努力『積蓄』最有用的生字和成語。（字句和段落的結構法，同時也要顧到。）『積蓄』不能僅由硬記隔離開的生字和成語，尤其重

要的是要徹底明白怎樣運用的方法，所以必須注意研究上下文的意思。學生知道運用這種研究法之後，他們即在自看課外的讀物，重復幾次遇着同樣或同類的成語，也知道特別注意，把它「積蓄」起來。

關於考問學生對於成語的「積蓄」，我常常用筆試；每星期至少有一兩次，每次只出十個題目，只費學生一刻鐘，所以多試並不妨礙正課的進行。筆試的時候，是抽取書裏最有用的句子，讀着令學生默寫，把成語空出，叫他們自己把所知道的塡寫進去。每次各人的筆試成績，教師也要在簿子上記載下來。

教師每次收去的筆試考卷，只要在錯誤處用紅筆劃出，第二次上課時交還學生自己改正後再交進來。這樣可使學生對於所錯的成語得到更深刻的印象，將來用的時候不易再錯。

二二 寫作中的『積蓄』

上兩次所談過的是關於英文的說和看的方面，現在要談談怎樣訓練學生的寫的能力。

寫的能力當然和看的能力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我已經說過，中國學生不是沒有意思發表，往往苦於所習的英文生字和成語不夠用；要補這個缺憾，只有在看的時候注意『積蓄』最有用的生字和成語。可是僅在看的時候『積蓄』還不夠，還要訓練他們在寫的時候也要下『積蓄』的工夫。這又怎麼說呢？需要相當的解釋。

學生們所用的讀本的內容，大概不外乎故事或傳記之類，並且是分章的。每

遇學生讀完一章的時候，我就叫他們各人在課外預備一篇短文，把那章的內容要點，用自己的結構，重新寫出來。這種短文的長短，可根據原文的長短和學生的能力而酌定下來。開始的時候，可限學生寫兩頁或三頁，以後可略爲增加。這短文當然不可和書上的原文一樣長；那樣，學生便沒有運用自己重組能力的餘地，所以要比原文短，使學生要用一番思考和選擇。這短文的內容要能盡量包括原文的全部要點；如果學生只是隨便鈔錄一段，那是要不得的。這短文既比原文短，又須包括原文全部分的要點，所以學生儘管用着原文裏的許多生字和成語，却並不能把原文照鈔下來。但是因爲要用着原文裏的許多生字和成語，便在寫的裏面也包含着『積蓄』的功用。當然，有些學生在課外還自己看些英文的書報，如果他看得有心得，也另有些生字和成語運用在這短文裏面，只須是用得好，也是可以的。這種地方，做教師的也可以鼓勵學生的自動研究的精神。

初學英文寫作的學生，通常往往因爲所有的生字和成語不夠用，文法的知識

也不夠用，而教師的英文題目卻擺在他的眼前，他爲交卷計，不得不瞎寫一陣；生字和成語固然用得一塌糊塗，大半都是『獨出心裁』，只就他所有的中文的語句，『揑造』成不中不英的語句來塞責，文法也是亂七八糟的。教師看了只有皺眉，改不勝改，叫苦連天，大怪學生的不行，不知道學生也不是願意自己這樣不行，無奈腦裏『空空如也』，『行』不出何！用上面所說的那樣辦法，學生寫的時候，有書裏的原文做參考，文法不會錯，就是有也極少，辭意的表現也不必求助於『揑造』的不中不英的語句了。

這種短文須學生於課外自己預備好，然後在課堂上寫出來。他們在課堂上寫的時候，可以看原書，但是不許看自己所預備的稿子。這理由很簡單。學生在外面的時候，也許因爲自己的程度差一些，要請教請教比較高明的同學，甚至難免有一兩次請人代寫，（雖則這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在最初的時候，在事實上也許不能完全沒有，）本人也不得不用心，把這短文原稿的意義和結構弄清楚，記清

楚，否則在課堂上既不許看原稿，也仍然是寫不出的。學生在課堂上寫的時候，所以許他們翻閱原書，這倒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我覺得只是給學生一些便利，使他們不要感到過分的困難，對原稿不必用死記的工夫。學生覺得既有原書可以做參考，在精神上也似乎可以減少過於緊張的苦痛。他們在課堂上寫的時候，不但可以帶原書做參考，還可以帶字典到課堂上來用。

學生這樣開始練習寫作，不但於他們大有益處，就是做教師的看卷子，也可以減少許多麻煩或甚至於苦痛！教師改卷子的時候，只須把不妥當的地方，（無論是字的不妥，或是文法的不妥，）用紅筆劃出，下次上課時發還學生，叫他們自己在課外改好後再交進來。有的學生需要發還三次，修改三次。爲鼓勵起見，教師在第一次發還給學生的卷子上都要依成績的優劣，註明ABC等的等次，並另在簿子上記下來；第二次的修改也要把成績記下來。每次全體文卷這樣結束之後，教師還應把這次各文卷裏所犯的較大的錯誤，在課堂上提出來解釋或討論。

這樣寫作每做若干次後，可用一次來出一個學生所熟悉和有經驗可以表現的題目，讓學生自由（即不必根據書本）做一次文章，成績一定是有相當可觀的。

二三　一種有趣味的工作

我因爲做過七八年的英文教員，便囉囉嗦嗦地講了一大堆關於英文的教授法或研究法，但這不是什麼英文教授法的書，我就把這件事告一結束吧。倘若這裏有些意思可供給諸君研究外國文的參考，那就算是沒有白說的了。

我這七八年的英文教員都是兼職，還有一半的時間仍在職教社裏做我的編輯的工作。所以自我出了學校以來，除最初的半年時間做着『有名無實』的英文祕書之外，可以說一直到現在沒有和編輯的生涯間斷過關係。編輯的職務是最合於我的個性，關於這方面，以後再談，現在請再談談關於教員的職務。做教員，在我也可說是一種有趣味的工作。我尤其感覺愉快的，是可由這樣和天眞的青年接

觸。我覺得青年都是可愛的，雖則有時也有一兩個使你感到不舒服，但是仔細想來，他自身也有特殊的原因而不能任咎的，像我將要談到的一個低能學生，便可做個例證。講到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只須教員教得認眞，教得好，賞罰公平，青年學生沒有不敬愛教員的。

做教員在我既是一種有趣味的工作，我爲什麼後來不幹呢？這裏面至少也有兩個理由。一個是我的性太急，看見學生有時答不出，或是錯誤多了一些，我很容易生氣，對於這種學生，我易於疾言厲色，似乎予人以難堪，事後往往懊悔，第二次遇着同樣情形時仍不免再犯這個毛病；這樣容易生氣不但覺得對不住我的學生，對於我自己的健康也有損害。我覺得忍耐性也是做教師的應有的特性，我的忍耐性——至少在教學方面——太缺乏，因此我覺得自己還不十分適宜於做教員。第二個原因是：因爲經濟的關係，教員的鐘點太多，夜裏缺乏自己看書的時間。我每日上半天要教三四時的功課，這還不打緊，但課外應該爲着學生做的工

作還是很多，修改考卷和文卷就要費了很多的時間，都不得不在夜裏做。這樣一來，除了全天的緊張工作外，夜裏的時間也是不自由的，自己看書固然沒有了時間，一遇着有應酬，或其他的臨時事情，往往不得不『開夜車』。因爲有着這兩個缺憾，所以我不得不拋棄教員的生活。

當然，我不是想拋棄就立刻拋棄，因爲這不是我的經濟能力所許。我一面要留心更適宜的機會，一面對於我的職責仍然是要很認眞地做去的。因爲我對於我的職責要認眞，所以我對於我的職權也不得不認眞。關於這一點，我還記得有一件事可以談談。我有一年在所教的商科三年級裏遇着一個低能學生。他在別科的成績怎樣，我不知道，但至少關於英文這一科，他所表現的是低能兒。我平日對於學生的成績都有很詳細的紀錄。平日紀錄好的學生，在大考的時候儘可放心，因爲就是在大考的時候不幸考得不好，無論如何也不會不及格的。而且我對於分數的計算也不願斤斤較量，差幾分分數我都認爲應該通融，因爲分數這東西本來

只能表現個大概。這個學生的平日成績總結算起來不過十分（六十分及格），大考的成績不過五分，這相差實在是太遠了。這樣的學生怎樣能升到三年級，在我已莫名其妙。後來仔細打聽一下，才知道他的父親是有着相當大勢力的。他做着某教育會的幹事，對這個學校的董事們都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做的是英文教員，所知道的是英文的成績怎樣，不知道學生背後的『勢力』的大小。他補考後仍得到不上十分的成績。我對此事的辦法是決定他不能升級。這個決定居然引起了一個軒然大波！這位自信有勢力的『父親』跑到校長那裏去大辦交涉，他的理由是我對他的兒子有成見。我把平日的紀錄給校長看，校長沒有話說。我並向校長聲明，如果這樣的學生可以升級，我要立刻提出辭職不幹，請他另請高明。校長被他纏繞得沒有辦法，老實說這是某某（指我）的職權，你可以和他去交涉。他不敢來和我交涉，却直接跑到兩個校董那裏去糟塌我，幸而那兩位校董平日知道我在校裏教學的情形，竟給他一頓教訓！我倒不怪這個學生，因爲他並非不肯用

功，無奈他的那個『父親』給他一種先天低能的『禮物』，這並不是他自己所能負責的。後來聽說他的那個很有錢的『父親』，已出鉅資送他的這個兒子出洋留學去了！

這件事所以使我不能忘的，是我經過了一番堅持的鬥爭。校長終於沒有屈服於有「勢力」的學生家長，而犧牲我的職務，這一點是值得稱讚的。

二四　現實的教訓

我半天教書，半天編輯。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編輯叢書，這在前面已經談過了。前後大概替職教社編譯了半打以上的叢書，都由商務出版。我自問對於職業教育並沒有什麼心得，這幾本書只是我在職務上不得不交的卷子罷了！可是在這段時期裏有一件事頗有一談的價值的，那是參加職業指導運動。當時劉湛恩先生帶着博士銜頭從美國回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裏研究過職業教育，職教社請他來幫忙，組織了一個職業指導股，由他來担任主任，由我用着副主任的名義襄助進行。我們共同發起了職業指導運動，接洽各校（中學）舉行職業指導運動週。在這一週裏叫學生塡註我們特備的職業指導表，按日請專家演講。最後由我們和

青年作個別談話。在職業指導的原理方面，由職教社同人如黃任之，楊衞玉，劉湛恩，以及客串莊澤宣諸先生等担任，我自己也夾在裏面湊熱鬧。關於專門的各部門，如各專業的指導，便就各地請各該業的專家參加。因這件事，我和楊衞玉先生還跑了好幾省的地方，在各處都接洽若干中學舉行職業指導運動週。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乘着這個機會和各地的青年談話，並到各處觀察觀察社會的情形。最後我還和莊澤宣先生各人根據在各處提倡職業指導的實況，編著了兩本書，加入職業教育叢書裏面去。可是說來也許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職業指導，愈在實際方面幫着職業指導吶喊，愈使我深刻地感覺到在現狀下職業指導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想跳出職業指導的工作！這裏面的理由說來也很簡單。職業指導和教育指導是分不開的，在中國的現狀下，進小學校還要經過競爭考試；中學以上的學校，你要學什麼，不見得就有你所要進的學校，就是有，好的不易考，壞的不願進，此外還有經濟問題也不是空言指導所能解決的。職業指導和現實社會的職業狀況

當然更是分不開。在中國的現狀下，誰都看出職業界是一團糟，有許多地方用人並不根據眞正的材能，只靠背後的勢力怎樣，或是位置私人；有許多地方受着不景氣的影響，雖想用人而不敢用：結果除少數例外，往往不免所用非所學，甚至於出了學校便須立卽加入失業的隊伍裏去！在這樣的狀況下，我雖不敢說職業指導一點沒有用處，但是不得不承認所受的限制實在太多太大了！

說句好笑的話，我在這時期裏參加了職業指導運動，對於青年究竟有着什麼實際的效果，我實在不敢說，可是對於我自己確有着很重要的「指導」作用！什麼「指導」作用呢？使我從這裏面感到慚愧，感到苦悶，感到我的思想應該由原來的「牛角尖」裏面轉出來！換句話說，這現實的教訓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轉變！

我一方面在意識上雖有這樣的覺悟，一方面對於我的職業指導的職務——我當時的一部分職務——仍然是很認眞地幹着。但是這個「幹」只是「職務」上的事情，只是「毋忝職守」的「道德」在後面推動着，並不能喚起我的興會淋漓的

精神，並不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這事業裏面。

但是能使我幹得興會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裏面的事業，竟漸漸地到來，雖則只是漸漸地到來。這是什麼呢？這是民國十四年十月間創辦的生活週刊！

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週刊並不是由我創辦的。當時職教社原有一種月刊叫做教育與職業，專發表或討論關於職業教育的種種問題，但是該社同人覺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時間上相隔得比較的久一些，只宜於發表理論或有系統的長篇事實；為傳布職業教育的消息起見，有創辦一種週刊的必要：這是最初創辦生活週刊的意旨。這和以後的生活週刊的內容雖差得遠，但最初創辦時的意旨確是不過這樣。這時它的意旨既是這樣，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載各報上搜集下來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除這種消息外，頭上有一短篇數百字的評論，隨着有一兩篇一兩千字的論文。生活這兩個字的名稱是楊衞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筆公推新

由美國學銀行學回國的王志莘先生担任。主筆的每月薪水只是四十元，在王先生當時也不過是一種兼職，他原是職教社的一位老同事，初回國後時間略閒，所以來帮帮忙。其餘同人輪流帮着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過輪流帮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二五　一幕悲喜劇

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第一件雖是關於個人的私事，但是也脫不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運動以後的動向，打倒『吃人的禮教』，也是其中的一個支流，男女青年對於婚姻的自由權都提出大胆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談，甚至相信理想的社會必須開始於理想的家庭！我在當時也是這許多青年裏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類的影響，於是我的婚姻問題也隨着發生過一次的波瀾。

我的父親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裏混着，他們因自己的友誼深厚，便把兒女結成了『秦晉之好』，那時我雖在學校時代，五四運動的前奏還未開幕，對於這件事只有着糊裏糊塗的態度。後來經過五四的洗禮後，對這件事才提出抗議。

我的未婚妻葉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詩禮之家』的『閨女』，吟詩讀禮，工於針黹，但却未進過學校。這雖不是沒有教育的女子，但在當時的心理，沒有進過學校已經是第一個不滿意的事實，況且從來未見過面，未談過話，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約，那又是第二個不滿意的事實。但是經我提出抗議之後，完全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毫不相干的兩方家長固然大不答應，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着『詩禮之家』的訓誨，表示情願爲着我而終身不嫁。於是這件事便成了僵局。但是因爲我的求學費用，全由我自己設法維持，家裏在經濟上無從加我以制裁，無法干涉我的行動。在兩方不相下的形勢裏面，這件事便擱了起來。直到我離開學校加

入職業界以後，這件事還是擱着。但是我每想到有個女子爲着我而終身不嫁，於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只是個時代的犧牲者，我再堅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犧牲而已，因此雖堅持了幾年，終於自動地收回了我的抗議。

我任事兩三年後，還淸了求學時的債務，多下了幾百塊錢，便完全爲着自己的結婚，用得精光。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費用完全由自己担任，沒有給任何方面以絲毫的牽累。家屬不必說，就是親友們，我也不收一文的禮。婚禮用的是茶點，這原也很平常，不過想起當時的『維新』心理，却也有可笑處。行禮的時候新郎要演說，那隨他去演說好了，又要勉强新娘也須演說；這在她却是個難題，但是因爲遷就我，也只得勉强說幾句話；這幾句話的臨時敷衍，却在事前給她以好幾天的心事。這也罷了，又要勉强岳父也須演說。這在男子原不是一個很難的題目，可是因爲我的岳父是百分的老實人，生平就未曾演說過，他自問實在沒有在數百人面前開口說話的勇氣，但是也因爲要遷就我，也只得勉强說幾句

話。他在行禮前的幾天，就每天手上拿着一張紙，上面寫着幾十個字的短無可短的演說詞，在房裏踱着方步朗誦着，好像小學生似的『實習』了好幾天。可是在行禮那天，他立起來的時候，已忘記得乾乾淨淨，勉强說了三兩句答謝的話就坐了下來！我現在談起當時的這段情形，不但絲毫不敢怪我的岳父，而且很怪我自己。他老人家爲着他的自命『維新』的女婿的苛求，簡直是『鞠躬盡瘁』地遷就我。我現在想來，眞不得不謝謝他的盛情厚意，至少是推他愛女的心理而寬容了我。我現在想來，當時不該把這樣的難題給他和他的女兒做。

結婚後，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她的天性本來非常篤厚，尤其是對於她的母親。我們結婚不到兩年，她便以傷寒症去世了。她死了之後，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一想起她，就淚如泉湧地痛哭着。她死後的那幾個月，我簡直是發了狂，獨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處，在靈前對她哭訴！我生平不知道什麼叫做鬼，但是在那時候——在情感那樣激動的時候——並無暇加以理解，竟那樣發瘋

似的常常跑到她的靈前哭着訴着。我知道她活的時候是異常重視我的，但是經我屢次的哭訴，固然得不到什麼回答，即在夜裏也沒有給我什麼夢。——老實說，我在那時候，實在希望她能在夢裏來和我談談，告訴我她的近況！這種發瘋的情形，實在是被她待我過厚所感動而出於無法自禁的。我在那個時候的生活，簡直完全沈浸於情感的激動中，幾於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二六　一年的練習

民國十六年，張竹平先生接辦時事新報，他自己担任董事長，拉我去担任祕書主任。當時張先生對於時事新報抱着很大的希望，拉的人很不少，總經理由潘公弼先生担任，總主筆由陳布雷先生担任。張先生僅主持大計，我和潘先生都全日在館辦公，我們兩人在一間辦公室裏。潘先生當時在新聞界已有了十幾年的經驗，我和他相處一年，在學習方面得到不少的益處。我以前曾經談過在申報館裏『練習』了三星期，我在時事新報館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義的『練習』的時期。我常覺得我的這一年的『練習』，比進什麼大學的新聞科都來得切實，來得更有益處。

時事新報館的事情既需要全天的工夫，於是我決定把英文教員的職務完全辭掉。生活週刊辦了一年多之後，已漸漸發達起來，在事實上全個半天都用在這個刊物上面。到了這個時候，因爲時事新報館需要全天，我便和職教社商量，把在職教社的半天工夫移到夜裏來，於是我開始天天做夜工。

白天在時事新報館做的事情，給我一個很好的『練習』的機會，因爲我的工作幾乎包括全報館的內容。我的職責是祕書主任，除編輯部的通信稿外，全館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辦公桌上。關於全館各部的來信，都先經我閱看，除應由總經理辦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辦外，其餘的文件便都由我註明辦法，分送給各部去辦，各部根據情形，分別起草復信的底稿後，仍彙送到我的辦公桌上，由我核定後繕發。其中遇着要和總經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後決定辦法。這樣一來，我和全館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當的接觸，所以我說這個職責給我以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對於新聞業經驗的豐富。他對於

新聞業的種種方面都很熟悉，因爲他都經歷過的。他在編輯方面，由校對到總編輯和總主筆，都幹過；在營業方面，他也幹過種種職務。因爲他對於各部分的工作內容都有透澈的了解，所以他解决各部分問題的時候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在人生觀方面，政治的和社會的思想方面，雖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對於他的辦事的經驗，處理問題時的鎮定安詳，對人接物的恰當，都應該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時期內。

依我在當時所觀察，潘先生處理事務有一個特長，那就是他用堅决的態度解决職務上的當前的各問題，一點都不着急，一點沒有疾言厲色。任何同事進來和他商量什麼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爭辯，他總是對事對人根據他的見解作堅决的應付，很從容不迫地作堅决的應付，無論如何，總是始終和和氣氣的，從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我是個性急朋友，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學不到他。我也明白，應付事情，或應付人，只須根據所决定的辦法作沈着的應付就是了，只須能把事

情或人應付得了，何必要發脾氣？發脾氣只是一種無補於事的耗費，徒然惱了自己，難塏了別人！原來沒有職權解決某事或某人的人，發脾氣無用；已有職權解決某事或某人的人，發脾氣不必。但是這種涵養的工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張竹平先生應付事務的精明詳密，我在申報館『練習』三星期的時候，已領過他的教了。在時事新報館的一年間，更有充分的時間來領略他的精明詳密。可是他對於我是不得不失望的。這倒不是因爲我撒了他的爛汚，也不是我對於秘書主任沒有盡職，却是因爲他對於我的希望沒有達到。他似乎很有意要把我造成一個英文廣告員。這英文廣告員的本領是要能在各洋行大板遊說，接洽；已登的人家肯增加廣告費，未登的人家肯來登。我因爲不願就辜負他的一番厚望，也曾經努力過幾次，其中也有幾家成功過，但是我每次一看見那像理人不理人的搭足臭架子的洋鬼子的臭臉，就引起了我的一萬分的精神上的苦痛。我甯願餓死，不願和這類東西敷衍，因此竟無法引起我的自動的興趣來。要我勉强做一個英文廣

告員，比要我勉強做一個工程師還要難過十萬倍，雖則這兩種職業的性質是迥然不同的。

不久因為生活週刊的突飛猛進，需要我的全部分的時間，便自動地辭了時事新報館的職務，由此也和英文廣告員的苦痛永訣了！

二七 聚精會神的工作

現在請再回轉來談談生活週刊。

關於生活週刊，我在萍蹤寄語初集裏也略爲談到，也許諸君已知道大概了。這個週刊最初創辦的時候，它的意旨和後來的很不相同，只是要傳播傳播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罷了。當時我對於這件事並不感到什麼興趣，甚至並不覺得這週刊有什麼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後來會發生那樣密切的關係。在事實上當時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創辦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銀行任事，沒有時間兼顧，職教社因爲我原担任着編輯股主任的事情，便把這個週刊的編輯責任丟在我的身上。我因爲職務的關係，只得把它接受下來。當我接辦的時候，它的每期印

數約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贈送的居多，所以這個數量並不算多。我接辦之後，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並在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於編製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所謂『有趣味有價值』，是當時生活週刊最注重的一個標語。空論是最沒有趣味的，『雅俗共賞』的是有趣味的事實。這些事實，最初我是從各種英文的刊物裏搜得的。當時一則因爲文化界的幫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則因爲稿費幾等於零，職教社同人也各忙於各人原有的職務，往往由我一個人唱獨脚戲。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個不同的筆名，把某類的文字『派』給某個筆名去担任！例如關於傳記的由甲筆名專任，關於修養的由乙筆名專任，關於健康的由丙筆名專任，關於討論的由丁筆名專任，關於小品文的由戊筆名專任，以次類推。簡單說來，每個筆名都養成一個特殊的性格。這倒不是我的萬能，因爲我只努力於收集合於各個性格的材料，有許多是由各種英文刊物裏搜得的。搜求的時候，却須有相當的判

斷力，要眞能切合於讀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後，要用很暢達簡潔而雋永的文筆譯述出來。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據的譯文，只是把各種相關聯的材料，經過一番的消化和組織而造成的。材料的內容，僅有『有趣味』的事實還不夠，同時還須『有價值』。所謂『有價值』，是必須使人看了在『進德修業』上得到多少的『靈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却是我每週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爲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這一欄也最受讀者的注意；後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說，他們每遇着社會上發生一個轟動的事件或問題，就期待着看這一欄的文字。其次是信箱裏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會神的一種工作。我不敢說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樣好，但是我却盡了我的心力，有時並代爲請教我認爲可以請教的朋友們。

除了『唱獨脚戲』的材料外，職敎社的幾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幫忙。在這個初期裏，畢雲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關於國外的通訊，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

士，美國方面有李公樸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兩三年間的情形。

我對於搜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爲一體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認爲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樂得好像哥崙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只須是好的我都要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面，我只知道週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週刊在這階段的內容，現在看來顯然有着很多的缺點，不過我所指出的是當時的這種工作已引起了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動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幹着。同時還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開始了他對於本刊事業的興趣。我接辦本刊後，徐先生就用全力幫助我主持本刊營業的事務，他和我一樣地

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於本刊的事業。孫夢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時間加入努力，後來漸漸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時間。最初經常替生活週刊努力的職員就只是這三個人。

二八 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週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贊助！生活週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贊助』所造成的搖籃裏長大起來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裏，在幾盞懸掛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面，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念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繫着，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着！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麼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面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爲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面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爲我所不懂的，或爲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爲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爲鵠的，至少能使它

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講到這裏，我還要附帶謝謝當時承印我們這個週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裏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週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却有直接答復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復；直接寄去的答復，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却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只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週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捨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牀舖搬到辦公室裏面去！』其實後來縱然『

把牀舖搬到辦公室裏面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爲着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

但是生活週刊的發展是隨着本身經濟力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職員方面不得不慢慢兒來，因此事務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週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面：一方面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面是廣告費的收入隨着銷數的增加而增加。我們既沒有什麼大宗的經費，事業的規模不得不看這兩方面的收入做進行的根據，因爲我們是要量入爲出的；但是我們所欣幸的，是我們可以盡量運用我們在這兩方面的收入，擴充我們的事業，沒有什麼『老板』在後面剝削我們。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教社。當時生活週刊還在職教社的『栟㠓』之下，我和徐孫諸先生都只是雇員，原沒有支配的全權，但是職教社當局的諸先生全把這件事看作文化事業，一點沒有從中取利的意思。

二九　轉變

生活週刊所以能發展到後來的規模，其中固然有着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盡量運用本刊自身在經濟上的收入，——盡量運用這收入於自身事業的擴充與充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在上次已經略爲談過了。所以能辦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教社在經濟上的不干涉。但是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謝職教社的，是生活週刊經我接辦了以後，不但由我全權主持，而且隨我個人思想的進展而進展，職教社一點也不加以干涉。當時的生活週刊還是附屬於職教社的，職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權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唯一辦法只有以去就爭的一途，爭不過，只有滾蛋而已。但是職教社諸先生對我

始終信任，始終寬容，始終不加以絲毫的干涉。就這一點說，生活週刊對於社會如果不無一些貢獻的話，我不敢居功，我應該歸功於職敎社當局的諸先生。

生活週刊初期的內容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這還不出於敎育的範圍；同時並注意於職業修養的商討，這也還算不出於職業指導或職業敎育的範圍。在這個最初的傾向之下，這週刊附屬於職敎社，還算是過得去的。也許是由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週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面痛擊；雖則我們自始就不注重於個人，只重於嚴厲評論已公開的事實，但是事實是人做出來的，而且往往是有勢力的人做出來的；因嚴厲評論事實而開罪和事實有關的個人，這是難於避免的。職敎社的主要職責是在提倡職業敎育，本來是無須捲入這種漩渦裏面去的，雖職敎社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却開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着密切的聯繫，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

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週刊應着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裏，學到這裏，除在前進的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皇皇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志，後半期的生活週刊的新的進展也漸漸開始了。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多少是含着衝鋒性的，職教社顯然也無須捲入這種漩渦裏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職教社諸先生深知這個週刊在社會上確有它的效用，不妨讓牠分道揚鑣向前幹去，允許它獨立，由生活週刊社的同人組成合作社，繼續努力。在這種地方，我們不得不敬佩職教社諸先生眼光的遠大，識見的超卓，態度的光明。

生活週刊社以及由它所脫胎的文化機關，都是合作社的性質；關於這一點，我在萍踪寄語初集裏面也曾經略有說明，在這裏不想重述了。回想我和幾位『患難同事』開始為文化事業努力到現在，我們的確只是以有機會為社會幹些有意義

的事為快慰，從沒有想要從這裏面取得什麼個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順便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上有些人的觀念，看到什麼事業辦得似乎有些像樣，便想到辦的人一定發了什麼財！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紅，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說你已成了『資本家』，或誣蔑你括了多少錢！他們不管在我們的合作社裏，社員最大的股款不得過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沒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話），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這是可以造成什麼『資本家』或括錢的機關嗎？我和一班共同努力於文化事業的朋友們，苦幹了十幾年，大家還是靠薪水餬口養家。我們並不覺得什麼不滿意，我們的興趣都在文化事業的本身。像我這樣苦幹了十幾年，所以能得到許多朋友們不顧艱難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夠始終得到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們的信任，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始終未曾為着自己打算，始終未曾夢想替自己括一些什麼。不但我這樣，凡是和我共同努力於文化事業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的。

三〇　幾個原則

現在有些朋友想起辦刊物，往往連想到生活週刊。其實生活週刊以及它的姊妹刊新生，大衆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們的特殊時代的需要，都各有它們的特點。歷史既不是重復，供應各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糧食，當然也不該重復。但是抽象的原則，也許還有可以提出來談談的價值，也許可以供給有意辦刊物的朋友們一些參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的精神。尾巴主義是成功的仇敵。刊物的內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趨』，那是刊物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刊物便無所謂個性或特色；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更

沒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個性或特色，非有創造的精神不可。試以生活週刊做個例。它的內容並非模倣任何人的，作風和編製也極力『獨出心裁』，不願模倣別人已有的成例。單張的時候有單張時的特殊格式；訂本的時候也有訂本時的特殊格式。往往因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倣得多了，更竭盡心力，想出更新穎的格式來。單張的格式被人模倣得多了，便計劃改為訂本的格式；訂本的格式被人模倣得多了，便計劃添加畫報。就是畫報的格式和編製，也屢有變化。我們每看到一種新刊物，只要看到它的格式樣樣模倣着別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

其次是內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週刊，每星期就要見面一次，更貴精而不貴多，要使讀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處，每篇看完了都覺得時間並不是白費的。要辦到這一點，不但內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動最經濟的筆法寫出來。要使兩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義，敵得過別人的兩三萬字的作品。寫這樣文章的人，必須把所要寫的內容，澈底明瞭，澈底消化，然後用敏銳活潑的組織和生動雋永的語

句，一揮而就。這樣的文章給與讀者的益處顯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讀者省下了許多搜討和研究的時間，省下了許多看長文的費腦筋的時間，而得到某問題或某部門重要知識的精髓。

再其次，要顧到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在這裏所談的，是關於推進大衆文化的刋物（尤其是週刋），而不是過於專門性的刋物。過於專門性的刋物，只要顧到它那特殊部門的讀者的需要就行了；關於推進大衆文化的刋物，便須顧到一般大衆讀者的需要。一般大衆讀者的需要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不當用機械的看法，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規定出來。要用敏銳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衆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這是主持大衆刋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

最後我覺得『獨脚戲』可以應付的時代過去了。現在要辦刋物，卽是開始的時候，也必須有若干基本的同志作經常的協助。『基本』和『經常』，在這裏有

相當重要的意義。現在的雜誌界似乎有一種對讀者不很有利的現象：新的雜誌儘管好像雨後春筍，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們大名的這幾個。在東一個雜誌上你遇見他，在西一個雜誌上你也遇見他。甚至有些作家因爲對於催稿的人無法拒絕，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頭換面』做着兩篇或兩篇以上的文章，同時登在幾個雜誌上。這樣勉强的辦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讀者也是莫大的損失，是很可惋惜的。所以我認爲非有若干『基本』的朋友作『經常』的協助，便不該貿貿然創辦一個新的雜誌。當然，倘若一個作家有着極豐富的材料，雖同時替幾個雜誌做文章，並沒有像上面所說的那樣虛耗讀者的精力和時間的流弊，那末他儘管『大量生產』，我們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還有初辦刋物的人，往往着急於銷路的不易推廣。當然，發行的技術和計劃也是刋物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方面也應加以相當的注意。但是根本還是在刋物的內容。內容如果眞能使讀者感到滿意，或至少有着相當的滿意，

推廣的前途是不足慮的。否則推廣方面愈用工夫，結果反而愈糟，因爲讀者感覺到宣傳的名不符實，一看之後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礙了未來的推廣的效能。

三一　社會的信用

生活週刊突飛猛進之後，時時立在時代的前線，獲得國內外數十萬讀者好友的熱烈的贊助和深摯的友誼，於是所受環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參加蔡子民宋慶齡諸先生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不久以後，便不得不暫離我所愛的職務而作歐洲之遊。在這時候的情形，以及後來在各國的狀況，讀者諸君可在萍踪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裏面看到大概。我於前年九月初由美回國，剛好環遊了地球一周，關於在美幾個月考察所得，都記在萍踪憶語裏面，在這裏不想多說了。回國後主辦大衆生活，反映全國救亡的高潮，現在有大衆集留下了這高潮的影象。隨後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這在本書在香港的經歷一文裏可見一斑。自九一八國難

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面盡量運用我的筆桿，爲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一面也盡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十幾年來在輿論界困知勉行的我，時刻感念的是許多指導我的師友，許多贊助我的同人，無量數的同情我的讀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認爲報答這樣的深情厚惠於萬一的途徑，是要把在社會上所護得的信用，完全用在爲大衆謀福利的方面去。我深刻地知道，社會上所給我的信用，絕對不是我個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以及無量數的讀者好友，直接間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說，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只是我的信用，也是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乃至無量數的讀者好友所共有的。我應該盡善地運用這種信用，這不只是對我自己應負的責任，也是對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乃至對無量數的讀者好友所應負的責任。

我這信用絕對不爲着我個人自己的私的目的而用，也不被任何個人或任何黨派爲着私的目的所利用，我這信用只許爲大衆而用。在現階段，我所常常考慮的

是：怎樣把我所有的能力和信用運用於抗敵救亡的工作？

我生平沒有私仇，但是因爲現實的社會既有光明和黑暗兩方面，你要立於光明方面，黑暗方面往往要中傷你。中傷的最容易的辦法，是破壞你在社會上的信用。要破壞你在社會上的信用，最常見的方法是在金錢方面造你的謠言。

我主持任何機關，經手任何公款，對於賬目都特別謹愼；無論如何，必須請會計師查賬，得到證書。這固然是服務於公共機關者應有的職責，是很尋常的事情，本來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這裏所以還順便提起的，因爲要談到社會上有些中傷的造謠陰謀，也許可供處世者避免陷害的參考。

也許諸君裏面有許多人還記得，在馬占山將軍爲抗敵救國血戰嫩江的時候，生活週刊除在言論上大聲疾呼，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外，並承國內外讀者的踴躍輸將，爭先恐後地把捐款交給本刊彙齊匯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粵東女子』特捐所得遺產二萬五千元，親交給我收轉。這樣愛國的熱誠和信任我們的深摯，使我們得

到很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週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匯捐款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洩不通，其中往往有賣菜的小販和挑担的村夫，在櫃台上伸手交着幾隻角子，或幾塊大洋，使人看着發生深深的感動，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同事幾於全體動員，收款的收款，算帳的算帳，忙得不得了，爲着急於算清以便從早匯交前線的戰士，我們往往延長辦公時間到深夜。這次捐款數量達十二萬元，我們不但有細賬，有收據，不但將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後來因人數太多，紙張所貼不資，特在徵信錄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戶，）收據也製版公布，並且由會計師（潘序倫會計師）查賬，認爲無誤，給與證明書公布。這在經手公款的人，手續上可說是應有盡有的了。但是後來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謠言，說我出國視察的費用是從捐款裏括下來的！我前年囘國後，聽到這個消息，特把會計師所給的證明書製版，請律師（陳霆銳律師）再爲登報宣布。但是仍有人故作懷疑的口胳，抹煞這鐵一般的事實！

這樣不顧事實的行爲，顯然是存心要毀壞我在社會上的信用，但是終於因爲我有鐵據足以證明這是毀謗誣蔑，他們徒然「心勞日拙」，並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穩，毀謗誣蔑，是不足畏的。

三二　立場和主張

黑暗勢力的陷害方法，除在經濟方面盡其造謠的能事外，還有一個最簡便的策略，那便是隨便替你戴上帽子！這不是夏天的草帽，也不是冬季的呢帽，却是一頂可以陷你入罪的什麼派什麼黨的帽子！其實戴帽子也不一定是丟臉的事情，有害盡蒼生的黨，有確能爲大衆謀幸福的黨；前者的帽子是怪可恥的，後者的帽子却是很光榮的。但是這不過就一般說，講到我個人的實際情形，一向並未曾想到這個帽子問題；再直截了當地說一句，我向來並未加入任何黨派，我現在還是這樣。我說這句話，並不含有褒貶任何黨派的意味，只是說出一件關於我個人的事實。但是同時却不是說我沒有立場，也不是說我沒有主張。我服務於言論界者

十幾年，當然有我的立場和主張。我的立場是中國大衆的立場；我的主張是自信必能有益於中國大衆的主張。我心目中沒有任何黨派，這並不是輕視任何黨派，只是何黨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須所行的政策在事實上果能不違背中國大衆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擁護；否則我都反對。我自己向來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因爲我這樣看法：我的立場既是大衆的立場，不管任何黨派，只要它眞能站在大衆的立場努力，眞能實行有益大衆的改革，那就無異於我已加入了這個黨了，因爲我在實際上所努力的也就是這個黨所要努力的。

我雖有明確的立場和主張，但是因爲有着這樣的看法，所以向來未曾加入任何黨派。現在呢？現在是整個民族生死存亡萬分急迫的時候，除少數漢奸外，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在掙扎着避免淪入亡國奴的慘刼。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積極提倡民族統一陣線來搶救我們的國家，要全國團結禦侮，一致對外，我更無須加入任何黨派，只須盡我的全力促進民族統一陣線的實現，因爲這是抗敵救亡的唯一有

效的途徑。民族統一陣線或稱聯合陣線，或稱民族陣線，名詞上的差異沒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澈底了解這陣線的意義和它對於抗敵救亡的關係。所謂民族統一陣線是：全國人民，無論什麼階級，無論什麼職業，無論什麼黨派，無論有什麼信仰的人們，都須在抗敵救亡這個大目標下，團結起來，一致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在這個民族陣線之下，全國的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都須集中於抗敵救亡。爲保障民族陣線的最後勝利，凡是可以增加全國力量的種種方面，都須千方百計地聯合起來；凡是可以減少或分散全國力量的種種方面，都須千方百計地消滅或抑制下去。無論任何個人和個人，任何集體和集團，縱然在已往有過什麼深仇宿怨，到了國家民族危亡之禍迫於眉睫的時候，都應該把這深仇宿怨拋棄不顧，聯合彼此的力量來搶救這個垂危瀕亡的國家民族。

這不是空論；這是中國在當前危迫時期內的大衆在主觀方面的急迫要求，也是侵略國的嚴重壓迫和殘酷進攻在客觀方面所造成的需要。這是現階段中國前途

的大勢所趨，我們只須本着這個認識，以國民的立場，各就各的力量，從種種方面促其實現，前途是有絕對勝利的把握的。如有逆着這個大勢而自掘墳墓的，必然要自趨滅亡，絕對不能阻碍這個大勢的推進。我們所要努力的是在積極方面促進這個偉大動運的實現。

再就具體一些說，民族統一陣線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停止一切內戰，全國團結起來，槍口一致對外。武力雖非抗敵救亡的唯一工具，但無疑地是最重要的一種工具。外患如此急迫，中國人如以僅有的武力消耗於內戰，即是減少對外的力量，即是間接增强侵略國加速淪亡中國的力量。為增强整個中國抗敵救亡的實力計，停止一切內戰是有絕對的必要。第二個條件是要解放民衆救國運動。軍力必須和民力配合起來，才有動員全國力量一致對外的可能。所以關於民衆救國的組織和救國言論的自由，必須有切實的開放和保障。

關於民族統一陣線的研究，我在所著的坦白集裏已有較詳的討論，在這裏只

提出尤其重要的話，來說一下。這是我就大衆的立場，根據大衆的利益，斷然認爲是當前抗敵救亡的最重要的主張。只須能盡我的微薄的力量，推進或促成這個主張的實現，任何個人的艱險，是在所不辭的。

當然，我們對於國事的主張是要根據當前的現實，我在這裏所提出的，只是專就抗敵救亡的現階段的中國說。

三三　深夜被捕

我對於國事的立場和主張，已很扼要地談過了。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主張，有許多熱心救國的朋友們也都有這同樣的主張；這不僅是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的主張，我深信這主張也是中國大衆的公意的反映。於是我們便以國民的地位，積極推動政府和全國各方面實行這個救亡的國策。我們自問很坦白，很懇摯，除了救國的赤誠外，毫無其他作用，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和六位朋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和沙千里諸先生——竟於去年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在上海被捕！

在被捕的前兩三天，就有朋友傳來消息，說將有捕我的事實發生，叫我要特

別戒備。我以胸懷坦白，不以爲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這時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慮的只是這個問題。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六點鐘我趕到功德林參加援綏的會議，到會的很多；銀行界，教育界，報界，律師界等等，都有人出席。我於十一點鐘才離會，到家睡覺的時候已在當夜十二點鐘了。我上床後還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論應該做什麼題目，所以到了一點鐘模樣才漸漸睡去。睡得很酣，不料睡到兩點半的時候，忽被後門的兇猛的打門聲和我妻的驚呼聲所驚醒。我在床舖上從睡夢中驚得跳起來，急問什麼事。她還來不及回答，後門打得更兇猛，嘈雜的聲音大叫其趕快開門。我這時記起前兩三天朋友的警告，已明白了他們的來意。我的妻還不知道，因爲我向來不把無稽的謠言——我事前認爲無稽的謠言——告訴她，免她心裏不安。她還跑到後窗口問什麼人。下面不肯說，只是大打其門，狂喊開門。她怕是强盜，主張不開。我說這是巡捕房來的，只得開。我一面說，一面趕緊加上一件外衣，從樓上奔下去

開門。門開後有五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一個法國人，手上拿好手鎗，作準備開放的姿勢。他一進來就向隨來的翻譯問我是什麼人，我告以姓名後，翻譯就告訴他。他表示驚異的樣子，再問一句：『他是×××嗎？』翻譯再問我一句，我說不錯，翻譯再告訴他。他聽後才把手槍放下，語氣和態度都較前和緩得多了。我想他想像中的我也許是個窮兇極惡的强盜相，所以那樣緊張，後來覺得不像，便改變了他的態度。他叫翻譯對我說，要我立刻隨他們到巡捕房裏去。當時天氣很冷，我身上只穿着一套單薄的睡衣，外面罩上一件寬大的外衣，寒氣襲人，已覺微顫，這樣隨着他們就走，有些忍受不住，因爲翻譯輾轉麻煩，便問那位法國人懂不懂英語，他說懂。我就用英語對他說：『我決不會逃，請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請你上樓看我穿好一同去。』他答應了，幾個人一同上了樓。他們裏面有兩個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來的，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位法國人和翻譯；還有兩個是市政府公安局的偵探。上樓後我問那個法國人有什麼憑證沒有，他拿出

一張巡捕房的職員證給我看。我一面穿衣，一面同那法國人和翻譯談話。談話之後，他們的態度更和善了，表示這只是照公安局的囑咐辦理，在他們却是覺得很抱歉的。那法國人再三叫我多穿上幾件衣服。公安局來的那兩位仁兄在我小書房裏東翻西看，做他們的搜查工作。我那書房雖小，堆滿了不少的書報，他們手忙脚亂地拿了一些信件，印刷品，和我由美國帶回的幾十本小册子。這兩位仁兄裏面有一位面團團的大塊頭，樣子倒很和善，對我表示歉意，說這是公事，沒有辦法，並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在弄口親眼看見你從外面回家，在弄口走下黃包車後，很快地走進來。我想你還不過睡了兩小時吧！』原來那天夜裏，他早就在我住宅弄口探察，看我囘家之後，才通知巡捕房派人同來拘捕的。我問他是不是只拘捕我一個人，他說有好幾個。我想一定有好幾個參加救國運動的朋友們同時遭難了。我心裏尤其懸念着沈鈞儒先生，因爲沈先生六十三歲了，我怕他經不住這種苦頭。我除穿上平常的西裝外，裏面加穿了羊毛絨的裏衣褲，外面罩上一件大

衣，和四位不速之客走出後門。臨走時我安慰了我的妻幾句話，並輕聲叫她於我走後趕緊用電話告知幾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後，公安局的人另外去了，巡捕房的兩個人用着備好的汽車，陪着我乘到盧家灣法巡捕房去。到時已在深夜的三點鐘了。我剛下車，由他們押着走上巡捕房門口的石階的時候，望見已有幾個人押着史良女律師在前面走，離我有十幾步路，我才知道史律師也被捕了。

三四 到捕房

我於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被押解到盧家灣法巡捕房。在捕房門口下了汽車以後，那個法國人和翻譯在我左右擁着走上石階。這時那翻譯不但在旁擁着我，而且用一隻手挾着我的手臂。我向來沒有做過犯人，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心裏想這明明是怕我逃走的樣子，突然發生着奇異的感覺。剛走上石階兩三層，瞥見有兩三個人也挾持着史良女律師在前面走。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婦女旅行裝，上身穿的好像男子西裝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是好像水手穿的廣大褲脚管的褲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我看她的態度很從容，偶然回過臉來，臉上還現着微笑。我們相距約有十步左右。我本想走快幾步湊上去問她沈鈞儒先生是

不是也巳被捕，因爲我心裏時刻担憂着他老先生的安全。可是在我左右挾着我的人看見前面有史女士在走，反而停住我不許走，等了一下，史女士已走遠了，才許我再舉步繼續向前走去。我心裏又想，這大概是因爲犯人需要彼此隔離的。

我被擁至二層樓上政治部的一間辦公室裏。到後卽由那個法國人問話，並由那個同來的翻譯在旁担任譯述。他先問我的姓名年歲和職業，加入了什麽政治團體。我承認我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之一，但是從來沒有加入任何政黨。他問救國會的宗旨，我說是主張抵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我並問他：『假使你們法國也被別國侵略，你立於國民的地位，要不要起來主張抵抗這侵略？』他點頭微笑。談到這裏，他很客氣地說，捕房捕我，不過是應中國公安局的要求。我說我要知道究竟犯了什麽罪？他說中國公安局告我是共產黨！我說我要他們拿出證據來。他一邊問，一邊就筆錄下來。大槪問了半點鐘。他坐在辦公桌的後面問，翻譯坐在辦公桌旁邊譯，我就坐在辦公桌的前面，剛和他相對。問後那個法

國人走了，那個翻譯對我說：『對不住，今天夜裏要請你住住監獄，明天上午八點鐘才送法院。』我默然。他接着說：『不過你們是上等人，我們可以把你送到上等人的監獄裏去，不致和那些齷齪的苦力混在一起。』我仍然沒有什麽話說，只有隨他到樓下去。

他帶我到樓下的另一間辦公室，也許是巡長室吧，裏面有個櫃台，櫃台裏面坐着一個穿制服的法國人（也許是巡長），還有個穿便服的法國人跑出跑進。離櫃台略遠處有個欄杆，這欄杆裏面大概是預備犯人立的地方。他們就叫我立在這欄杆裏面。房門口有安南巡捕守着。我在那裏大概立了一小時左右，有個穿西裝的中國職員押着史律師進來。他們叫她站在櫃台和欄杆之間，我們仍不許談話，只能遠遠地點頭微笑而已。再等一會兒，有一個安南巡捕和一個好像『茶房』模樣的中國人進來。這中國人問我犯什麽罪，我說犯『救國罪』，他也莫名其妙，土頭土腦地走了。這個安南巡捕就開始向我身上搜查，用兩隻手在我衣上摸了一

遍，又伸進各個衣袋裏檢查了一下，然後取出我的裝錢的小皮夾子，取下我西裝領上的釦子，取下我的領帶，取去我的吊襪帶，取下我的手錶，取下我皮鞋上的帶，取下我吊褲子用的吊帶，（吊西裝褲子用的，）取去我縛在裏褲上的帶，取去我不能一刻離的眼鏡！他們對我說這是必須經過的手續，我當然沒有話說，只得聽任他大取而特取！不過最後取到我的近視眼上的眼鏡，却使我感到太不方便了，我就提出抗議，要把眼鏡留住，他們不肯。這時史律師遠望着我那副樣子，她竟臨時做起我的『辯護律師』了，對監視她的那個穿西裝的中國職員說，某先生（指我）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不必這樣搜查，眼鏡也應該讓他留用，並叫他把這個意思轉達給櫃台裏的那個巡長聽。結果沒有達到目的，我的眼鏡當然是照脫下來了，這時只有對着我的臨時『辯護律師』苦笑。我的近視雖不算怎樣厲害，但是沒有了眼鏡，看較遠的東西便有些模糊，舉起步來便有些飄飄欲仙的感覺！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只有暫時做做『仙』罷了！其實我的這位臨時『辯護律師』

自己也吃了苦頭，後來我們同到高三分院的待審室裏，據她說，她那夜身上的褲帶也被取去！她還說着笑話，說幸而她穿的是西裝褲，否則不免有傷風化了！

這種手續大概是預防犯人要暗尋短見吧。但是我們都要留着這有用之身爲救國努力，誰願尋短見呢！

三五　鐵格子後面

我的眼鏡脫去了之後，史律師先被帶出，我再等了好些時候，大概在當夜五點鐘左右，我也被帶了出來，往監獄方面走去。我舉起脚來走的時候，皮鞋總在脚跟升降着，好像什麼升降機似的，怪累贅，才又恍然覺到皮鞋上已沒有了皮鞋帶。這倒也是生平第一次的經驗，因爲自從知道穿皮鞋以來，從來沒有不用皮鞋帶的。這樣一來，皮鞋倒像了拖鞋，所不同的是拖鞋輕便而皮鞋式的拖鞋却怪沈重。下面拖着一雙皮鞋式的拖鞋，上面的兩隻眼睛又缺少了一副眼鏡，拖步出了房門，好像走進了『迷園』，四周都成了朦朧糊塗的世界。往監獄去是要走下樓梯的，更是在糊塗中瞎摸着。幸而挾持我手臂而行的那位中國巡捕倒還殷勤，轉

灣或下梯的時候，總是小心打着招呼幫我的忙。將到監獄門口的時候，不但重遇着史律師，並且看見章乃器先生也來了，看看他的身上，西裝領上的鈕子也沒有了，皮鞋上的帶子也沒有了，他身上也罩着一件呢大衣，脚上也拖着一雙皮鞋式的拖鞋！我們遇見時都不許談話，只能點頭微笑打個靜默的招呼而已。我們會齊了再向前走。走到監獄裏的時候，押解我們的人正和守監的人接洽，我乘隙偷問章先生：『沈先生怎樣？』他回答說：『大概也被捕了！』我聽了默然微歎，那樣冷的深夜，我實在替他老先生担心。我一面心裏這樣想着，一面囚室的門已開了，便被關了進去，鐵格子門下了鎖。

我們三個人分住在三個囚室。我進了囚室之後，雖然已覺得疲乏，却睜開我的好像半瞎了的眼睛，四面仔細瞭望一下，看見這個囚室倒不算小，約有十來尺濶，八九尺深，一大半的地位都被一個大床舖佔去了，床是用木板搭成的，好像小戲台似的，顯然是預備六七個人睡的，雖則這次只是我一個人在裏面。囚室裏

有了這樣大的一個床舖，餘下來的只是一條狹長的走路的地位。在房的一角，地上有個圓硃頭，那大概是預備小便用的。除有一個鐵格子的門，牆的高處還有一個小小的鐵格窗。天花板的中央有着一盞電燈，射出黯淡的光線。床上有一條藍布的被窩。我就把這被窩舖在床沿，把被窩的一頭捲着一部分當枕頭用，便和衣躺在那被窩上面。那段床沿離鐵格子門很近，躺在床上看得見門外的黯淡燈光中有安南巡捕來往梭巡着。在孤寂冷靜中剛剛睡着，不一會見有人來開鐵格子門，把我叫醒，我一跳而起，莫名其妙，巡捕叫我跟着他走，我只得搓搓睡眼跟着走。走出了囚室的鐵門，看見章先生和史律師也一同出去，經過了一個天井，轉了兩個灣，到了另一個監獄，形式和前一個差不多，不過在兩排囚室中間的那個甬道裏裝有火爐。那個便裝的法國人說着簡單的英語，說這裏可以比較溫暖些。我猜想這也許是出於他們的好意，叫我們遷住在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但是我經這樣一遷移，躺在床上卻一夜睡不着。自問心境坦白，並沒有什麼憂慮，但不知

道爲什麼就睡不着。後來直到小窗上透進魚肚白，才朦朧地睡了幾分鐘，忽然又醒了，醒後雖仍躺在床上，從此就睡不着。等一會兒，有個安南巡捕送進兩片麵包，一個鉛碗盛着的熱茶。我看那鉛碗的裏邊似乎積滿了茶垢，沒有喝的勇氣；那兩片麵包倒是新鮮的，我便咬了兩口，但因爲並不想吃，所以就放在床邊。

身上沒有了錶，什麼時候也不知道，不過覺得天亮了好久，八點鐘何以還不肯來！（因爲聽說八點鐘送法院。）後來他們又把我這個『半瞎子』送到政治部的辦公室裏，再經一次和前一夜大同小異的問話。等待問的時候，章先生也在那裏，我們想說一兩句話，立刻被翻譯阻止，只得默然相對。問話的時候，各人是被隔離開的。後來我被帶着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到一個地方去打手印。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手印，最初一念是不勝憤怒，但轉念亡國奴的慘狀更甚於現在的遭遇，爲着參加救國而打手印，算什麼！手印打後，又被帶着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押回監獄裏去。等一會兒又被帶出來，

又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到一個地方去拍照，正面拍了一張，側面又拍一張。又重新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仍被押回監獄裏去。等一會兒又被帶出來，又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到一個地方去量身體，面部手臂等等。又重新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再被押回監獄裏去。等一會兒又被帶出來，又轉了不少上上下下的樓梯，天井和走廊，再幹一番打手印的把戲，據說是再須打一套送到英租界去的。我們是在這一天（廿三日）的下午三點鐘左右被解往法院的。在這時以前，我這個「半瞎子」就拖着沒有帶子的皮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被押來押去。我覺得很有些像做猴戲，我自己被當作一隻猴子玩！我繼續不斷地被押進押出的時候，章先生和史律師也在一起，我們的態度都很從容。

三六　高三分院

廿三日那天從黎明到下午三點鐘，（這時間是當時向旁人探問才知道的，我身上沒有錶，）爲時不能算久，但是在我却好像過了好久的時候，因爲帶着一對『半瞎』的眼睛，拖着一雙沒有帶子的皮鞋，下身穿着一條沒有褲帶常常下落的褰褲，躑躅兜轉了無數次的樓梯，天井，走廊；走廊，天井，樓梯！到了下午三點鐘左右，我又由囚室裏被提了出來，和章先生史女士同被幾個巡捕和法院的法警押到高三分院去。將押出門的時候，史女士先走，我和章先生隨在後面，有個法國人用手銬把我的右手臂和章先生的左手臂套在一起，把鎖鎖上，所以我們兩個人不得不並排走。套手銬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我突然被套上手銬的剎那

間，在腦際所閃過的奇特的感覺，和第一次打手印時一樣，覺得這是使我不勝憤怒的侮辱，但想我所以受到這樣的侮辱是因爲我努力參加救國運動，我應該把這憤怒轉變爲繼續奮鬥的力量。我一面這樣想着，一面昂首挺起胸膛大踏步走——雖則脚上拖着沒有帶子的皮鞋，大踏步是格外費力的。捕房離法院很近，不過離開幾家的路。我們出了捕房的大門，走過一段馬路就到了法院。在馬路上走的時候，前後擁着巡捕和法警，還有外國偵探，路人都停住脚，用奇異的眼光看着我們。我們到法院後，和史女士同到待審室裏面去。往待審室上樓梯的時候，已有親友數十人在旁擁聚着等候我們。我們進了待審室後，我和章先生的手銬被開了鎖，脫了下來。待審室外面還有一個房間連着，那裏有幾個法警是被派來監視我們的，但是他們都已知道我們是爲着主張團結救國而犯罪的，對於我們表示着很懇切的同情，說『你們的意思，做中國人的誰不贊成！』法警室的外面便是走進法庭的走廊，門是常常關着，偶然開一下，便有親友們在外面伸着頭遙望着，可

是我們還不能見面談話。他們送進來一包水果和餅乾，我們三個人這時都覺得餓了，便吃了一些。在這待審室裏，我們三個人都可以隨便談話，各人彼此告訴了前一夜被捕的經過。他們兩位都是在深夜三點鐘左右被捕的。我們三個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都被捕到法捕房來。等一會兒，由外面傳進的消息，說前一夜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沈章王沙四先生於當日上午十點鐘經高二分院開審後，於當天十二點鐘即由各人的律師保了出來。我們聽了，都覺得快慰。正談論間，法警室的門又偶然開了一下，章先生瞥見沈先生在門外笑着舉手向我們招呼，章先生即對我們笑着歡呼：『沈先生來了！沈先生來了！』我趕緊轉眼看時，門又關了，我雖看不見沈先生，但是想到沈先生自己午後才被保出，就不顧勞瘁地跑來看我們，是很可感的。

我們三個人等到四點多鐘才開庭。張志讓和唐豪兩律師代表章先生史女士辯護，孫祖基律師代表我辯護。先由待審室裏提史女士去問，其次提章先生，最後

提到我。出席的除一個審判長，兩個推事，一個檢察官，和一個書記官外，還有一個代表法捕房的律師（中國人）。公安局方面也有一個律師代表出席。我在庭上坦白承認我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之一，因爲我深信參加救國運動既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隱瞞。此外審判長對於我的問話，總結起來不外兩點：一是我和共產黨有無關係；二是我有沒有參加煽動上海日本紗廠罷工。關於第一點，他們所根據的，是我和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共同公開發表的小冊子，名叫團結禦侮的最低條件和要求，和毛澤東批評這個小冊子的公開發布的印刷品。這小冊子裏所主張的是全國團結，一致對外，有原文可按，這裏用不着多說；我們公開發表了主張，誰都可以看，誰都可以批評。檢察官當庭就認爲這不能作爲犯罪的證據。關於第二點，我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濟在日本紗廠裏過牛馬生活、罷工後飢寒交迫的中國同胞！就是和我們毫無個人關係的法捕房律師，也當庭宣稱，捕房政治部曾經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覺得只

是愛國的文字，一點沒有犯罪的證據，所以不允許公安局移提（即引渡）。結果我們三個人都「責付」律師保出，再交鋪保；規定史女士一家鋪保，我和章先生各人須有兩家鋪保。於是我們便於當夜八點鐘左右由律師保了出來。

後來有一位青年好友在他給我的一封信裏，有一段描寫當時的情景：

「自從先生的不幸案件發生後，我僅看過你一面。那就是在這事件發生後的當天晚上。當那特區法庭准予保釋的消息傳出時，鵠立門外靜候審判消息的我們，原來每一個臉上呈現着憂慮與焦急的樣子，頓時變成了欣慰的神情。你就在那數十親友的慶幸歡笑的聲中，走出法庭。我被興奮的情緒激動着，幾乎要流下熱淚來。誰預料到第二天你又再度被押呢？」

「再度被押」的情形，下面再談，且說我出法庭後，就被一部分朋友擁進汽車，直驅覺林去吃晚飯。我這時還帶着「半瞎」的眼睛，拖着沒有帶子的皮鞋，領和領帶也沒有，大家都說我的面孔瘦了好多，面色也憔悴得很，我想這時的形

態也許很像上海人所謂『癟三』了！沈鈞儒先生也趕了來，跑進來一見着就兩手緊握着我的兩臂搖擺，幾乎要把我攬抱起來，笑眯眯地好像驚呼似地叫着我的名字，並對我的面孔仔細打量着。他的那樣熱誠和摯愛的音容，是我永遠不能忘却的。我看着他的那樣滿面煥發着的光彩，活潑潑的舉動，自己竟不免覺得慚愧起來，因爲我自己失眠了一夜，勞頓了一天，這時實在感到疲乏，雖則精神上是怪興奮的。

這夜我回家好好地洗個澡，很舒適地睡了一夜。

三七　再被羈押

廿三日夜裏在覺林的時候，在座中的朋友已經有人聽到消息，說高二分院於當天下午五六點鐘又已簽出拘票拘傳沈先生等四人。大家覺得他們既已「責付」律師保出，儘可隨傳隨到，何必再出拘票呢？所以還在半信半疑中。廿四早七點鐘，我起身後就先打一個電話到沈先生的家裏，探問他的安全，得到的回答是沈先生昨夜剛安睡了一小時，在深夜一點鐘的時候，又被捕房捕去了！隨後又有朋友打電話來通知，說王沙兩先生也於同夜再被拘捕，李先生因睡在朋友家裏，所以未即捕去。隨後又有朋友打電話來，極力勸我避開家裏。我就打電話徵求我的律師的意見。我告訴他，我既由他保出，對他當然要負責，不能隨便走開的，不

過既由律師負責保出，儘可隨傳隨到，現竟隨意拘捕，很可詫異，我想暫行避到朋友家裏去，但是地址要讓他知道，以便他隨時通知，我卽隨時可以出來。他贊成我的意思，於是我便匆匆洗臉，整衣，用早餐，叫了一輛汽車，到一個好友家裏去暫避。我一到了那一個好友的家裏，就接到我妻的電話，說前夜來過的那個大塊頭（公安局的偵探）又在我們的弄口東張西望了！午飯後我的二妹來看我，因爲她聽見我咳嗽，特送一小瓶藥片給我。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我的律師有電話來通知，說法院已定下午四點鐘開庭，叫我三點鐘到他的事務所裏一同去，我答應他照辦。

我們按時到高三分院報到，但因章先生和史女士未到案，延展到當夜十二點鐘才開庭。在開庭前，我被押在法院的法警室，律師和家屬都不得進來談話，我一直在那裏等到當夜十二點鐘。不過我在法警室裏却也不算寂寞；我對幾十個法警弟兄們大開其話匣，說明國難的嚴重和我們的全國團結禦侮的主張，他們都聽

得津津有味，點頭稱是，待我格外好起來了，倒茶的倒茶，讓坐的讓坐！後來我發現其中有幾位還是我的讀者，我們更成了莫逆之交了。

當夜十二點鐘開庭，章先生到了，史女士還是未到。問的答的還是那一套。律師再請求交保，不許。於是我和章先生被幾個法警押送到特區第二監獄裏去羈押。審判長在押單上批明『予以優待』。

這監獄離法院也很近，所以我們也是步行。走進了一個大鐵門，便是監獄所在地了。被帶進了一個辦公室，向例要由職員問幾句話，由他塡寫在簿子上。他問了姓名年歲籍貫後，就問犯的什麼罪，我脫口而出地答道：『救國』，他聽了這兩個字，一點不遲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寫下了這四個字：『危害民國』！使我於哭笑不得中感到幽默的是他那樣熟練的神情。

這個手續完畢之後，經過搜查，再向裏走，經過第二道門的時候，又經過一次問話。那裏有個職員好像對我們演說似的『訓』了一大套話，大意說在裏面不

可以吸香煙，不可以有聚會式的談話，違犯了是要上鐐銬的。他立在一個高高的櫃台裏說，我和章先生立在櫃台外呆呆地聽着。隨後章先生的香煙盒和錢袋等零物交出代存，我沒有什麼東西要交出，我帶着的那副眼鏡也還得架在原處。（這是回家時另換一副的。）我們還在那裏再打一番手印。我們到了這個時候，手印也打得很熟練了，好像在銀行支票上蓋個圖章一樣！伸出手來就是！——

這大概就是『予以優待』吧。他們沒有把我們放進盜犯們的監獄，却關到幼年監獄裏面去。這幼年監獄一進門便是一個小教室，教室的旁邊有四個鐵格子門關住的小囚室。我們兩個人被帶到第一個囚室的外面，望望裏面約有六七尺寬，十幾尺深。排着一個兩層的小鐵牀，一張小木椅（骨牌櫈）。近小鐵牀一頭的角落裏放着一個馬桶。下層的鐵牀已有一個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請他搬到上層。我和章先生進了後，家裏的被窩已交來，打算睡覺。餘下的鐵牀只有一層，我們兩人之間必須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讓不能決，我從衣袋裏挖出一個小銀

角擲在掌上，用另一掌掩着，說明角子的陽面朝上我睡牀，陰面朝上他睡牀，結果輪着我睡牀，他睡地板。我們睡的問題解決了，隨進來的幾個看守瞥見我的那個銀角子，認為也要交出代存的，我只得隨手把這個碩果僅存的銀角子交給他。

那一夜，我們兩個人很安靜地睡在那個小囚室裏面。

三八　同情和厚意

我不是說過嗎？我和章先生在那個深夜裏被帶到一個小囚室的前面，從鐵格子門望進去，就看見裏面的小鐵牀的下層已睡着一個囚犯。他姓周，是一個政治犯，是一個很可敬愛的青年！他當夜聽見章先生無意中在談話裏叫了我的名字，引起他的注意，知道是我，表示十分的愉快；他原來也是我的一個讀者，我們在精神上已是好友，所以一說穿了，便感到很深的友誼。當我鋪牀預備睡的時候，他看我們兩人裏面有一個要睡地板，再三要把他的那一層牀讓給我們，他自己情願睡地板，經我們再三婉謝，他才勉强照舊睡下去。第二天清早，隔壁的囚室裏就遞過來一封長信，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寫給章先生的。他只聽說章先生來

了，不知道我也來了，所以信裏只急急問起我被捕的情形。他當夜爲着這件事，一夜沒有睡着，偏促着寫了這封長信，充滿着熱烈和摯愛的情緒。他的純潔，誠懇，坦白，激昂，深深地震動了我們的心絃。後來我們見面了，都感到非常的快慰。他當面談了還覺不夠，也許因爲話語還未能盡量傾訴他的衷情吧，又偏促地俯在牀旁寫了一封長信交給我，在信裏很誠懇地安慰我，乃至聽見我還有咳嗽的聲音，（這是那幾天偶然有的，）都使他感到不安，再三叮嚀，叫我要爲國珍重身體。我很慚愧，覺得實在夠不上他的那樣厚望。還有一位同監的十九歲青年，大家都叫他做『八十四號』，因爲他的囚衣的前後寫着 84 兩個大字。他是由鄉村裏來的一個窮孩子，到上海一個煙紙店裏做過打雜；因爲這家店關閉了，他便失業，爲着飢餓所迫，做了一次小偷，被捕進來。他的寫的能力很差，但是也自動地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了幾十個字交給我，雖然像通不通似的，但是對於抗日救國的熱烈和對於我們被捕的義憤，也已躍然紙上。

後來聽到這幾位青年好友的報告，才知道監獄裏許多囚犯都知道有我們這樣兩個人來了，都一致表示憤慨。尤其是令人感動的，是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盜犯，也在一封信裏表示對於國難的關心和對於我們的深切的同情。他雖然用着很粗率的語句敍述他的意見，但是他那一顆火熱般的心是誰看了都要感動的！聽說全監九百餘人爲着援助綏遠前綫抗敵戰士，決定全體絕食一天。

就在這監獄裏的職員方面，也有許多表同情於救國運動，對於我們兩人的被捕，表示深厚的同情。因爲他們有職務上的關係，我在這裏不能詳述了，我只有在這裏附筆表示對於他們厚意的深深的感謝。

同監的青年朋友們待我兩人的殷勤是很可感的。我們的瑣屑的事情，他們都爭着代做。例如早晨倒洗臉水，掃地拖地板，飯後洗碗碟等等。監裏犯人是各有一個號碼的，鐵格子門的外面便插有各人號碼的硬紙片，職員招呼各犯時只叫各人的號碼，不叫各人的名字。我的號碼似乎是二百多號，章先生的號碼二百多

號，現在已記不清了，但是我們的號碼雖記在鐵門上的硬紙片上，都沒有多大用處，因爲同監的幾位青年朋友不但自己一定要叫我們做先生，同時也一定要看守們叫我們做先生，不許叫號碼。他們的那種天眞的熱誠，看着十分可感而又十分有趣！

我們的小小囚室，每日上午七點鐘，由看守把鐵格子門開鎖，讓我們到接連着的小敎室裏去坐坐走走。那小敎室裏排有學校裏用的木椅桌七八排，我們白天就在那裏談話看書。午飯後，別的囚室的鐵門還要關上一小時，各囚犯都要『歸號』，我們兩人因受優待，可以例外。不過到下午四點半，各囚室的鐵門一律都要關上鎖好，一律都要『歸號』，我們也不能例外，因爲白天有個看守監視着，下午四點半後鎖上了鐵門，一夜到天亮，只每隔幾小時有個職員來巡視一次，並沒有看守監視着。因此我們到了下午四點半，也只得同樣地被關在那個小小的囚室裏，倘促在那個鐵格子門的後面。那個小小的囚室，除放着一架兩層的小鐵牀

外，餘下來的區域也只有比放一個小鐵牀的地位差不多，所以我們兩人要在這裏散散步，便要碰來碰去。碰了幾碰，我只得採用折中的辦法，章先生跑來跑去的時候，我就坐在那張骨牌櫈上；他停走的時候，我就跑來跑去。晚上只在外面那個小教室裏有電燈，小囚室裏是沒有燈的。我們跑得厭了，就拿些書挨在鐵格子旁邊去看看。

我們到的第二天，原在我們的囚室裏的周君自動地搬到隔壁一間裏去，所以原來的這一間囚室便只有我和章先生兩個人同住了。在這個監獄裏，（指幼年犯監獄，非全部，）除了幾個幼年犯外，還有兩個原來是監裏的『主任』，犯了罪一同關在這裏面。到了晚上倒也不寂寞。附近的兩個囚室裏的幾個青年朋友睡在床上大開其『辯論會』，你一句，我一句，對於抗日救國問題也討論得很激烈。在這些討論裏，你可以聽到青年們的坦白的天真的意見。同時你可以聽到住在稍遠的那個囚室裏的兩個犯了罪的『主任』大念其佛經，發出喃喃不絕的『南無阿

彌陀佛』的聲浪來。

兩層的小鐵牀上面舖的是木板。床架不是鐵桿做的，只是較厚的鐵片做的，在上層睡的人轉個身的時候，全部的床架都有搖擺的姿態。章先生的身體比我高大，我怕他夢中轉身，『牽動全局』，也許要把鐵牀翻倒，所以讓他睡在下層，我睡在上層。我夜裏在牀上轉身的時候，仍要很謹慎地慢慢地轉，免得床身震得過響，以致驚動他的好夢。

我和章先生從來沒有同住過，想不到一同住就住到這樣一個小小的囚室裏；但是我們想到全獄的朋友們對於我們的同情和厚意，却給與我們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和安慰的情緒。

三九　地方法院

我們在上海特區第二監獄裏關了兩天。到廿六日那一天下午，我們在四點半後照例『歸號』，鐵格子門鎖上了，我們兩人照常在那小囚室裏擁擠着。七點鐘左右，忽有一個看守進來說『接見』。所謂『接見』，是監獄裏允許囚犯接見家屬親友。我們兩人雖覺得那樣晚的時候，怎樣還有『接見』，但是既經說有，我們便忽忽隨他出去。到了外面，才知道是要到法院去開庭的。離開監獄的時候，還照例在簿子上打個大姆指的手印。

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後，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以外的法院）來『移提』。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廿三日和廿四日兩次在高三分院開庭時，公安局

都是要把我們『移提』的，捕房律師因爲沒有犯罪的證據，兩次拒絕『移提』。據說根據上海法租界和中國政府的協定，除中國的司法機關可以無需證據卽可向捕房或特區法院『移提』犯人外，像公安局一類的機關要做這件事，必須拿得出證據才行。因爲這個緣故，他們便設法轉個灣兒，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來『移提』。結果當然是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其實我們所要求的是無罪當庭開釋，至於『移提』不『移提』，並不在意：現在一定要『移提』，『移提』就是了。『移提』的理由據說是『妨碍秩序嫌疑』！

我們在高三分院法庭的時候，地方法院已派了好幾個法警等着，一出法庭，便被他們擁上汽車，往城裏駛去。我和章先生各乘一輛汽車，左右各有兩個法警押着。我們這幾天好像被貓啣着的老鼠東奔西竄似的，原已不足爲奇，我們所覺得不無抱憾的，是沒有機會和同獄的那幾個青年好友握別罷了。

到了地方法院之後，我和章先生被幾個法警押進待審室。待審室有三四個大

房間，用木板隔開的。我和章先生是隔離着的，各人關在一個大房間裏面。房裏四周用木板搭成長櫈，門上有個四方形的洞穴，外面的人可從這個方洞向內望。裏面很陳舊齷齪，我一踏進門口，就覺得尿氣薰鼻，臭不可當。我於詫異間仔細向四周望望，原來房裏擺着一個大馬桶，其大無比，好像尋常人家用的大米桶。等一會兒，有個青年法警跑到方洞口張張望望。我看他很和善的樣子，便和他談了幾句話，知道他們弟兄們都是很窮苦的，每月九塊錢，一切在內，個人還不夠用，養家更不得了。又等一會兒，又有一個人在方洞口張望，輕聲問我是不是某先生，我說是，略談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讀者，在法院裏任職員，正在吃晚飯，聽說我來了，連飯都不吃，特跑來安慰我。他的辦公時間原已完了，因爲我來，一定要等我審完，好好招呼我進了看守所才肯回去。我說他一天辛苦，要回家休息，不必等我。他不肯，直等到一切布置妥當後才肯離開。

約等了半小時模樣，傳審了，審得很簡單，照例由檢察官問姓名，籍貫，年

齡，住址等等之後，問起參加救國會的事，問起救國會的宗旨，問起有沒有參加煽動日本紗廠工潮。審後再押回待審室坐了一些時候，便押往看守所羈押。

總算優待，原來八個人住的一間囚室，經他們撤清打掃之後，由我和章先生兩人同住。房裏有一張大木桌可以放些零物。電燈一盞高高地裝在兩個房間的隔牆上面的方洞裏，夜裏在房裏是看不出什麼的，我們到九點鐘就安排睡覺；怕有臭虫來光顧，特把木榻搬得離牆遠遠的。最使我注意的是在那樣一個小房間裏，也排有待審室裏同樣大的一個大馬桶！第二早起身後，照例打手印，我們這時已打得更熟練了，打出的印子似乎已有了相當的進步！打完了手印，還要一同到天井裏去照一張相片。這張相片照得怪有趣！我和章先生各人坐在一隻骨牌櫈上，列在一排照的；每人坐着，腹前還放着一塊石板，（好像小學生做算學用的，黑色，上面可用粉筆寫字，）我的那塊石板上面寫着雪白的幾個大字是『第三千幾十號某某（區區的名字）妨碍秩序嫌疑』，章先生的那塊石板上面寫的相同，不

過號碼和姓名改一改就是了。我們昂然同坐着照了一張這樣的相片。事後我對章先生說，最好能討得一張取來放大，將來可以高高地懸在客廳裏面，讓許多朋友『瞻仰瞻仰』，倒是一種很好的紀念。

四〇 押在公安局

在上海地方法院的看守所裏只關了一天一夜，廿七日下午六點鐘左右，又像老鼠被猫啣在嘴裏奔竄着，由地方法院轉解到公安局裏去。我們先由看守所裏被提出來，重新光顧待審室一次，不過這時我和章先生兩個人同被押進一間待審室裏去等候着。這時的法警對我們比初來的那天客氣得多，大概他們都知道了我們是爲着參加救國運動才到這裏來的，等一會兒，我們先後被傳審，檢察官雖換了一個，但是問答內容還是上次那同樣的一套。不過這次那位審問我們的檢察官却充滿着同情和歉意，拿出公安局的公文給我們看，裏面說要移提我們去和沈先生等四位「對質」。檢察官宣布之後，我們也沒有什麽話說，走出法庭後，就有「公

安局派來的人員迎上來押着出去。法院裏有幾個職員趕出來和我們握手送別，我們又覺到愛國的同胞們隨處給與我們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無意中和章先生說出了這一句話，在旁邊同走的那位公安局的科員插着說：『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動。』我說：『這倒不是我們幾個個人的人格問題，却是有許多同胞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理的流露！』

我們隨着一羣公安局的偵探，警察，和科員，擁出了法院的門口，分乘汽車直駛公安局而去。

這時沈先生等四位已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我們一進公安局，就被引到他們的房間裏去。我們在患難中相見暢談，當然是格外快慰的，彼此訴說了一番經過的情形，又說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話語。我看看他們所住的房間還算清潔，是在二層樓上，前面有個露台，露台的前面是大天井，立在露台上可以看着公安局的大門；房的後面靠壁處並列排着四個小鐵牀，便是他們四位的牀舖；這一列鐵牀的

前面有個屏風遮着，屏風的外面放着一張圓桌，幾張椅子，便是我們吃飯和相聚談話的地方。我踏進房裏一會兒之後，覺得奇特的是總有一個不相識的人立着或坐在一個角落裏，我已直覺地知道這一定是用來監視我們的；後來知道他確是偵察隊的偵探，奉命來監視的。房前的露台上還有四五個『武裝同志』（警察）在那裏監視着。房的右邊有個客廳，來訪問的人可以在那裏坐坐，由客廳通到外面的那個門是常常鎖好的。我們要大小便的時候，便有一個『武裝同志』跟着我們經過這個門，在廁所門前守着，直等到陪着我們回到原處。

我和章先生兩人的臥室是在這個大房間的左邊一個小房間裏。他們已在幾天前就替我們備好了兩架小鐵牀。自從我們兩人來了之後，又加派了一個偵探來監視。縱然是做偵探，也還是中國人。我們所幹的是救國運動，我們所談的也只是關於抗日救國的事情；我們不但用不着避他們，而且當着他們大談我們對於救國的主張，大討論我們對於救國的意見；偵探們聽了不但不覺得我們是什麼大逆不

道，而且深切地表着同情！他們和我們相聚了幾天，竟變成我們的同情者，甚至覺得每日來監視我們是一種不得已的痛苦的職務。不但偵探們如此，就是那些『武裝同志』也成了我們的朋友！

但是他們對於職務還是不得不奉行故事的。他們不但整日裏要陪着我們，而且整夜都要陪着我們，雖然他們是三四小時輪班一次的。在白天，只有偵探在我們的房裏，到了夜裏，大概因爲露台上寒冷，所以連『武裝同志』都跑到房裏來坐到天亮。這倒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躺在牀上睡的時候，也有一個『文裝同志』（偵探）和幾個『武裝同志』整夜睜着眼睛，一直『侍衛』到天亮！

我們到了三四天之後，有一個夜裏，局裏的第三科科長請我們在客廳裏個別談了一次話，留下了筆錄。他很客氣地問了我們一番話。問和答的內容都和在法院裏那一套差不多，不過特別問起我們和『火花讀書會』有沒有關係。這個名稱我事前根本就沒有聽見過，關係更說不上了。公安局局長幾於每天都來很客氣地

招呼一下。頭幾天准許接見，訪問者非常的多，那個客廳常告客滿，天天好像舉行什麼盛會似的。後來當局有些怕了，除家屬外，禁止接見其他的親友。看報也不自由，每天由他們送來一種他們認爲無關重要的報，有的時候一種也沒有。我們每天的時間却過得很快。上午七點半起身後，同在客廳裏早操。有的打太極拳，有的柔軟體操，各幹各的。早餐後最重要的事是催報看，有時看得到，有時看不到。可以接見的時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見客。後來只許接見家屬，除開六人『討論會』或『談話會』外，有的下圍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書，便很快地過了一天。我們每天所最關心的消息是綏遠抗戰的情形怎麼樣了，其次便是關於我們自己何時釋放出來的消息；有時聽說他們要把我們送往莫干山去，有時聽說他們要把我們送往杭州去，最後幾天聽到的消息是要把我們送往蘇州高等法院去。

四一　高等法院

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一點半的時候，我們剛才吃完午飯，公安局第三科科長跑進來，說立刻要送我們到蘇州高等法院去。我們突然得到這個『立刻』動身的消息，想打個電話給家屬通知一下，免得家人掛念，而且我們裏面還有人要叫家屬送鋪蓋來，但是這位科長說不可以，『立刻』就要動身，不能等候了。我們對於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都有些氣憤，雖則我們都很鎮定。沈先生說『好！走就走！』先去動手整理零物，包捲他的鋪蓋。這樣忽促的把戲，我從來也沒有過經驗，不免又引起我的奇特的感觸，但看見年高德劭的沈先生已在着手捲鋪蓋，我也就抑制着我的憤懣的情緒，動手歸攏零用的東西，包捲我自己的鋪蓋。在忽忽

幾分鐘的時間裏，大家都把行李包捲好了，便打算湊我們的蛋。臨行時公安局局長自己也跑到房裏來打招呼，說他也是臨時才奉到命令，對不起得很，並說他心裏也覺得不好過。我們沒有什麼話說，只謝謝他對於我們的優待。

我們從上海被押解到蘇州，不是由火車，用一輛大汽車（好像公共汽車），有十幾個『武裝同志』和幾個偵探一同坐在裏面，所以把全車坐得滿滿的。公安局第三科科長和其他兩個職員另坐一輛尋常的汽車在後面跟着。我們的『專車』沿着從上海往蘇州的公路走。上車的時候，公安局局長親自送上車，叫『武裝同志』坐到後面去，留出前面的位置讓給我們坐。最後他又向我們一一握手，連說『對不起得很』。

我們和上海暫時告別了！車子向前急駛着，由玻窗向四野張望，感到如此大好河山，竟一天天受着侵略國的積極掠奪，而受着慘酷壓迫的國家還未能一致對外，這是多麼可以痛心的事情！車子行到半路，李公樸先生立起來對同車的『武

裝同志』演講國難的嚴重和我們的全國團結禦侮的主張。他講到激昂時，聲淚俱下，『武裝同志』們聽了都很感動，有些眼眶裏還湧上了熱淚。隨後他們還跟着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

下午四點鐘到蘇州了。汽車不能進城，我們各乘着黃包車，兩旁由那些『武裝同志』隨伴着走。街上和店鋪的人們望着莫名其妙，都現着詫異的神情；大概他們看到形勢的嚴重，車子上坐的又不像强盜，所以使他們摸不着頭腦。有幾個『武裝同志』在車旁對我們說：『先生！我不是來押你的，是來保護你的。』走到半路，因爲時間不早了，『武裝同志』也紛紛乘黃包車成了一條很長的蛇陣，蜿蜒着向前進。到高等法院的時候，已上了燈火。由上海伴送我們來蘇的一羣人都紛紛來和我們握手告別，尤其是那些『武裝同志』們對於我們表示着非常懇摯的同情。

我們六個人同坐在待審室裏面等開審。在這裏所見的法警的裝束，和在上海

的有些不同。上海法院的法警裝束，和我們尋常所見的警察裝束差不多；蘇州法警穿的是寬袍大袖的黑外套，頭上戴的是一頂黑漆的高頂帽子。沈先生是一位老資格的大律師，法警都認識他，很客氣地和他打招呼，泡了茶送進來喝。

一會兒開審了，我們各人先後分別地被審問。所問的內容和在上海所問的大同小異，不過增加了一些。簡單說起來，不過包括下面的這幾點：（一）停止一切內戰；（二）釋放一切政治犯；（三）聯俄；（四）會否主張人民陣綫？（五）會否煽動上海日本紗廠罷工風潮？我們的答辯：對於第一點，我們的目的是要全國一致抗日，而且承認中央的領導權，沒有推翻政府的意思。關於第二點，也是要集中人材來抗日救國。關於第三點，也是以有利於中國抗日救國爲目的，而且同時主張聯英美法。關於第四點，我們所主張的是民族陣綫，未曾主張人民陣綫；前者是以拯救民族危亡爲要旨，是要一致來對外的，後者是以階級爲中心的，是含有對內的意味。關於第五點，我們因爲日本紗廠裏面的中國同胞在罷工

後飢寒交迫，捐了一些錢救濟救濟，並未煽動工潮。

審問之後，由幾名法警押着我們乘黃包車到吳縣橫街高等法院的看守分所。那時已在夜裏九點後，街道上的人已很少了，但是有些人看見一羣法警在幾輛黃包車的左右隨着走，仍對着我們發怔。

四二　看守所

蘇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們所被羈押的看守分所却在吳縣橫街，如乘黃包車，約需二十分鐘可達。湊巧得很，在我們未到的三個月前，這分所剛落成一座新造的病室。這個病室雖在分所的大門內，但是和其餘的囚室却是隔離的，有一道牆隔開。這病室有一排病房，共六間；這排病房的門前有個水門汀的走廊，再出去便是一個頗大的泥地的天井；後面靠窗處有個狹長的天井，在這裏有一道高牆和隔壁的一個女學校隔開。各病房是個長方形的格式，沿天井的一邊有一門一窗，近高牆的一邊也有一個窗。看守所的病室當然也免不了監獄式的設備，所以前後的窗上都裝有鐵格子，房門是厚厚的板門，門的上部有一個五寸直徑的小

圓洞，門的外面有很粗的鐵門，鐵門上有個大鎖。夜裏在我們睡覺以後，有看守把我們的房門鎖起來；早晨七點鐘左右，他再把這個鎖開起來。此外附在這座病室旁邊的，右邊有一個浴池式的浴室，（卽浴室裏面是用水門汀造成的一個小浴池，）左邊有兩個房間是看守主任住的。天井和外面相通的地方有兩道門，靠在裏面的一個是木柵門；出了這木柵門，經過一個很小的天井，還有一個門，那門的格式和我們的房門差不多，上面也有個小圓洞。在這兩道門的中間，白天有一個穿制服的看守監視着。夜裏我們睡了以後，一排房門的前面也有一個看守棱巡着，一直巡到天亮。他們當然要輪班的，大概每四小時一班。另外有一個工役穿着灰布的丘八的服裝，替我們做零碎的事務，如掃地洗碗開飯和預備熱水開水等等。他姓王，我們就叫他做『王同志』。這位『王同志』是當兵出身，據說前在北伐軍裏面曾經上戰場血戰過十幾次，不過他說『打來的成績歸長官，小兵是沒有分的。』他知道了我們被捕的原因之後，也很表示同情。

我們所住的病房是一排六間，上面已經說過。各房的門楣上有琺瑯牌子記着號數。第一號和第六號的房間是看守和工役住的；第二號用爲我們的餐室和看書寫字的地方；第三號是沈王兩先生的臥室；第四號是李沙兩先生的臥室；第五號是章先生和我的臥室。餐室裏有兩張方桌，我們買了兩塊白枱布把兩個桌面罩起來，此外有幾張有靠背的中國式的紅漆椅子，幾張骨牌櫈。天氣漸漸地寒冷起來，經檢察官的准許後，我們自己出費裝了一個火爐。我們幾個人每日的時間多半都消磨在這個餐室裏面。每個病房本來預備八個人住的，原有八個小木榻，現在爲着我們，改用了兩個小鐵床，上面鋪着木板，把原來的八個小木榻堆疊在一角。這樣的小鐵牀，我們幾個人睡在上面都還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不免苦了大塊頭的王造時先生！王先生的高度並不比我們其他的幾個人高，但是他却是從橫的方面發展，睡在這樣的小鐵牀上面，轉身是一件很費考慮的工作，一不留神，恐怕就要向地上滾！沈先生用的本來也是小鐵牀，後來他的學生來探望他，看見他

們所敬愛的這位高年老師睡的是木板，很覺不安，買了一架有棕墊的木牀來送給他。沈先生最初不肯用，說我們六人既共患難，應有難同當，他個人不願單獨舒適一些；後來經過我們幾個人再三地勸說，他才勉强收下來用。沈先生的學生滿天下，對於他總是非常敬愛，情意殷懃，看了很令人感動。我一方面欽佩這些青年朋友的多情，一方面也欽佩沈先生的品德感動他的學生的那樣深刻。

我們雖有一個浴池式的浴室，但是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屢次修不好，所以一次都未曾用過。我們大家每逢星期日的夜裏，便在餐室裏洗澡。用的是一個長圓式的紅漆木盆。因爲天氣冷，夜裏大家仍須聚在餐室裏面，所以一個人在火爐旁大洗其澡的時候，其餘幾個人仍照常在棹旁坐着；看書的看書，寫信的寫信，寫文的寫文，有的時候下棋的下棋，說笑話的說笑話。先後次序用拈鬮的辦法。第一次這樣『公開』洗澡的時候，王造時先生輪着第一，水很熱，他又看到自己那個一絲不掛的胖胖的身體，大叫其『殺猪』！以他的那樣肥胖的體格，自

已喊出這樣的「口號」，不禁引起了大家的狂笑！以後我們每逢星期日的夜裏洗澡，便大呼其「殺猪」，雖則這個「口號」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

四三　臨時的組織

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爲是新造的，所以比較地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倖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着不解緣的臭蟲。房前有個較大的天井，可以讓我們在這裏走動走動，也是一件幸事。我們早晨七八點鐘起身以後，洗完了臉，就都到這個天井裏去運動。我們沿着天井的四周跑步。跑得最多的是公樸，可跑五十圈；其次是乃器，可跑廿五圈；其次是造時和我，可跑二十圈，雖然他後來減到十五圈，大概是因爲他的肥胖的緣故；其次是千里，可跑十七圈，他很有進步，最初跑九圈就覺得過於疲乏，後來漸漸進步到十七圈。就是六十三歲的沈先生，也有勇氣來參加；

他最初可跑五圈，後來也進步到七八圈了。跑步以後，大家分道揚鑣再去實行自己所喜歡的運動。沈先生打他的太極拳，乃器打他的形意拳，千里也從乃器學到了形意拳，其餘的都做柔軟體操。早餐後大家開始各人的工作。有的譯書（造時），有的寫文（乃器和我），有的寫字（沈先生和公樸），有的溫習日文（千里）。午飯後略爲休息，再繼續工作。晚飯後有的看書，有的寫信，有的下棋。有的時候因爲有問題要討論，大家便談做一團，把經常的工作暫擱起來；有的時候偶然有人講着什麼笑話，引得大家集中注意到那方面去，工作也有暫擱的可能。在准許接見的時期內，幾於每天有許多朋友來慰問我們。本來只認識我們裏面任何一個人的，進來之後也要見見其餘的五個人；這樣一來，經常的工作也要暫時變動一下，雖則我們都很希望常有朋友來談談，換換我們的單調的生活。但是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竟因時局的緊張，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後，完全禁止接見，連家屬都不准接見，於是我們幾個人竟好像與世隔絕了！直至我拿着筆寫這

篇文字的時候，(廿六年的一月十三日，)還是處在這樣與世隔絕的境域中，我們的苦悶是不消說的。

不幸中的幸事是我們共患難的有六個朋友，否則我們恐怕要孤寂得更難受。我們雖然是在覊押的時候，却也有我們的臨時的組織。我們『萬衆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長』。我們都完全是純潔愛國，偏有人要誤會我們爲『反動』，所以不用『領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麽『長』來稱我們所共同愛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長』這個名稱來推崇他；我們想無論如何，總沒有人再能不許我們有我們的『家長』吧！此外也許還有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在患難中的確親愛得像兄弟一般；還有一個理由便是沈先生對於我們這班『難兄難弟』的愛護備至，仁慈親切，比之慈父有過之無不及，雖則以他那樣的年齡，而天眞，活潑，勇敢，前進，却和青年們沒有兩樣。除了『家長』之外，大家還公推其他幾種職務如下：乃器做會計部主任。他原是一位銀行家，而且還

著過一本很有精彩的中國金融問題，叫他來管會計，顯然是可以勝任的。關於伙食，茶葉，草紙，等等開支的財政大權，都握在他的掌中。造時做文書部主任，這個職務雖用不着他著荒謬集的那種『荒謬』大才，但別的不說，好幾次寫給檢察官請求接見家屬的幾封有聲有色的信，便是出於他的大手筆；至於要托所官代爲添買幾張草紙，幾兩茶葉，更要靠他開幾張條子。公樸做事務部主任。稍爲知道李先生的想都要佩服他的幹事的幹才。他所管的是好好貯藏親友們送來的『慰勞品』，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菜餚，有的是罐頭食物，有的是糖餅。他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吃午飯以前有沒有什麼紅燒肉要熱一下，明天吃晚飯以前有什麼獅子頭要熱一下！（雖則不是天天有肉吃。）大家看見草紙用完了，也要大聲狂呼『事務部主任！』所以他是夠忙的。千里是衞生部主任；他的職務是比較的清閒，誰敢偶然把香蕉皮或橘子皮隨意拋棄在棹上的時候，他便要低聲細語道：『衞生部主任要提出抗議了！』我被推爲監察，這個名稱怪大模大樣的！我記得監察院院

長似乎曾經說過，打不倒老虎，打死幾隻蒼蠅也好；在我們這裏既沒有『老虎』可打，也沒有『蒼蠅』可欺，所以簡直有『尸位素餐』之嫌，心裏很覺得不安，便自告奮勇，兼任文書部和事務部的助理，打打雜。會計部主任和事務部主任常常彼此『搗亂』，他們每天要彼此大叫『彈劾』好幾次！

四四　我們的『家長』

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的『家長』。

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我認識沈先生還在前年（一九三五）十二月底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是文化界救國會開着成立大會，沈先生做主席。我那時還不知道他的年齡，也不詳細知道他的生平，只看見他雖有着長鬚，但是健康的體格，洪亮的聲音，熱烈的情緒，前進的意識，都和青年沒有兩樣。後來我因為參加救國會，和沈先生來往比較多一些，我更深深地敬愛沈先生的為人。最近因共患難，更有機會和他接近，更加深了我對於他的敬愛。他不但是我所信任的好友，我簡直愛他如慈父，敬他

如嚴師。我生平的賢師良友不少，但是能這樣感動我的却不多見。我現在要很簡要地介紹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的歷史。

沈先生號衡山，浙江嘉興人，生長在蘇州。七八歲時入家塾，十六歲進秀才，三十歲中舉人，三十一歲中進士。但是沈先生却忽然脫離了科舉的束縛，就在這一年到日本去進法政大學求學。他三十四歲時回國，在北京辦過短時期的日報，幾個月後回到浙江。當時立憲運動正在發展，他便在浙江籌備地方自治，籌備諮議局，當選為副議長。同時兼任浙江的兩級師範監督（即校長），魯迅先生就在這個時候在該校教授理科。後來他加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担任浙江教育司司長，後來辭職應選國會議員（因官吏不得應選）。袁世凱稱帝，沈先生奮起反對洪憲，幾為所害，回到南方。廣州的護法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到廣州，任參議院議員，兼總檢察廳檢察長。後來護法政府取消，北京政府改組，他北上重任參議院議員，兼該院秘書廳的祕書長。（時在民國十一

年。）後來曹錕賄選，沈先生也是激烈反對的一人。十五年回到南方，參加國民革命，組織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反對孫傳芳。同年冬季受蔣介石氏（這時做總司令）委任組織浙江臨時省政府，中經反動的軍隊反攻，處境非常危險。民國十六年浙江全在國民政府統轄之下，分政務和財務委員會，分科無慮，除主席一人和祕書長一人外，其餘四科的科長也由省府委員分任。沈先生當時任政務委員兼祕書長。『清黨』後因誤會被拘七天，到南京後因諒解恢復自由。回到上海以後，法學院因副校長潘大道被刺，聘沈先生担任該校教務長，直到現在。民國十七年起並執行律師職務，被選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委員，已有五年多了。

我們看了這樣的經過事實，雖儘管說得簡單，但已可看出沈先生二三十年來總是立於國家和民衆的立場，作繼續不斷的奮鬥，一直到現在還是絲毫不懈的向前邁進。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參加過護法之役，又參加過國民革命。他曾有過三反：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曹錕賄選，反對孫傳芳阻礙國民革命。他在行動上實

行這『三反』的過程中，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險，都在所不顧。我們一方面感到沈先生的政治經驗——革命經驗——的豐富，一方面感到沈先生百折不囘的毅力。現在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又用着同樣的精神，參加當前的最艱危階段的救國運動了！我們爲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竭誠愛護我們的這位『老將』！

我覺得陶行知先生的留別沈鈞儒先生一首詩，很能說出這個意思，我現在就把它寫在這裏：

（一）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同胞的領頭。
他忘記了自己的頭，
要愛護別人的頭。
惟一念頭，
大家出頭。

（二）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戰士的領頭。
冒着敵人的炮火，
冲洗四十年的冤仇。
拚命爭取，
民族自由。

（三）

老頭，老頭！
他是中國的大老；
他是大衆的領頭。
他爲老百姓努力，
勞苦功高像老牛。
誰害老頭？
大衆報仇。

（四）

老頭，老頭！
他是少年的領頭。
老年常與少年遊，
老頭沒有少年愁。
雖是老頭，
不像老頭。

在這首詩的後面，陶先生還加有一段附註，也很值得介紹。

『沈鈞儒先生，六十三歲的老翁，在上海領導救國運動，親自參加遊行示威，走四五十里路，不覺疲倦。今年一二八到廟行公祭滬戰無名英雄，我曾追隨先生參加遊行。現讀永生，見一照片，知為公祭五卅烈士之影，前排有個老少年，仔細看來，知道是先生，回寓即想寫一首詩表示敬意。但行色匆匆，詩思不定，到新加坡前一日才寫成。現飛寄先生清覽，並致聯合戰線敬禮。』

這段附註裏的『老少年』三字，我覺得是形容沈先生的最好的名詞。沈先生這次在上海被捕之後，曾在捕房的看守所裏冰冷的水門汀上靜坐了一夜，——在那樣令人抖顫的一個寒夜裏！但是這種苦楚在他是絲毫不在乎的。自從我和沈先生同被拘捕以來，每看到他那樣的從容，那樣的鎮靜，那樣的只知有國不知有自己的精神，我不由得受到了很深的感動，反顧我自己這樣年青人，為着愛國受些小苦痛，真算得什麼！這樣一來，我的心也就安定了許多。

沈先生有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是很賢孝的，他們父子間的親愛，也是令人歆羨不置的；沈先生伉儷情愛極篤，他的夫人去世以後，他於慈父之外，還要兼着慈母的職務。他的大兒子是留學德國的醫生，二兒子是留學德國的土木工程師，他們兩位都在國內爲社會服務了；三兒子在日本學習商業管理，四兒子在德國學習電機，女兒在金陵女大學理科。以沈先生的地位，儘可以做『老太爺』享福了，但是這位『老少年』爲着救國運動，寧願含辛茹苦，拋棄他個人的一切幸福。

我們不但要學沈先生的爲國犧牲的精神，還要學他的至誠的愛；他以至誠的愛愛他的子女，以至誠的愛愛他的祖國，以至誠的愛愛他的朋友，以至誠的愛愛他的同志！我深深地感覺到沈先生的全部生命都是至誠的愛造成的！

我爲着中華民族解放的前途，虔誠地爲我們的『家長』祝福！

四五　『難兄難弟』的一個

除『家長』外，我們還有幾個『難兄難弟』，倘若這裏所用的『難』字可作『共患難』的『難』字解。他們的尊姓大名，我想讀者諸友也許都已經知道了，那就是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朋友。讓我先談談章乃器先生。

我記得第一次看見乃器的時候還在十年前。當時他已在浙江實業銀行做營業部主任，因為想辦浙評論半月刊，由一位朋友介紹他到時事新報館來看我。我們所談的全是關於出版刊物的情形，我一點不知道乃器是怎樣的一個人。不久他在華安保險公司樓上結婚，特約我去觀禮，並臨時『拉夫』，要我起來說幾句話，這是我第二次和他見面。此後我們很少遇着，直到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以後，

我們晤談的機會才漸漸地多起來。我們的友誼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說是救國運動。尤其使我肅然起敬的，是他爲着參加救國運動，雖犧牲二十年辛苦所獲得的行長位置而毫不顧惜。自從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後，從捕房的監獄起，中間經過上海特區第二監獄，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上海公安局，以及蘇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我們總是羈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國運動的開展；至於對他自身的遭遇，我從未聽見過他有一言一語的自怨自懟。我對於他的純潔愛國的精神，得到了更深刻的認識。

乃器的性格是偏於剛强的方面，但却不是無理的執拗；他和朋友討論問題，每喜作激烈的爭辯，只要你辯得過他，他也肯容納你的意見，否則他便始終不肯讓步。有些朋友覺得他在爭辯的時候有時未免過於嚴厲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裏是很純潔的，是很熱烈的，一點沒有什麽惡意。

在上海特區高三分院法庭審問的時候，審判長問到他會否煽動上海的日本紗

廠罷工，引起了他的抑制不住的憤怒，他昂首睜圓着眼睛大聲疾呼地答道：『我覺得很慚愧！因爲我的力量還不夠！倘若我有力量煽動日本紗廠罷工，我要很驕傲地回答審判長：我曾經煽動日本紗廠罷工！』審判長停了好一會兒，才又問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動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乃器又不加思索地高聲答道：『是！』他接着又發出他的獅吼：『中國工人在日本紗廠所受的虐待，和猪玀一樣，請審判長問一問全法庭的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對於本國同胞遭受到侵略者這樣慘酷的待遇，誰不表同情！』站在左右的法警弟兄們，聽到他這幾句激昂慷慨的話語，也不自覺地大點其頭！

我和乃器同做了囚犯之後，對於他由窮苦奮鬥出來的經歷，也比較地更清楚些。他生於浙江青田的鄉間，求學的機會很少，二十歲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畢業後，就進浙江實業銀行做練習生，每月只得津貼兩塊錢。一年後他辭職往北方入通縣農工銀行做營業主任。這是一個附屬於財政部的小銀行，號稱營

業主任，月薪只有十六元。一年後升任襄理兼營業主任，月薪加了十塊錢，但是和當時政府有關係的銀行，政局有些變動，辦事人的飯碗也隨着變動，因此即此月薪廿六元的襄理，他只做了不到一年，便滾蛋了。剛巧在北京有美國人和中國人合設中美實業公司，經營貿易和投資，美國人做經理，會計主任請他做，月薪有八十元，而且供膳宿，但是只做了三個月，因為代表美國人利益的洋經理擅用威權，他又憤然辭職。這樣一來，二十四歲的章乃器又陷入了失業的恐慌境域，過着半年的很窮苦的流浪生活。隨後回到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的當局請他回到銀行裏去做營業部科員，月薪二十二元。十幾年來因勞績逐漸升任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後來又兼任中國徵信所董事長，現在為着參加救國運動，都一筆鈎消了！

從乃器的經歷裏，很顯然地可以看到他辦事的勇於負責，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隨處流露着。我尤其感觸的是常人在職業上的位置愈高，往往愈頹唐，暮氣愈深，學識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兩樣。我們每讀他的文章，——尤其

是兩三年來有關救國問題的文章——沒有不感覺到他從實踐中得來的學識是時刻在那裏前進的。

四六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其次要談到『難兄難弟』的又一個——李公樸先生。

上節談過的章先生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倘若練習生可算是摩登學徒的另一名稱，那末李先生却也有着相類的發源，他原來做過鎮江一家京廣洋貨店的學徒！他原籍常州，生長在鎮江，十三歲的時候就被送到京廣洋貨店裏去『學生意』。一學就學了三年半，除最後一年每月有一塊錢的收入外，其餘的時候，每月只得到所謂『月規錢』兩角！他十六歲『滿師』，但是他剛剛『滿師』就開始『不安份』了！這個時候他就在『五四』運動的怒潮中發起愛國團，參加抵制日貨，攻擊店主賣日貨，結果被開除！我覺得公樸的最大特點是有勇氣，不怕難。就在這

個時候已可見端倪了。

幸虧有他的阿兄公愍先生的幫助，勉强入校求學。在武昌文華大學附中只讀了一年半，因校醫虐待學生，釀成學潮，開除百餘人，他是附中學生代表之一，也被開除，於是被開除的學徒又做了被開除的學生！他只得轉學，最後轉到滬江大學的附中，總算畢了業；但是在滬大一年級的時候，他又『不安份』了！他加入國民黨，參加革命，從廣東隨北伐軍出發，經福建浙江而達到上海，做政治工作。到民國十八年，美國某大學有給與中國學生獎學金的機會，他便毅然赴美留學。在他動身的前幾天，他的盤川還未籌足；可是他並不灰心，還是極力設法，終於得到朋友們的協助，達到他的目的。他到美國以後，很熱心地替生活週刊寫通訊，我和他做朋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選稿向來是很嚴格的，那時的公樸，思想還不及現在的成熟，寫作的能力也還不及現在的好，他的來稿並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却不管這些。你登，他很興奮地再寫來；你

不登，他還是很興奮地再寫來！在這件事裏也可以看出他的有勇氣，不怕難。

他在美國雖有獎學金，仍不夠用，所以同時還過着工讀的生活。以這樣一個窮學生，畢業後居然還心花怒放，要從他的學校所在地的僕特冷(Portland)到紐約去看看！可是沒有盤川。他得到一個朋友的介紹，去見一個輪船公司的經理，想在他們開往紐約的貨船上做工，免費乘到紐約去。那裏的工頭們看他是中國人，不肯傳達，叫他出去！他過一兩天又去問，又被叫着出去。他不怕麻煩，繼續着去問了十幾次，才碰到那經理，結果許他在船上做些工作，途中灣了許多碼頭，整整一個月才到紐約。他在船上和水手們同幹着笨重的苦工，還偷閒看他的書！這是他的有勇氣不怕難的另一表現！

他回國以來，對於民衆教育特別努力。除他所創辦的讀書生活外，尤其有成績的是他四年來在上海所辦的補習學校和流通圖書館。補習學校的數量由一個增加到八個；學生的人數由兩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圖書館裏的書籍由兩千

册增加到三萬册；登記的讀者由兩三百人增加到兩萬人。補習學校的最近的全部經費，每年不及五萬元；圖書館的經費最初每年不過五千元，最近每年也不及一萬五千元。這些在中國都打破了紀錄！在這圖書館裏還附設有讀書指導部，在中國也可算是創舉。這些還是在表面上，在數字上，可以看得見的方面。至於經費支絀時的奔走經營，黑暗勢力壓迫時的艱苦支撐，那却不是局外人在表面上所看得到的。倘若不是有勇氣不怕難，這個責任是很不容易担負起來的。

現在公樸已把他的這種勇氣和不怕難的精神用到救國運動的陣綫裏來，這是我們要爲救國運動前途慶幸的。

四七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裏面，居然有着三個學徒，這也可算是這幾個人的奮鬥史的特色。已談過的兩個是乃器和公樸，第三個要輪到沙千里先生。

據千里說，他在民國十八年（距今八年前）就曾經來看過我；那時我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上辦生活週刊，他已在一家蔴批疋頭的字號裏做賬房先生了。這一段故事，以及當時的情景，我已完全不記得。就尋常說，賬房先生所注意的只是算盤，他竟注意到生活週刊，他平日對於新運動的注意和同情，從這種小事裏已可想見了。後來我們就一直沒有見過面，直到我由香港回到上海，才在救國會的會議席上遇着。我想千里在八年前來看我的時候，那裏夢想得到我們會

住在一個牢獄裏？

但是因此我對於我們的這個『小弟弟』的生平懂得更清楚一些，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是蘇州人，生長在上海，十五歲的時候小學還未讀完，就被送到一家甏批疋頭的字號裏做學徒，每月僅得『月規錢』二百文。因爲他學習敏捷，辦事負責，過了兩年多就升任職員，每月月薪四塊錢。不久賬房缺人，他被請代理賬房，後就担任清賬房，月薪有了二十元，年齡約在二十歲左右。好些職員在閒暇的時候，喜歡酒食徵逐，狂嫖濫賭，他却能利用閒暇的時間來增加自己的知識。他先在補習學校補習英文，喜歡閱看前進的刋物。後來他過着工讀的生活；一面做賬房先生，一面却在上海法科大學（卽現在的法學院）做學生。那時只須考的成績夠得上就行，並不像現在對於升學文憑有着那樣呆板的規定，所以千里雖然連小學畢業的文憑都還沒有到手，但是因爲他平日補習的勤奮，應試的成績夠得上，居然也有入大學的機會，替社會增加了一位能夠主持正義的律師。看了

這樣的事實，為着一般窮苦出身力求上進的青年，我向來積極主張升學應該重視實際的考試成績而不應死守文憑的主張，更得到有力的證明。（為着這件事，在生活週刊上曾和朱經農先生有過很激烈的辯論。）

千里不但有强烈的求知慾，堅强而有恆的研究精神，對於社會的新運動也有着深刻的注意和濃厚的同情。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北伐軍正在出發，還未到上海，一個賬房先生的他，就奮起參加國民黨的祕密工作。那時的上海，正是瘋狂似的李寶章以殺頭殘害革命青年的時候。民國十七年，他曾經同幾位朋友創辦青年之友，一年半後被禁；前年十二月起主編生活知識，一年後也被禁。

今日的千里，我看他的求知慾的强烈，研究精神的堅强而有恆，和他在做學徒的時候沒有兩樣；這只要看他這次在牢獄裏還是那樣孜孜不倦地研究英文，研究法律，便可以知道的。他在這裏還學會了蘇武牧羊的悲壯歌曲，這是沒有聽過的朋友們不可錯過的！至於他參加救國運動的熱烈，更不必我來多說了。

四八　『難兄難弟』的又一個

我們的『難兄難弟』裏面有一個胖弟弟——王博士。這個胖弟弟的樣子生得那樣胖胖白白，和藹可親！他的性情又是那樣天眞爛漫，篤實敦厚！凡是和我們這個胖弟弟做過朋友的，想都能得到這樣的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時見面，比認識乃器的時候遲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來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類。那時他正在光華大學做文學院院長，爲着要替他所辦的自由言論半月刊登記的問題，特到生活週刊社來和我商量。後來在蔡子民先生等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開大會的時候，才第二次和他見面。此後沒有機會碰着，一直到前年年底（一九三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開成立大會的時候，他扶病到會，剛巧坐在我的旁邊，我們才第三次見面。他對我說，國難嚴重到這

樣地步，他雖有病，也不得不勉强來參加。他在會場上還起來說了幾句激昂慷慨的話；他說要起來組織救國會，先要有準備進監牢的决心，現在他自己果然進監牢了。

造時是江西安福縣人。在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裏面，他得到比較順利的求學機會，因為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考進了北平的清華。那時這個學校是官費留美的預備學校，他進了這個學校，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出洋；出洋後由學士而碩士，由碩士而博士：都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不是沒有逆境，却不是沒有需要艱苦奮鬥的逆境！那是他參加救國運動的方面。他十六歲在清華求學的時候，因為參加反對巴黎和約，要求罷免賣國賊曹陸章，就兩次被捕過。第一次因領隊到東安市場演講被捕，第二次參加代表團向徐世昌請願被捕。所以最近一次的被捕，在他算是第三次了。他回國後担任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等校的政治學教授，並加入新月雜誌担任撰述。一年後『九一八』國難發生，

他又被捲入了救國運動的漩渦！當時他發表了不少關於對日抗戰的主張。後來被政府聘爲國難會議會員，因反對限制討論範圍，代表平津滬國難會議會員和行政當局交涉無效，拒不出席。同時他發起上海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和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以號召民主，主張抗日，援助上海抗戰軍隊爲主要任務。不久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發起的民權保障同盟，被選爲上海分部執行委員。結果被禁止教書，不能再做教授了。於是他開始執行律師職務，並從事譯著的工作。但是一年後他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重振旗鼓，努力於救國運動。最近又第三次被捕了。

王博士具有演說的天才，尤其是在廣大羣衆的大會場上，他能抓住羣衆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話語，有條理的說法，打動他們的心坎。

王博士屢有做官的機會，但是因爲忠實於他自己的主張，不肯隨便遷就，甯願過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這是很值得敬佩的。

四九 一個「難妹」

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難兄難弟』，關於他們的生平，我已和諸君談過了。最後要談到我們的一個『難妹』。這個名詞似乎很生，但是既有『難兄難弟』，爲什麼不可有『難姊難妹』呢？男女是應該平等的，救國運動也應該是男女都來參加的。現在有了『難妹』，正是中國婦女界進步的象徵，所以我用這個名詞，很覺得愉快。說『難妹』而不說『難姊』，這是因爲和我們同時被捕的那位史良女律師，在我們裏面是年齡最小的一個。

在這次同患難的幾個朋友裏面，我和史律師見面得最遲，雖則她在律師界的聲譽，以及她參加救國運動的英勇熱烈，都是很早就知道的。她思想敏銳，擅長

口才，有膽量，這是略有機會和她接近的人就可以看得出的。我覺得她尤其有一種堅强的特性，那便是反抗的精神——反抗黑暗的勢力和壓迫。這種精神，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流露了出來。例如她在十三歲的時候，（民國六年，）在本縣的武進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求學，做高三的正級長，就領導同學驅逐一個才不勝任的算術教員，掀起學潮，罷課三天，結果終於達到掉換教員的目的，雖則因爲她是這次學潮的首領，被記了一次大過，作爲這個教員下場的條件。又例如她在十七歲的時候，（民國十年，）在女師本科三年級，因爲同學們不滿意顢頇的校長，她又領導同學驅逐校長，罷課示威，向南京教育廳請願，大鬧縣公署，包圍縣長三小時，圍困教育局長十三小時，結果勝利，達到掉換校長的目的。當時她担任女師學生會會長，同時担任武進學聯會評議部主任。

她廿三歲（民國十六年）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在隨後五年裏面，她担任過的職務有：南京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少校指導員，江蘇省特種刑事法庭

臨時地方法院書記官，江蘇省區長訓練所訓育員，江蘇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總務主任，青島特別市黨部訓政科主任。自從民國二十年以來，她開始執行律師職務，在律師界已有五年了，有着很好的聲譽，同時對於救國運動，非常努力。

史律師最近的被捕，已是第四次了。她在『五四』和『五卅』的怒潮中，曾經熱烈參加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因爲演講和領導的工作，被上海捕房拘捕過兩次。她在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任職的時候，有某主任追求她，被她拒絕，竟被誣爲『共黨』，被拘入南京模範監獄十四天，幸由吳稚暉蔡子民兩先生查明保釋。後來她在特種刑事法庭臨時地方法院任職的時候，又有某君追求她，五六年未達到目的，又誣陷她和『反動』有關，經該院停職偵查，結果認爲毫無反動嫌疑，宣告無罪，仍得恢復原職。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深夜，她和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同時被捕。第二天由高三分院審問，認爲證據不足，准許『責付』律師保出，公安局仍堅向法院請發

拘票，她拒絕到案，後以同案六人解送蘇州高等法院依法審理，她便於十二月三十日到蘇州自行投案。

我曾經徵求史律師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她認為：還在雙重壓迫下的中國婦女，一方面自應加倍努力，求自身能力的充實，在職業上，經濟上，力爭男女平等的發現；另一方面，也只有參加整個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解放運動，才有前途。她又說，她最反對一種以出風頭為目的的婦女，自己跳上了政治舞台，只求自己的虛榮祿位，朝夕和所謂『大人物』也者瞎混着，却把大衆婦女的痛苦置諸腦後；這種婦女雖有一千人上了政治舞台，也只有一千人享樂，和大衆婦女的福利是不相干的。

史律師還未曾結婚，有些朋友問她對於女子獨身的意見，她說：『我始終沒有提倡過獨身主義。我覺得獨身並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結婚，也不是一件低微的事情。高興結婚就結，不願意就不結。不過為着要免除工作事業的阻礙起見，

（如生育與家事麻煩等，）結婚，就算是私人的幸福，也只有犧牲一點，多做些工作與事業。」

有人問她『嫁不嫁』，她反對這個『嫁』字。她說這個『嫁』字明明是重男輕女，把女子嫁給男子；換句話說，還是把女子當作男子的財產；她認爲這種因襲陳腐的思想是人們所應當注意糾正的。

史律師的反抗和奮鬥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重的。我們要提倡婦女解放，『免除工作事業的阻礙』，的確是一件很重要的先決條件。我在蘇聯視察的時候，就看到他們對於這一點非常努力進行。可是生育這件事，他們也看作婦女對於社會的貢獻，不過要極力造成良好的環境，使結婚不致成爲『工作事業的阻礙』。

五十 『六個人是一個人』

因爲監獄裏男女是要絕對分開的，所以入獄後，我們的『難妹』是不能和我們在一起的，常在一起的只是我們的『家長』和幾個『難兄難弟』。

我們六個人都到了上海公安局之後，『家長』就鄭重宣言：『六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大家一致擁護這句話。

我們要有一致的主張和行動。我們參加救國運動，固然有着一致的主張和行動，那是不消說的。在這裏所特別提出的，是在被捕的這個時期裏面，我們也應該有着一致的主張和行動。關於這一點，我們一致議決了三個基本原則：（一）關於團體（指救國會）的事情，應由團體去解決；（二）關於六個人的共同事情，

應由六個人的共同決議去解決；(三)關於各個人的事情，應由各個人自己負責。關於第一個原則，例如倘若有人提出解散救國會或其他有關整個團體的要求，我們六個人便不應該接受。關於第二個原則，例如倘有需要我們表示什麼態度，或公布什麼文件，便須經過六個人的公議決定。關於第三個原則，例如審問的時候，各人只對自己的部分負責，關於別人的部分便不應代為擅答，或有所牽涉。

「六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六個人既已被捕進來，有罪大家有罪，無罪大家無罪；羈押大家羈押，釋放大家釋放。我們下了患難相共的決心。我們很堅決地要同關在一處。我們預先約定：倘若當局要把我們六個人分開羈押，我們必然地要一致以絕食來抵抗。這件事我們所以要「預先約定」，因為我們恐怕當局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我們分開，匆促間也許來不及知照；既已預先約定，倘若有這樣的事實發生，不必有所知照，各人便應該依照共同的預約實行。

在這個預約還未議決以前，大家還先有一些討論。講到絕食，我們的胖弟弟

似乎最沒有什麼顧慮，因爲他常常要減少他的胖，絕食也許是減少肥胖的一種辦法，雖則一直絕下去，在大塊頭也不免有絕命的一天！我們所最顧慮的是以『家長』的那樣高年，絕食未免太苦了他，所以大家都主張『家長』可以除外。但是『家長』無論怎樣不肯，他說『六個人是一個人』，果有實行絕食抵抗必要的時候，他必須一同加入。於是這個預約便沒有例外地一致通過了。很僥倖地，這個『議決案』到現在還沒有實行的必要。

我們被押解到蘇州，關在看守所以後，最初還可以接見親友，自從十二月十四日以後，（西安事件發生以後，）看守所的形勢突然緊張起來！不但朋友不准接見，連家屬都不准接見了。門口不但忽然加了好幾個武裝的保安隊，並加了好幾個憲兵來監視我們。既不准接見，又不准看報，我們對於時局的眞相是無法可以明瞭的。但是看守所的職員不免流露着恐慌的神情，我們也猜想到形勢的緊張。

我們對於時局和自己的遭遇都有着種種的估計——雖則估計所根據的材料當然是

很不夠的。我們都是純潔愛國，胸懷坦白，原用不着有所憂慮，但是在混亂的形勢下，意外的犧牲却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在無所不談的當中，無意中也談到槍斃的問題。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假使來了不測之禍，把我們這幾個人綁出去槍斃，我們應該怎樣？我們的一致的回答是應該一致的從容就義。我們一致主張出去的時候應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臨刑時應該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解放萬歲！這個『議決案』當然到現在也沒有實行的必要，否則我便沒有機會寫這些文字給讀者諸友看了！我們並且希望永遠沒有實行這個『議決案』的必要！

救國是一件極艱苦而需要長期奮鬥的事情。參加救國運動的人當然要下最大犧牲的決心，但同時却須在不失却立場的範圍內，極力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因爲我們要爲救國運動作長期的奮鬥。我們這次的不幸被捕，有些人說這是『求仁得仁』，這句話很有語病，因爲如果說我們的目的是要進牢獄，現在我們進了牢獄

便是『得仁』，那是大錯而特錯！我們的目的是要救國，並不是要進牢獄！進牢獄絕對不是我們所『求』的，只是一種不幸的遭遇。我們爲着要替救國運動做更多的工作，是要在不失却立場的範圍內極力避免的。我在上面所以說希望永遠沒有實行那個『議決案』的必要，理由也在這裏。

五一 前途

我們這次不幸被捕的幾個朋友，承蒙許多親友和同志們的熱誠慰問，奔走援救，實在覺得非常的感愧。我每看到許多好友們，無論曾經見過面沒有，有的冒着大雨大雪，有的不顧長途跋涉，充滿着滿腔的熱烈情緒來探望我們；每讀到許多讀者好友們的函電紛馳，橫溢着滿紙的義憤和系念來安慰我們：未嘗不深深地感到深情厚意，永不能忘。我們報答之道，只有更努力於救國運動，更努力於為大衆謀福利的工作。

當然，救國運動決不是少數人所幹得好的，必須大家都來幹；為大衆謀福利的工作千頭萬緒，也不是少數人所能幹得完的。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各就自己的能

力，對於救國的整個動向，對於國家建設工作的整個的計劃，盡其相當的貢獻；一方面還要各就自己的能力，在這整個的救國動向和整個的國家建設計劃之下，努力於自己所能幹的局部的工作。

根據這個觀點，我一方面願竭盡我的棉薄，追隨許多救國的同志們，共同努力於整個動向和整個計劃的商討和遵守；一方面願在這整個動向和計劃之下，努力於我十幾年來所辛勤從事的文化事業。我深信一個人的工作的效率，同他的特長和經驗有着密切的關係：如能善用他的特長和經驗，比較地容易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拋棄了他自己的特長和經驗而另外去幹別的事情——與原有的特長和經驗不相干的事情——那在個人是自暴自棄，在國家和社會也是一種損失。這當然不是無條件地反對改業。有些人覺察到自己的能力更適宜於某種新的事業或職務，於是拋棄原有的事業或職務，這是對的。我們各人都該求得最大的貢獻。所謂『最大的貢獻』，我的意思並不是指什麼誇大狂的心理，不是說要和什麼別人

比大小，却是說自己對自己比。你自己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適於發展自己能力的環境，這樣的貢獻，比不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適於發展自己能力的環境，當然是要大些；你如能盡量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適於發展自己能力的環境，那在你便是最大的貢獻了。各人的能力雖有大小，但是依這樣的意義說起來，無論何人，除了有害人羣的事業外，（倘若這可稱為事業，）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貢獻。竭智盡力求得這種『最大的貢獻』：這是人人對於自己對於社會應負的責任。

我常常督促自己担負起這個責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却這個責任。我曾經告訴過諸君，我在小學裏就想要做個新聞記者，二十年來雖因處境的困苦艱難，在求學和就業方面往往不得不『走曲線』，但是平日的修養訓練，以及十幾年來所聚精會神的工作，都和新聞事業脫離不了關係，——雖則其間辦週刊的時間較長，辦日報的時間較短。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個新聞記者，在今日要做的還是個新聞記者——不過意識要比二十年前明確些，要在『新聞記者』這個名詞上面，

加上『永遠立於大衆立場的』一個形容詞。我所僅有的一點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這枝禿筆和黑暗勢力作堅苦的抗鬥，爲民族和大衆的光明前途盡一部分的推動工作。我要肩着這枝禿筆，揮灑我的熱血，傾獻我的精誠，追隨爲民族解放和大衆自由而衝鋒陷陣的戰士們，『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我寫到這裏，要寫幾句結束這二十年的經歷的話了。這篇文共有五十一節，第六節以前是曾在生活星期刊上發表過的，第七節以後是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寫的。自廿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動筆，至廿六年一月廿二日寫完。寫這一節的時候，正是在一月廿二日這天的下午，很靜寂地坐在看守所的餐室裏一個方桌的一旁，在這方桌的右邊坐着章先生，對面坐着沙先生，都在和我一樣地拿着筆很快地寫着，右邊坐着王先生，很靜默地看着他的書。

在我寫着這節文字的時候，我們在蘇州過着監獄生活已經四十九天了，（被捕到現在整整兩個月了，）檢察官來偵查過了四次，每次問的話都差不多。我們

幾時能離開這個監獄生活，或竟要再關下去，在我寫的時候都還不得而知。但是這本書，我這時却想先把它結束一下付排，關於我們的消息，讓我在最後付排的弁言裏報告吧。

民國廿六年一月廿二日下午五點，脫稿於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

在香港的經歷

一　波動

七八年來，我的腦際縈迴着一個願望，要創辦一種合於大衆需要的日報。在距今四年前，由於多數讀者的鼓勵和若干熱心新聞事業的朋友的贊助，已公開招股籌辦，於幾個月的短時期內招到了十五萬圓的股本，正在準備出版，不幸以迫於環境，中途作罷，股款連同利息，完全歸還。這事的經過，是讀者諸友所知道的。但是要創辦一種合於大衆需要的日報，這個願望仍繼續不斷地佔據了我的心坎，一遇着似乎有實現這件事的可能性的機會，即又引起我的這個潛伏着的願望的波動。

有一位老友在香港住過幾個月，去年年底到上海，順便來訪問我，無意中談

起香港報界的情形，據說在那個地方辦報，只須不直接觸犯英國人的利益，講抗敵救國是很有自由的，而且因爲該地是個自由港，紙張免稅，在那裏辦報可從紙張上賺些餘利來幫助維持費，比別處日報全靠廣告費的收入，有着它的特別的優點。這位老友不過因談到香港的狀況而順便提及香港報界的一些情形，他雖言之無意，我却聽之有心，潛伏在我心坎裏多時的那個願望又起了一次波動。

今年的三月間，我便帶着這樣暗示的憧憬到香港去看看。我先找些當地新聞界的朋友談談。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是因爲在文字上已久成了神交，所以很承蒙他們熱誠指敎，認爲可以辦。

於是我便想到經費。我堅決地認爲大衆的日報不應該是一兩個大老板出錢辦的，所以我無意懇求一兩個大老板的援助；又堅決地認爲大衆的日報應該要完完全全立於大衆的立場，也不該由任何一黨一派出錢辦的，所以我也無意容納任何黨派的援助。結果當然想到公開招股的辦法。但是公開招股無論怎樣迅速，不是

在很短的時期內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因爲要顧到入股大衆的利益，和創辦者的信用起見，我們決定在公司創立還未開幕以前，對已收到的股款不應先有絲毫的動用。這個難題，使我躊躇了好些時候。同時又因爲香港印刷業的落後，實出人意料之外，要印日報，非自備印刷機不可，因爲找不到相當的印刷所來承印。辦報自備印刷機，是一項很大的開支，這是又一個難題！

但是事有湊巧，不久有一個印刷公司因爲要承印一家日報，從德國買到了一個一九三五年式的最新印刷機，每小時能印日報一萬九千份。那家報的每日印數只有一萬份，所以這部印刷機很有充分的時間餘下來再承印另一家報。這個意外的機會使我興奮起來，因爲印刷機無須自備，這至少在短時期內使我們在經濟上輕鬆了許多，至於此外的開辦費和暫時的維持費，那是有設法的可能的。

這樣，我才開始籌備。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已收到的股款，在公司創立還未開幕以前，不應先有絲毫的動用，我當然要嚴守這個原則。但是要先把生活日報

試辦起來，是不能不用錢的。我便和在上海的幾位熱心文化事業的好友商量，由我們幾個人輾轉湊借了一筆款子，經過一個多月的特別快的籌備苦工，到六月七日那一天，七八年來夢寐縈懷的生活日報居然呱呱墮地了！其實在香港的讀者和它第一次見面雖在六月七日的早晨，而這個孩子的產生卻在六日的深夜。那天夜裏我一夜沒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裏的工場上去。我親眼看着鑄版完畢，看着鑄版裝上捲筒機，看着發動機撥動，聽着機聲隆隆，——怎樣震動我的心絃的機聲啊！第一份的生活日報剛在印機房的接報機上溜下來的時候，我趕緊跑過去接受下來，獨自拿着微笑。那時的心境，說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這枝禿筆所能追述的！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對於這個『處女報』的格式和內容已覺得滿意——不，其實還有着許多的不滿意——但是我和我的苦幹着的朋友們的心血竟得到具體化，竟在艱苦困難中成為事實，這在當時的我實不禁暗中喜出了眼淚的！我知道這未免有些孩子氣，有些『生惕門陀』，但是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我也就毫不

隱飾地很老實地報告出來。

我們因爲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獃子勉强凑借而成的，爲數當然很有限，所以報館是設在貧民窟裏，經過了不少的困難和苦鬥，如今追想前塵影事，雖覺不免辛酸，但事後說來，也頗有趣，下次再談吧。

二　平民窟裏的報館

我在上次和諸君談過，我們在香港的報館因爲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獃子勉强湊借而成的，爲數很有限，所以是設在貧民窟裏。但是說來好笑，我正在香港貧民窟裏籌辦報館的時候，香港有一家報紙登出一段很肯定的新聞，說我被廣西的當局請到南甯去，擔任廣西省政府的高等顧問，同時兼任南甯民國日報總主筆和廣西大學敎授，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云云。你看這多麼闊！不但『顧問』，而且是『高等』，不但兼了『總主筆』，而且還兼着『大學敎授』！一身兼這樣的要職三個，依我們所知道的一般情形看來，每月收入僅僅在六百元以上，似乎還未免過於菲薄吧。但是在我這樣的一個窮小子看來，確覺得這是一個不小的數

目，而且老實說，確也有些垂涎欲滴！因爲我自從結束苦學生的生活，在社會裏混了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賺過這樣大的薪水。自從在十年前因生活週刊業務發達，我不得不擺脫其他一切兼職——要附帶聲明的是這裏沒有什麼『高』，沒有什麼『總』，也沒有什麼『大』，只是有着夜校教員之類的苦工——用全副精神來辦這個刋物，計算起來，每月收入總數還少去十塊大洋，十年來一直是這樣。我有大家族的重累，有小家庭的負擔，人口日增，死病無常，只靠着一些版稅的收入貼補貼補；因爲出國視察借了一筆款子，有好幾本著作的版稅已不是我自己的，除把版稅抵消一部分，還欠着朋友們幾千塊錢，一時無法償還；不久以前一個弟弟死了，辦喪事要舉債，最近有一個庶母死了，辦喪事又要舉債——好了，不嚕囌了，在這樣嚴重的國難裏面幾乎人人都有『家難』的時代，我知道諸君裏面有着同樣痛苦或更厲害的痛苦的一定不少，我不該多說關於個人的訴苦的話，我只是說像我們這樣的窮小子，『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並不是用不着，

但是我們爲保全在社會上的事業的信用，我們絕不能無條件地拿錢，而且我們知道僅僅孜孜於各在個人的圈子裏謀解決，也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話越說越遠，我不得不請諸君原諒，現在再回轉頭來談談在香港貧民窟裏辦報的事情吧。我在香港只是在貧民窟裏辦報，從未到過廣西，所以誰做了廣西政府的『高等顧問』等等，我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只是在香港的貧民窟裏所辦的那個報館。

香港的市面和大多數的居民是在山麓，這是諸君所知道的。在這裏你要看看豪華區域和貧苦區域的對比，比在任何處來得便當，因爲你只要跑到山上的高處俯瞰一下，便看得見好像汪洋一大片的所謂西營盤和它的附近地方，都是些狹隘齷齪的街巷和破爛不堪的房屋，像蟻窟似的呈現在你的眼前。但是除了這樣整批的貧民窟之外，在熱鬧的市面，於廣闊的熱鬧街道的中間，也夾有貧民窟，這可說是零星的貧民窟。我們的報館一面要遷就熱鬧市面的附近，一面又出不起那昂

貴的屋租，所以便選定了一個零星貧民窟裏的一條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許已爲諸君所耳熟的利源東街二十號。

這一條短短的小街雖在貧民窟裏，雖然汽車貨車不許進去，地勢却很好，夾在最熱鬧的德輔道和皇后大道的中間，和印刷所也很近。這屋子號稱三層樓，似乎和『高等顧問』有同樣闊綽的姿態，但是每層只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房間，房間的後面有一個很小的廚房，前面臨街有一個窄得只夠立一個人的露台。至於屋子材料的簡陋，那是貧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爲怪。天花板當然是沒有的，你仰頭一望，便看得見屋頂的瓦片。上樓是由最下層的鋪面旁邊一個窄小的樓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時候，如不湊巧有一個人剛從上面下來，你只得緊緊地把身體貼在牆上，讓他唯我獨尊地先下來；這好像在蘇州狹隘的街上兩輛黃包車相碰着，有着那樣擁擠不堪的滑稽相。屋子當然是髒得不堪，但是因爲包括鋪面的關係，每月却要租一百塊錢。我承蒙一位能說廣東話的熱心朋友陪着到經租帳房那裏去，

往返商量了好幾趟，在大熱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幾次大汗，總算很幸運地把每月屋租減到九十塊錢。

這樣髒得不堪的屋子，當然需要一番澈底的粉刷，否則我實在不好意思請同事們踏進去；並不是嫌不好看，要努力辦事不得不顧到相當的健康環境。可是那裏的粉牆經過粉刷了五次，才有白的顏色顯露出來。漆匠大叫倒霉，因為他接受這樁生意的時候，並未曾想到要粉刷到五次才看得見白色。我不好意思難為他，答應他等到完全弄好之後，加他一些小費。那個窄小的樓梯，是跑二樓和三樓必經之路，樓梯上的木板因年久失修，原來平面的竟變成了凹面的了，有的還向下斜，好像山坡似的，於是不得不修的修，換的換，這也是和房東辦了許多交涉而勉强得到的。

談起來似乎瑣屑，在當時却也很費經營，那是小便的地方。在那貧民窟的屋子裏，一般人的習慣，廚房裏倒水的小溝，（樓上也有，由水管通到下面去，）

同時就是小便的所在，所以廚房和樓下的屋後小弄，便是臭氣薰蒸的區域。報館裏辦事的人比較的多，需要小便的人無法使它減少，如沿用一般人的辦法，大家恐怕要薰得頭痛，無法辦公了。說的話已多，這事怎樣解決，只得且聽下回分解吧。

三 慘淡經營之後

在貧民窟裏辦報館，佈置起來確是一件怪麻煩的事情！我曾經說過，我們的報館所在地的利源東街，是夾在兩條最熱鬧的街道的中間。在那兩條最熱鬧的街道上，各店舖裏的衞生設備是不成問題的，因爲在地下都裝有現成的溝筒，他們都可以裝設抽水馬桶，和有自來水衝的白瓷小便斗。但是利源東街離這兩條大街雖不過幾步遠，情形便大不同了。因爲那條街上的住戶根本沒有力量享受衞生的設備，所以地下根本就沒有什麼衞生設備適用的溝筒。你獨家要裝設也可以，不過先要就馬路的下面裝設溝筒，從大街的地下溝筒接到屋裏的地下來才行。這項工程至少要花掉一千多塊港幣，合華幣要近兩千塊大洋，這當然不是我們這樣的窮報館所出得起的，只得想都不去想它。那幾天我常常到報館裏去視察修理工程

的進行，屢次有『苦力』模樣的不速之客跑來盤問，他講的是廣東話，我一竅不通，但是他却鍥而不捨，找個懂廣東話的朋友來翻譯一番，才知道他爲的是馬桶問題。原來在這個貧民窟裏倒馬桶的生意，也有好幾個人要像競爭國選那樣地熱烈，爭取着『倒權』！他們的這種重要的任務，却也很辛苦，每夜一兩點鐘的時候，就要出來到各戶去執行『倒權』的；在取得『倒權』以前，還要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在我們呢？馬桶問題倒不及他們那樣着急，因爲我們把第二層的後間那個小廚房粉刷一番，叫木匠司傅用木板來隔成兩個小間，買兩個白瓷馬桶，加些臭藥水，還勉强過得去。所要設法解決的是小便所問題。我原想買個白瓷小便斗，裝在自來水龍頭下面，斗底下裝一個管子，通到下層地下深處的泥裏去；這樣可以不必以後弄爲尾閭，稍稍顧到公衆的衞生。主意打定之後，便和一位能講廣東話的朋友同跑到一家專買白瓷抽水馬桶和白瓷小便斗的公司裏去接洽。那公司裏的執事先生們聽說是個報館裏要裝白瓷小便斗，以爲是一件很闊的生意經，

很殷勤地特派一位『裝設工程師』到我們的報館裏來設計，我們覺得却之不恭，只好讓他勞駕。那位『裝設工程師』一踏進我們的小廚房便搖頭，他說在這裏要裝設白瓷小便斗，先要打樣繪圖呈請香港政府核准，領取執照，否則便是違法的行為，幹不得！我問他在那條街上一般住戶都是在廚房的水溝裏隨意小便，使廚房和後弄都臭氣薰蒸，是否也要呈請香港政府核准呢？他知道這是開玩笑的話，彼此付之一笑。但是小便所問題還是未得解決。最後只得僱泥水匠，用白瓷磚就水溝的洞口砌成一個方形的大斗，下面挖個洞，每日由茶房負責倒水衝幾次，由那裏還是要流到後弄去，那也就無可如何的了。這在該處的泥水匠是一個新式的『工程』，做得不對，以致做了又拆，拆了又做，經過幾次的麻煩，才算勉强完事。

屋子的後部分的問題算解決了，但是屋子的前面是朝西，陽光逼着要使你中暑，於是決定裝設一個布篷，裝設兩個風扇，並在那狹隘的露台的鐵欄杆上排幾

盆花草。門面和內部都油漆一新。這樣慘淡經營之後，這一所房屋，在那條貧民窟的街道上簡直是一所很整潔的屋子了。我把它比作一個十足的鄉下土老兒硬穿上一套時裝。

有許多同事是陸續由上海來的，我每次很高興地到碼頭去接他們，他們到了第一件事是要先到報館去看看。我雖知道這時我已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把這個貧民窟的屋子刷新了一下，但是心頭裏還是忐忐忑忑，不知道同事們看了覺得怎麼樣，雖則我引導他們進報館的時候，總是一團高興，因爲這是經過一番苦工夫所得的結果。後來他們裏面有的承認初看的時候覺得很不慣，後來也就漸漸地看慣，覺得很自然了。

我的辦公室是就二層樓的前一部分，隔成一個小小的房間，排着三張的辦公棹，已是擠得難於迴旋。窗關着很悶；窗開着吧，斜對面的那家小鐵店的煤烟常常溜進來，替你的棹上和面孔上加些材料。那裏的房屋都是兩層樓的樓房，中間

隔開的街道既然很窄，所以兩邊樓房相望是很近的。有一夜斜對面的樓上死了一個人，全家十幾口，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擠在那個小房間裏圍着躺在床上的死屍哭着，哭得很悲哀，聽了令人爲之慘然。我正坐在自己的小房間裏寫社論，因爲距離很近的緣故，那個硬挺挺僵臥着的死屍，恍惚就睡在我的身旁似的，尤其是那樣悲哀的泣聲，使我雖拿着筆在構思，心目中所湧現的總是一個死屍，一羣窮苦的婦人孩子圍哭的慘況。心裏想也許那一羣可憐的婦人孩子們全靠那個死人活命，現在是陷入了非常悽慘的境域了！心思這樣地被擾亂着，好久好久寫不出一個字來！

被我由法國電請回來幫忙的胡愈之先生，他的辦公棹就在我的對面，有一夜他發現一個大蜈蚣！如在不知不覺中，乘他在寫作無暇他顧的時候，取道他的褲脚管向上前進，那還得了！他生怕再有蜈蚣出來。他搖頭慨歎這種地方眞有些危險！我想他當時的兩個褲脚管裏大概是常在宣布戒嚴的狀態中！

四 一個難關

在香港辦報，登記也是一個難關——這登記當然是向香港政府要求的。我在事前就聽見說「外江老」——不是廣東人——尤其是名字被多數人知道的文人，要出面登記，是很不容易通過的，因爲他們怕有什麼政治作用。這在邏輯上似乎講不通，因爲有政治作用的，廣東老也儘有可能，並不限於什麼「外江老」；名字不見經傳的文人也不見得都是馴伏的羔羊。但是他們不講這些，他們只怕由外面來的人有着搗亂的陰謀，使他們的統治發生危險。這種心理猶之乎我由歐洲到美國上岸的時候，美國的移民局人員「像煞有介事」地問我有沒有意思要推翻美國政府！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來辦報，理由是他的唯一宗旨是在賺

錢。我既不是廣東老，又不是商人，尤不幸的是名字又不能避免被人知道，所以出面登記是十八九難於通過的。但不幸中的幸事是有一位足夠資格的朋友熱心贊助，由他出面去登記。登記的手續照例是要親到香港政府裏什麼『華民政務司』洋大人那裏給他問話。最要緊的話是問你爲什麼要辦報？這位『識相』的朋友要咬定宗旨說是要賺錢。要賺錢是他們認爲最可欽佩的大志，至高無上的美德，這個難關便這樣地被通過了。

當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天下事是終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記完畢以後，是誰在那裏主辦，終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過英國人素以『法治』自許，在法定的手續完畢之後，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什麼罪名，他們是不好意思隨隨便便取消你的登記的。最糟的是在登記的時候，他們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乾脆地不准許；在已經准許之後，却不至隨隨便便取消你的登記。這種『法治』的實質究有幾何，姑且不論，但說來好笑，據說住在香港的一般廣東老，遇着與人

吵嘴的時候，他常要這樣地警告對手的人：『你不要這樣亂來，這是個法治的地方啊！』無論如何，後來香港政府的警務處終於知道那個報是我在那裏主辦的，這不足怪，因爲他們有偵探，這種情報當然是可以得到的。

這雖不致就取消我們的登記，但是既受他們的嚴重的注意，就不免要增加許多麻煩。他們要進一步抓到我們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銀行的經理，因爲香港政府禁止青年會民衆歌詠會的事情，去見警務司，剛巧我們的報上發表一篇鼓勵這歌詠會的社論，那位警務司便再三向他詰問我爲什麼要在香港辦報，並老實說他們無時不在嚴重地注意我。同時有朋友來告訴我，說警務處會有公文到新聞檢查處（香港政府設的），叫檢查處每天要把檢查生活日報時所抽去的言論和新聞彙送到警務處察閱。他們的意思以爲已經檢查過的東西不會有什麼毛病，被檢查抽去的東西便一定要露出馬脚來，一旦被他們提着可以藉口的證據，那就可以開刀了！這可見我們當時所處的環境的緊張。但是事實究竟勝雄辯，他們的偵探，他

們的檢查員，費了許多工夫之後，所得到的最後結論却很妙，他們說：『這只是幾個讀書人辦的報，沒有什麼政治的背景！』倘若他們所謂『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麼黨派的關係，那我們當然是絲毫沒有，他們的話是完全對的；但是我們却未嘗沒有我們的背景！我們的背景是什麼？是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衆文化！我們是完全立在民衆的立場辦報，絕對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但是我們辦報却也有我們的宗旨。我們的宗旨是要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

但是我們總算僥倖得很，在他們的那個『最後結論』之下，我們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我們不但得到警務處的諒解，而且也得到新聞檢查的諒解。

但是這個意思却也不是說新聞檢查處就一定沒有麻煩。關於香港的新聞檢查處，有它的很有趣的特別的情形，留待下次再談。

五 新聞檢查

談起香港的新聞檢查，却有它的饒有趣味的別緻的情形，雖則在我們主張言論自由的人們，對於新聞檢查總覺得是一件無法歡迎的東西。

香港原來沒有什麼新聞檢查處，自從受過海員大罷工的重大打擊之後，驚於輿論作用的偉大，害怕得很，才實行新聞檢查，雖明知和英國人所自詡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顧不得許多了。據我們的經驗，香港新聞檢查處有幾種最通不過的文字，其一便是關於勞工問題，尤其是關於提倡勞工運動的文字。香港的新聞檢查原在吃了工潮苦頭之後才有的，他們最怕的當然是直接或間接和勞工有關係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個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詩，說什麼『一家肚子

餓；沒有棉衣過冬；破屋呼呼西北風，媽媽病得要死，不能送終！』這些話是他們所最怕聽的！至於那首詩的末段：『罵他他不痛，怨天也無用，也不可做夢。拳頭聯起來，碰！碰！碰！』那更是他們聽了要掩耳逃避的話語！所以這首詩在香港完全被新聞檢查處抽去，後來我把它帶到上海來，才得和諸君見面。（見生活星期刊第十二號。）

他們不許用『帝國主義』，所以各報遇着這個名詞，總寫作『××主義』，讀者看得慣了，也就心領意會，知道這『××』是什麼。我們知道在上海各種日報上還可以把這四個字連在一起用，這樣看來，香港新聞檢查似乎更嚴厲些；其實也不盡然，例如在上海有許多地方爲着『敦睦邦交』，只寫『抗×救國』，在那裏，這『抗』字下的那個字是可以隨處明目張胆寫出來的。中國人在那裏發表抗敵救國的言論倒比上海自由得多。這在我們做中國人的說來雖覺汗顏無地，但却是事實。生活日報開張的第一天，香港的日本領事館就派人到我們的報館裏

定報一份，好像公然來放個炸彈！但是我們後來對於抗敵救國的主張還是很大胆地發表出來。

他們不但檢查新聞，言論同樣地要受檢查。有些報紙上的社論被他們完全抽去，因爲夜裏遲了，主筆先生走了，沒有第二篇趕去檢查，第二天社論的地位便是一大片雪白，完全開着天窗，這是在別處所未見的。有一天看見某報社論的內容根據四個原則，裏面列擧這四原則，但是在（一）下面全是接連着的幾行××，在（二）（三）（四）各項下面也都同樣地全是接連着的幾行××！這篇東西雖然登了出來，任何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的。生活日報的社論還算未有過這樣的奇觀。我每晚寫好社論之後，總是要等到檢查稿送回之後才離開報館。有一夜因檢查擱置太遲，我想內容沒有什麽『毛病』，先行回家，不料一到家踏進門口，就得到報館電話說社論被删去了一半！我趕緊猛轉身奔出門，叫部汽車趕回報館，飛快地寫過半篇送去再試一下，幸得通過，第二天才得免開一大塊天窗。其實我

所要說的意思還是被我說了出來，不過寫的技術更巧妙些罷了。無論他們刪除得怎樣沒有道理，你都無法和他們爭辯，都無法挽回。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民衆歌詠會前途無量，結語是『我們希望民衆歌詠會普遍到全中國，我們願聽到十萬百萬的同胞集體的「反抗的呼聲」』！這末了五個字是我引着香港青年會發起這歌詠會的小冊子中語，但是他們硬把『反抗的呼聲』這幾個字刪去，成爲『×××××』，我看了非常的氣，尤其是因爲檢查處的人也都是中國人，但氣有什麼用？

有時因爲檢查員沒有看懂，有的話語也可以溜過去。據說某報有一次用了『布爾喬亞』這個名詞，檢查員看不懂，立刻打電話給那個報館的主筆，查問這究竟是個什麼傢伙，答語說是『有錢的人』！有錢的人應該是大家敬重的，於是便被通過了！

廣告雖不必受檢查，但報館要依檢查處的禁例，自己注意。例如登載白濁廣告，『濁』字要用口的符號來代替，和生殖器或性交等等有關係的字樣都要用口

的符號來代替。據說他們的理由是：凡是你不可以和自己的姊妹說的，就不可以登出來。這理由可說是很別緻的！說來失敬，帝國主義和白濁竟被等量齊觀，因爲在各報的廣告上（大都是屬於書籍的廣告），也只可以用口口來代替「帝國」兩個字。

六　一個有利的特點

我在上次和諸位談過香港新聞檢查的情形。我們主張言論自由的人們根本反對新聞檢查的制度，所以對於香港的新聞檢查當然也說不上有什麽好感。但是平心而論，中國人在香港辦報，尤其是在當前的階段，所受到的檢查制度的桎梏，比在中國各處却是比較地好些。這並不是說香港的檢查比別處寬大些，却是因爲他們所忌的特點不同，而這些特點在我們却沒有很大的妨礙。例如他們對於攻擊英國的言論是最忌的，有妨礙英帝國尊嚴的新聞是最忌的；這在我們正要全國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民族最大敵人的階段，我們對於其他各國原不願多所樹敵，不但不願多所樹敵，而且要盡量增加他們對中國的好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於英

國，只須他們沒有幫助我們民族最大敵人的行爲，原來就無意和他們爲難的。又例如他們最怕煽動階級鬥爭，所以凡是關於這類的文字和消息，也是他們所最忌的；這在我們正在極力提倡全國不分階層團結禦侮的時候，我們的救國主張是從整個民族的解放做出發點，並非從什麼階級做出發點，他們的那種顧忌也並不致妨礙我們的任務。又例如他們最怕有人擾亂香港的治安，以致動搖他們在香港的統治；這在我們集中力量對付我們民族最大敵人的時候，也用不着就和香港的統治者爲難，所以也不致妨礙我們。

此外，在那個地方，我們却得到一個有利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對於日本的畏懼心理，並不像其他地方的誠惶誠恐，搖尾乞憐得不像人樣！我們對於抗敵救國的主張和敵人侵略我們的消息，都還可以登得出來。這個特點實給與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辦報的一種很大的便利。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做中國人的人要在這個地方才有這樣的權利，說來當然是可爲痛哭流涕的。有人說香港是殖民地，中國

是半殖民地，誰料得到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還比不上殖民地！

最後還有一個特點，有些人也視為莫大的便利，在生活日報卻無意利用它，因為在事實上沒有利用它的必要。這個特點是這樣：假使中國有甲派和乙派做對頭，甲派要打倒乙派，（或乙派要打倒甲派，）那甲派在香港辦的報可盡量醜詆乙派，攻擊乙派，打倒乙派。可是生活日報是無黨無派的報紙，它無意擁護那一派，打倒那一派，它只主張全國各黨各派在國難這樣嚴重的時候，應該大家拋開舊仇宿怨，一致團結起來救國；它所要赤誠擁護的是中華民族，它所要打倒的是做着全國公敵的漢奸。

還有一句公道話我應該說的：香港檢查處的職員都是中國人，他們多少還有些民族意識，凡是關於抗敵救國的言論和消息，他們都還肯盡可能地通過。關於民族敵人侵略我們國家和蹂躪我們同胞的事實，他們也都還肯盡可能地放鬆。

廣東在陳濟棠氏當權的時代，對於新聞檢查也是很苛的，廣東的報紙對於廣

東的政聞是不敢依事實報道的，結果是在廣東的人民不信任本地報紙的報道；要知道廣東的眞實消息，要在香港的報紙上去看。這當然是很不幸的現象，但是在壓迫言論界的當局並不肯想到這一點：在壓迫下的言論界失却了一般人民的信任心，反而增加民衆對於當局的懷疑。那時廣東人要知道眞確的『粤聞』，不信廣東報而信香港報，便表示當時廣東當局的信用破產！不能在內政和外交的事實上取得人民的信任，却想用壓迫言論界的手段來獲得人民的信任，這是合於一句老話，叫做『南轅而北轍』，埋頭苦幹着天地間至愚極蠢的事情！

香港這個地點實在不宜於以全中國爲對象的報紙。這方面的理由，我在後面要談到；不過講到該處的檢查束縛，——當然仍是不合理的束縛——確比中國各處好些，這只要看了上面的解釋，便明白了。有些朋友不明白這裏面的情形，以爲離開半殖民地，跑到殖民地去辦報，是很可怪的，因爲他們覺得殖民地的言論不自由當然要比半殖民還要厲害。其實也不盡然。

七 種種尷尬

我們在香港辦報，因爲當地的新聞檢查有他們的特點，我們還不感覺得怎樣大的妨礙，至少和『半殖民地』的情形比較起來，我們還可以多說幾句話，多得到一點言論自由，多登出一點眞確的消息。我們毫無意思要歌頌殖民地的新聞檢查制度，尤其看到他們對於西文的報紙不檢查，專對中文的報紙爲難，更顯出不公平；至於我們立於報人的立場，根本反對新聞檢查制度，那是不消說的。不過我們看到『半殖民地』比殖民地更不如，却不勝其慨歎！

我們在香港尤其感到困難的却是印刷業的落後。我們雖未曾普遍調查，但是想到承印我們日報的那家印刷所的工作情形，至今還忘記不了那種麻煩！那裏是

用包工制的，我們很鄭重地和工頭約法三章，什麼時候交稿，什麼時候看校，什麼時候拚版，　他都一一答應；但是每次都不按照所規定的時間；報紙應該可以在早晨六點鐘出版的，他們往往替你延展到八點鐘，九點鐘！屢次交涉，屢次無效。編輯先生慘淡經營地把新聞這樣排，那樣排，排得自己認為可以了，第二天早晨翻開報來一看，他排在那裏的，現在却發現在這裏，大搬其場！有的時候在當夜就被編輯先生發覺，叫他們照規定的樣子排過，他們憤然很不客氣地說：『你就拿出一萬塊錢來，我們還是不改！』我們和他們講理，他們說：『我們香港的工人就是這樣的，上海的工人頂括括，我們是比不上他們的。』

校樣上的錯字，校對先生改正之後拿去，他們隨意替你改排幾處，隨意替你留下幾處不改，馬馬虎虎打一張清樣交還你。校對先生在二校上又一一改正，他們又這樣『隨意』之後，再馬馬虎虎打一張清樣交還你。所以校對先生『埋頭苦幹』了三校四校，還是東一個錯，西一個錯。眞是所謂焦頭爛額！有一天前進一

欄裏有一篇文章，校樣上缺了許多字，在空字地位塡着許多黑而且粗的雙槓，第二天早晨原樣印出，使人硬着頭皮讀下去還不懂。該欄編者柳湜先生在留別南中國朋友那篇短文裏，所謂『錯字，缺字，更弄得編者掉淚，作家痛心！』並不是無病呻吟，確能反映我們當時的憤慨心理。生活日報星期增刊有一期上登一個啓事，劈頭是『生活日報自二十五年八月一日起，遷移下海，』我們要搬回上海，他們却一定要請你『下海』！

你在香港出版的各日報上，往往可在大標題裏面忽然看到鑲着一個小小的字體！尤其可笑的是缺少『懂』字，就印上『董』字，下面加個括弧註道：『加心旁』；或一時找不着『鏟』字，就隨便印上『産』字，下面也加個括弧註道：『加金旁』，好像什麼十三經註疏似的！這種獨出心裁的新奇花樣，確是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所夢想不到的。你要方頭字的地方，他們替你夾入一兩個普通鉛字；你要用普通鉛字的地方，他們却替你夾着一兩個方頭字進去！

種種尷尬，我們和工頭交涉，他總是很慷慨地給我們以空頭支票，於是我們不得不和那個公司的經理先生麻煩。我往往在半夜三更，或天剛剛亮的時候，打電話去和他嚕囌。雖承他很客氣地樣樣答應，但是結果還是一樣糟！

我們眞弄得沒有辦法！自己沒有印機，要掉換一家印，根本沒有！我們起初也不知道印刷工友們爲什麽那樣不講理，後來仔細打聽，才知道工友們在那樣嚴酷榨取之下，失却他們的理性，却也是可以原諒的。他們每天要做十六七小時的工！每夜要幹到深夜四五點鐘，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起來，十一點卽開工，一兩小時後吃午飯，飯後繼續幹着，下午五點鐘晚飯，晚飯後就一直又要幹到四點鐘。睡的時候就隨便七橫八豎地躺在鉛字架子下面睡，吃的時候也在那裏。（每月工資最多的是二十四元。）這樣一天到晚，昏天黑地做着苦工，怎怪他們一看見稿件來就要開口罵你幾句？你還要講究這樣，改良那樣，當然要被他們痛罵一頓。聽說那個工頭不但擅長於榨取，而且慣於剋扣工資，有好幾個姘頭，還吸上鴉片

煙癮。我們屢次要求這工頭改善那些工人的生活，他的堅決的回答是：『香港的工人都是這樣的！』陶行知先生的一個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詩，就是聽我們談起這些工人的情形才寫的，什麼『做了八點鐘，再做八點鐘。還有八點鐘，吃飯，睡覺，撒尿，出恭。』他在這首詩裏又說：『機器冬冬冬。耳朵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確是紀實之作。

八 一隻大笨牛

我們幾於每天要和印刷所爭吵，這是在印刷方面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麻煩，大概的情形，我在上次已和諸君談過了。印刷這件事雖是麻煩，但是經我們繼續不斷的交涉，不但和工頭鍥而不捨地爭吵着，不但時常於半夜三更打電話給印刷所經理先生，鬧得他不得好睡，並且由我問清工頭，開好排字房的工作時間表，裏面載明幾點幾分鐘交什麼版的新聞，幾點幾分鐘要排好什麼版的新聞，幾點幾分鐘要拚什麼版　先給工頭親眼看過，他沒有異議後，我便在晚飯後親自捧着這個時間表到印刷工場裏去『坐鎮』，徹宵不睡地看着他們做。本來他們是很撒爛污，編輯室的稿子儘管送來，他們慢吞吞地像和兎子競走的龜，隨意把多下來

的稿子擱在一旁，置之不聞不問之列。我用着蠻幹的辦法，一看見有一張稿子送來，立刻就查看有沒有人排；如果沒有人立刻接排，就對工頭提出質問，要他重新支配工作，如果人手不夠，便立刻和他吵，逼他立刻加入。每次時間表上的時候到了，我便要他交出那個時候應該拚好的那一版；他交不出來，我就跳起脚來和他吵。時間表上所列的時候是根據他嘴裏說出來的，他無法抵賴，雖不願意『仰頭樂幹』，也不得不稍稍『埋頭苦幹』一下。工友們看着我那樣一點不放鬆地用足勁兒，居然引起他們的笑容和興趣，增加些他們的效率。『坐鎮』到版子鑄好上機，然後放心走出印刷所的門口，東方已放射出魚肚白了。我在筋疲力盡中好像和什麼人吵了一夜的架！

這樣的印刷所，我想一定打破了世界的紀錄！我暗中把它比做一隻大笨牛，我們在後邊用手推着這隻大笨牛走，出了全身的大汗，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用大聲呼喊着，力竭聲嘶，才把牠稍稍推動了一些。也許有人要怪我們自己未免太笨

了，既覺得這樣一個打破世界紀錄的印刷所不行，爲什麼不掉換一個印刷所試試看呢？這話實際等於飢荒勸人吃肉糜！在香港你根本找不到另一家可以替你承印日報的印刷所。香港印刷業的落後，我到香港就調查過，原來知道的，所以我最初並無意在最近期內就開辦日報。但是後來聽到有個印刷所，從德國買來一架簇簇新的頂括括的一九三五年式的捲筒印刷機，答應承印我們的報，誰也料不到竟至搖身一變而成了一隻大笨牛！其實印刷機的確不壞，毛病全在排字房。這事要根本解決，當然非自辦排字房，鏟除包工制不可，但是這又是錢的問題。要有個設備比較完善的排字房，非有萬金左右的開辦費不可，這在我們這窮小子是無法應付的，所以要末立刻關門，要末只得毅然決然硬着頭皮負起推牛的任務。

推牛和吹牛不同；吹牛怪容易，推牛却夠麻煩。但是麻煩儘管麻煩，總還可以用你的自由意志去推。還有一件困難的事情是我們更無法自主的，那便是在以全國爲對象的日報看來，香港的交通實在可說是又一隻大笨牛！我們通常知道由

香港開上海的郵船，最快的兩天可以到；至於航空，那應該更快，由上海飛到廣州，由廣州經火車到香港，隔天就可以到：這似乎不能不算是相當的快。但是實際情形却沒有這樣順利，因爲最快的郵船每月只有一兩次，其餘的船要四五天，五六天，甚至六七天才到。航空的信件嗎？屢次在你所收到的信件上印一個蔚藍色的戳子，上面是"Flight Delayed"（『飛行延擱』，）給你一個九天才到！

這種情形，在以西南爲對象的港報，還不感到十分困難，橫豎它們的銷路偏重在西南，它們的新聞也偏重在『粤聞』『港聞』；但是生活日報是以全國爲對象，它的銷路是普遍於全國，它的新聞是以整個的中國做出發點，遇着這樣的另一隻大笨牛，便成了一個大問題。結果，每天在我的辦公桌上高高地堆着一大堆由全國各地讀者的來信，都說他們很要看我們的報，但是到得太慢了，要我們趕緊想法子。我們能怎樣想法子呢？最爽快的法子當然是自買一架飛機，或是自己定造兩隻郵船！但是這樣爽快的法子，在五年十年後的生活日報也許可以說出就

幹，可是在香港貧民窟裏辦的生活日報，這句話僅在嘴上提一提，讀者諸位好友們聽了，就已經要感覺到我是在發瘋！

九 一封誠懇慰問的信

平心而論，如只想在香港辦一個地方的報紙，只想以西南爲範圍，生活日報實在還可以在香港繼續辦下去；但是我們辦生活日報是要以全國爲對象，而且看到每天堆滿桌上的全國各處讀者的來信都要求『遷地爲良』，歉疚的情緒時刻在我們的腦子裏迴旋着，同時我們還有擴充股本，增廣規模的大計劃，於是便毅然決然遷移上海來籌備出版。

我一方面在香港完全以自己籌備的一筆款子試辦日報，完全以毫無黨派的民衆的立場辦報，正在排除萬難，埋頭苦幹的時候，一方面却時常聽到不可思議的意圖中傷的謠言。有的朋友告訴我，有人在造謠，說我得到南京某鉅公十萬元，

以離開上海為條件，於是就把這筆不清白的款子在香港辦起報來。又有朋友告訴我，有人在造謠，說我得到西南的錢，替他們辦機關報。這絕對衝突的謠言竟同時傳到我的耳朵裏，眞使我覺得好氣又好笑。正在這樣遭受着莫名其妙的冤曲的當兒，忽然得到老友曾虛白先生由上海寄來的一封誠懇慰問的信：

「韜奮學兄：

連讀賜寄生活日報兩期，異常高興。不客氣的說，從報人技術的眼光來批評，這兩期我實在不敢恭維，並且要說一句太簡單了；可是從朋友的立場說，惟其簡單，可以證明你這份報經濟的並不充裕，間接證明了我在此間聽到許多不利於你的謠言的毫無根據。你還是純潔的，還是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掙扎苦鬥着。就憑着這一點信念，我感到非寫幾句去安慰我海南奮鬥的同志不可了。

從你的報上接二連三的×××記號上看來，我知道港方檢查壓迫的利害或者更甚於上海；從你們引時事新報「阿國慘敗的教訓」句中，也發現了大批×××記號一點上看來，

知道你直接受到的帝國主義的壓迫，比較我們更要利害。咳！在這時代何處眞是言論自由的樂土！我同情你的苦痛，可是我不贊成你在卷出版的計劃。

關於你編輯技術上，我有幾點供獻：

（一）改換字體：你的報是中型報，要在小範圍內容納大量的新聞，所以必用小體字，老五號是不行的，必改用新五號或六號字。

（二）新聞緊縮：路透電等，應重寫，摘其精華，要言不煩。

（三）初辦時切勿廣拉廣告，徒陷於一般報紙低折扣登大幅廣告同樣之困境，應集全力注意推廣銷路；待銷路有把握，然後創小幅廣告而高價之例，應登者亦可踴躍。

（四）本報專電似太少。報紙人才應向外發展，編輯部有三四人主持足矣，其他重要人員應分駐各處。

這是我想着的幾點，順筆書此，毫無系統，望恕潦草，並頌

筆健。

弟制虞白手啓。六月十七日。」

這一封充滿着誠摯友誼和主持正義的信，好像在我患難中從天上降下來，使

我發生很深刻的感動，這也是我生平最不能忘却的一件事。

我在香港常自恨力量微薄，當時生活日報的規模太簡陋，但是不料正惟其簡陋，使造謠中傷者不能盡售其技！

關於香港新聞檢查的情形，我以前曾經談過，凡是有關英國的新聞或言論，檢查得特別嚴厲，因爲那裏是完完全全的英國的殖民地；可是關於抗日救國的新聞或言論，却比較地可有相當的自由。

曾先生是新聞界的一位經驗學識俱富的健將，他的指教是很可寶貴的。不過在印刷業那樣落後的香港，六號字根本沒有，新五號字極少，所以只有死笨的老五號。我爲着這件事，老早就和工頭開了好幾次的會議，結果是不可能。新聞重寫，我們的計劃中原也有，後來已漸漸的實行了。在香港的生活日報的廣告却一開始就很神氣，據熟悉香港廣告界的朋友說，我們的廣告價格已和該地原有的銷路最大的日報分庭抗禮了。關於全國的重要通信網，後來也漸漸的精密起來。

此外我在香港所感到的精神上最大的欣慰，是共同努力於報務的幾位共患難的朋友始終不灰心，無論環境怎樣困難，他們總是鼓着勇氣幹着。他們的堅毅的精神，赤誠的義氣，和真摯的友誼，是我所永遠不能忘的。我深信我們在這樣掙扎苦鬥中所獲得的極可寶貴的經驗，對於將來重振旗鼓的生活日報是有很大的裨益的。

附録



我的母親

（三十年前的相片）

推母爱以爱
我民族与人群

韬奋书於看守所
廿六年二月廿日

我的母親

說起我的母親，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甯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麼名字！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時代的不同。現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開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樣地公開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後的女子還大多數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們的姓名只有三個字，嫁後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個字。在我年幼的時候，知道擔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婦女雜誌筆政的朱胡彬夏，在當時算是有革命性的「前進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裏替她訂的舊式婚姻，以致她的頑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鎗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個「朱」字！近來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後仍只用自己的姓

名，不加不減。這意義表示女子漸漸地有着她們自己的獨立的地位，不是屬於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親的時代，不但不能學『朱胡彬夏』的用法，簡直根本就好像沒有名字！我說『好像』，因爲那時的女子也未嘗沒有名字，但在實際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親，我聽見她的娘家的人們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裏的人們叫她做『十四少奶』，後來我的父親做了官，人們便叫她做『太太』，她始終沒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機會！我覺得這種情形也可以暗示婦女在封建社會裏所處的地位。

我的母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裏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裏死的，所以我們母子兩人在實際上相聚的時候只有十一年零九個月。我在這篇文裏對於母親的零星追憶，只是這十一年裏的前塵影事。

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最初對於母親的印象，大約在兩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夜裏，我獨自一人睡在牀上，由夢裏醒來，朦朧中睜開眼睛，模糊中看見由垂

着的帳門射進來的微微的燈光。在這微微的燈光裏瞥見一個青年婦人拉開帳門，微笑着把我抱起來。她嘴裏叫我什麼，並對我說了什麼，現在都記不淸了，只記得她把我負在她的背上，跑到一個燈光燦爛人影憧憧往來的大客廳裏，走來走去『巡閱』着。大概是元宵吧，這大客廳裏除有不少成人談笑着外，有二三十個孩童提着各色各樣的紙燈，裏面燃着蠟燭，三五成羣地跑着玩。我此時伏在母親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張着眼看這個，望那個。那時我的父親還在和祖父同住，過着『少爺』的生活；父親有十來個弟兄，有好幾個都結了婚，所以這大家族裏有着這麼多的孩子。母親也做了這大家族裏的一分子。她十五歲就出嫁，十六歲那年養我，這個時候才十七八歲。我由現在追想當時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見着的她的容態，還感覺到她的活潑的歡悅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見過的女子，我的母親是最美的一個，就是當時伏在母親背上的我，也能覺到在那個大客廳裏許多婦女裏面，沒有一個及得到母親的可愛。我現在想來，大概在我睡在

房裏的時候，母親看見許多孩子玩燈熱鬧，便想起了我，也許捏手躡脚到我牀前看了好幾次，見我醒了，便負我出去一飽眼福。這是我對母愛最初的感覺，雖則在當時的幼稚腦袋裏當然不知道什麼叫做母愛。

後來祖父年老告退，父親自己帶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補官。我當時大概有了五六歲，比我小兩歲的二弟已生了。家裏除父親母親和這個小弟弟外，只有母親由娘家帶來的一個青年女僕，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聽，但是當時父親赤手空拳出來做官，家裏一貧如洗。我還記得，父親一天到晚不在家裏，大概是到『官場』裏『應酬』去了，家裏沒有米下鍋；妹仔替我們到附近施米給窮人的一個大廟裏去領『倉米』，要先在廟前人山人海裏面擁擠着領到竹籤，然後拿着竹籤再從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羣中，帶着粗布袋擠到裏面去領米；母親在家裏橫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來踱去，我在旁坐在一隻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親，當時不知道這就是窮的景象，只詫異着母親的臉何以那樣蒼白，她那樣靜寂無語地好像有着滿腔

無處訴的心事。妹仔和母親非常親熱，他們竟好像母女，共患難，直到母親病得將死的時候，她還是不肯離開她，把孝女自居，寢食俱廢地照顧着母親。

母親喜歡看小說，那些舊小說，她常常把所看的內容講給妹仔聽。她講得娓娓動聽，妹仔聽着忽而笑容滿面，忽而愁眉雙鎖。章回的長篇小說一下講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親再看下去，看後再講給她聽。往往講到孤女患難，或義婦含寃的悽慘的情形，她兩人便都熱淚盈眶，淚珠儘往頰上湧流着。那時的我立在旁邊瞧着，莫名其妙，心裏不明白她們爲什麽那樣無緣無故地揮淚痛哭一頓，和在上面看到窮的景象一樣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現在想來，才感覺到母親的情感的豐富，並覺得她的講故事能那樣地感動着妹仔，如果母親生在現在，有機會把自己造成一個教員，必可成爲一個循循善誘的良師。

我六歲的時候，由父親自己爲我『發蒙』，讀的是三字經，第一天上的課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一點兒莫名其妙！一個人坐在一個小客

廳的坑牀上『朗誦』了半天，苦不堪言！母親覺得非請一位『西席』老夫子，總敎不好，所以家裏雖一貧如洗，情願節衣縮食，把省下的錢請一位老夫子。說來可笑，第一個請來的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只須四塊大洋（當然供膳宿），雖則這四塊大洋，在母親已是一件很費籌措的事情。我到十歲的時候，讀的是『孟子見梁惠王』，敎師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時候，父親要『淸算』我平日的功課，在夜裏親自聽我背書，很嚴厲，桌上放着一根兩指闊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書，背不出的時候，他提一個字，就叫我回轉身來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來。我吃了這一下苦頭，痛是血肉的身體所無法避免的感覺，當然失聲地哭了，但是還要忍住哭，回過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處中斷，背不下去，經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嗚嗚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寃家的『見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嗚咽着背，同時聽得見坐在旁邊縫紉着的母親也唏唏噓噓地淚如泉湧地哭着。我心裏知道她見我被打，她也覺

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時時從嗚咽着的斷斷續續的聲音裏勉强說着『打得好』！她的飲泣吞聲，爲的是愛她的兒子；勉强硬着頭皮說聲『打得好』，爲的是希望她的兒子上進。由現在看來，這樣的教育方法眞是野蠻之至！但是我不敢怪我的母親，因爲那個時候就只有這樣野蠻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親見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樣的母愛，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愛的母親。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發腫有半寸高，偷向燈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滿肚子裝着已成熟的絲的蠶身一樣。母親含着淚抱我上牀，輕輕把被窩蓋上，向我額上吻了幾吻。

當我八歲的時候，二弟六歲，還有一個妹妹三歲。三個人的衣服鞋襪，沒有一件不是母親自已做的。她還時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紅來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歲時，看見母親那樣辛苦，心裏已知道感覺不安。記得有一個夏天的深夜，我忽然從睡夢中醒了起來，因爲我的牀背就緊接着母親的牀背，所以從帳裏望得

見母親獨自一人在燈下做鞋底，我心裏又想起母親的勞苦，輾轉反側睡不着，很想起來陪陪母親。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責備的，就說是要起來陪陪母親，一定也要被申斥幾句，萬不會被准許的，（這至少是當時我的心理，）於是想出一個藉口來試試看，便叫聲母親，說太熱睡不着，要起來坐一會兒。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親居然許我起來坐在她的身邊。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額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針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給我穿的。這時萬籟俱寂，只聽到滴搭的鐘聲，和可以微聞得到的母親的呼吸。我心裏暗自想念着，爲着我要穿鞋，累母親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說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親，似乎可以減輕些心裏的不安成分。當時一肚子裏充滿着這些心事，却不敢對母親說出一句。才坐了一會兒，又被母親趕上牀去睡覺，她說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來幹什麼！現在我的母親不在了，她始終不知道她這個小兒子心裏有過這樣的一段不敢說出的心理狀態。

母親死的時候才廿九歲，留下了三男三女。在臨終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淚叫着一個一個子女囑咐一番。她臨去最捨不得的就是她這一羣的子女。

我的母親只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但是我覺得她的可愛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幹的才具，都埋沒在封建社會的一個家族裏，都葬送在沒有什麼意義的事務上，否則她一定可以成爲社會上一個更有貢獻的分子。我也覺得，像我的母親這樣被埋沒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經歷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著作者　韜奮

經售者　各大書店

中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